

## 一 我研究屈赋的经过

(一) 前人研究屈赋的方法我国文学作家也算不少，但像屈原作品之引人注意，启发人研究的兴趣，可说绝无仅有。自东汉王逸写了部《楚辞章句》，可算是对屈赋专门研究的开始。晋朝郭璞有注十卷，惜今亡佚。宋有洪兴祖为王逸作补注，朱熹有《楚辞集注》；明有陆时雍、黄文焕、王夫之；清有屈复、蒋驥、林云铭、毛奇龄、戴震、俞樾、丁晏、马其昶、廖平、谢无量、王闿运等；而近代楚辞专家尤彬彬辈出，游国恩、陆侃如、闻匡斋、饶宗颐、徐嘉瑞、姜寅清，乃其比较重要者。旧派如刘永济，亦卓然自成一言之言。

但屈原作品是战国时代的新兴文学，不但它的体裁于诗三百篇外另树一帜，它的内容也蕴藏丰富，有如一座宝山，信手掇拾，都是价值连城的珍物。凡有内容的文字表面字句也必比较艰深，注家不得其解，便怀疑这些都是譬喻。我们知道汉代正是譬喻说盛行的时代，像《周南》第一首《关雎》，无非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单相思，在汉经学家的眼里却变成：“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而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了。《卷耳》明明是奉使在外之人，思念家中，登高以望，望而不见，借酒浇愁，《诗序》却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装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了。这些话不但隔靴搔痒，而且闭眼穿针，从前学者为传统压力所约束，只有盲从，我们今日读了诗的原文，再读《诗序》，便不免要绝倒了！汉儒注经所最爱用的“譬喻说”，我们可说它有点像近代文学上的“象征主义”，王逸注屈赋的《离骚》，便开始将象征主义运用出来，他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他这个方法，不但用之于屈原抒情作品的《离骚》、《九章》，更用之于完全客观描写的《九歌》、《天问》。于是所有屈赋中的美人香草，固无一非屈原借以譬喻他的君臣遇合关系，便是那些祭祀神明的《九歌》，也无非“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了。这个“象征主义”果然是一种利器，所有屈赋里的难题，遇着它无一不迎刃而解。

可是这种方法和诗经的注解，同样是迂曲可笑，毫无道理，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它。

王逸以后所有楚辞注家没有一个能跳出他的窠臼的。所有注解，总在屈原和楚怀王身上来来去去地兜圈子。近代游陆闻饶等利用西洋精密的科学方法将屈赋细加分析，闻匡斋的成绩尤值称道，但他们对屈原赋真正的内容仍缺乏了解，非求深反失，则转入歧途，与前人之错误相比，也不过五十步之与百步之差罢了。

(二) 我无意间发现探讨屈赋的新路线至于我，研究屈赋竟发现了一条新的路线，这路线便是屈赋内容必非故纸堆所能解决，必须搜讨域外古代的宗教神话和其文化分子而后可。

我这个路线的发现，完全是于无意中得来的，以前作屈赋研究报告也曾公开表白过，现在不妨再表白一回。

民国三十二年有个学术界的朋友卫聚贤先生，要办个学术论文集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征稿于我。我于武大教文学史时讲到楚辞部分，原写过篇《天问整理的初步》，现想加以扩充写篇文章交去。不过整理《天问》也必须明了《天问》的内容，乃找了《山海经》、《淮南子》一类书来参考。忽然于《山海经》发见“昆仑四水说”，于《淮南子》发现“帝之四神泉说”，想到《大唐西域记》说印度须弥山即阿耨达山有四河，又想到《旧约圣经》伊甸园也有四河。我有一本上海美华圣经会印行的官话译本《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章说“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了……有河……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那流在亚述东边的希底结(Hiddikel)，《圣经》学者考即为美索博达米亚(两河流域)的替格里斯(Tigris)，那伯拉河便是幼发拉底斯(Euphrates)。

当我知道伊甸园两条河是真真实实地理上的名词，而且都在阿拉伯半岛上，即构成所谓世界“文化摇篮”的新月沃壤的两条大河。我当时惊喜兴奋之情，真没有适当的词汇可以描绘，有如久处黑暗者眼前忽见一线的光亮，如寻觅窖藏者忽然发现了一个指示入口的目标，我觉得探讨屈赋的新路线被我发现了。既然承认中国昆仑，印度阿耨达和旧约的伊甸原是同样的一回事，而伊甸的四河却有两河在美索博达米亚，那么昆仑、阿耨达和伊甸也在西亚了，屈赋里许多神话和奇怪事物也必来自域外了。我们若决然离开故纸堆，向域外新天地去探险，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但面对着这一篇文理杂乱，意义晦涩的《天问》想索解它的内容，又将何从下手呢？既然是错简，我何不先把这些错简来按序排列一下呢？找到若干废名片和一些硬质纸张，剪成条子，每一张纸条写《天问》四句，七言的则写两句，算作一简。放在桌上，玩索文意，加以拼合。天文一段四十四句原来没有错简，不去管它，既有天文必有地理，原文本有许多关于地理的话，但又夹杂关于鲧禹治水一段共十六句，《天问》既有夏商周三代的史事，这一十六句姑予搬开，等整理夏代历史时再作理会吧。这十六句一搬开，再把下文类乎地理问句，如“墨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合在一起，奇迹出现了，关于地理问题的句子恰恰一共是四十四句（“应龙何画？河海何历？”缺失半简，古人在用韵方面早已觉出），与天文问题四十四句分量相等。当时我的心快乐得乱跳。我想《天问》里的七言句一定是乱辞，应抽出归并为一段放在正文之后（在我《天问整理的初步》即做了这个工作），其余所叙的是夏商周的史事，凡与这三代史事无关者我也将它们归并在一起，作为一段，看有多少句子？于是“何所不死，长人何守？”、“白蜺婴弗”、“天式纵横”这些句子归并为一段以后，一算，除了缺失的半简外，又恰恰是四十四句。

事至此，决无疑惑，《天问》每段句子多寡是有一定的。夏代一整理一共七十二句，商周二代各少数句，但所少也仅是一简半简，当都是七十二句。七言乱辞一共二十三句，原文当是二十四句，阙失一句无疑。因为“四十四”、“七十二”、“二十四”都是一种现成的数目。

我当时对《天问》初步的整理，只仅仅费去一天工夫，后来又各段简子略为调动。直到去年（即五十年）写《天问正简及疏证》二十五万字，又将三代史事的简子调整了一下，我想这一回该可以作为定稿了。十余年前我第一次整理《天问》时即将《天问》分为“天文”、“地理”、“神话”、“历史”（分夏商周三段）“乱辞”五大段，这个原则，始终维持着未有分毫的改动。

以《天问》这样一篇绝世奇文，文理错乱了二千数百年，我以一日的短促时间，便发现了它各段句子多寡有一定，并且整理出一个头绪，说来许多人不会相信，但事实确实是如此。一则我当时智力的活动达于最高峰，二则说句迷信的话是冥冥中有所谓“气数”者为之支配，所谓天生至宝不自秘，神物历久终必出。不过当时我若不采用逐简拆开再行拼合的方法，也许直到今日，《天问》还未能整理出来，所以我对于那十几张废名片的功用，到今尚感念不忘哩！（三）关于屈赋第一步的论著我既发现《天问》有一段四十四句的神话，再研究这一段究竟是一个神话呢？还是有几个？探究未及几时，便发现共有三个神话，其中第一个竟像《旧约·创世纪》，有亚当（登、又名安登）女媧（夏娃）不死树、魔蛇、守树天使、洪水、挪亚方舟、巴别塔等等，于是写了一篇《天问里的旧约创世纪》，约万余字，寄给卫聚贤先生交了卷。不久便在《说文月刊》吴稚晖八十诞辰纪念号刊出了，我乃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借了一些原版的巴比伦、亚述、埃及、希腊、印度神话啃了几个月，又积了许多心得，知屈赋中那些不易索解的典故，来自域外，确然无疑。遂接连写了两篇论文，其一是《后羿射日神话》，其二是《印度诸天搅海故事》，寄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

我写完了那两篇关于神话问题的文章后，接着便写一篇与屈赋无关而实有关的专题研究，这便是《昆仑之谜》。

我既从《旧约圣经》里得知伊甸园有两河是地理上的名词，便知伊甸故事必出西亚，中国的昆仑，印度的阿耨达也必是西亚神话地理的翻版。胸中既有成竹，研究时便有一定的途径可以遵循，用不着瞎摸索，所以一分一秒的时间精力都未浪费。七万字的论文，我连查参考资料和起草誊清，一共只费了个把月的光阴，也可算是心灵手敏了。何以能够如此，又是当时我的智力的活动达于峰极的结果。

因为武大图书馆几本关于巴比伦、亚述、希腊、印度的神话书已被我读遍，《天问》里最难的三个神话虽已给我解决，那些天文地理却不是单凭《山经》、《淮南》所能弄清楚的。还有历史方面，鲧禹故事正是古史辨的中心，他们辩论了数十万字尚无结果，我怎样可以轻易地参加这个论战呢？我想暂把《天问》搁置一边，将来参考资料搜罗完备，再向屈大夫一一交答案吧，现在应该先解决《九歌》。

在四川时，我因研究希腊酒神，发现《九歌·山鬼》一篇与希腊酒神狄奥尼苏士（Dionysus）有极端相类之点。曾写了一篇《山鬼与酒神》，后因见《国殇》里有“首虽离兮心不怨，魂魄毅兮为鬼雄”二句，忽想到印度锡克族人崇拜一个无头骑马神，谓此神战死故无头，祀之可以胜敌。那时恰有个印度学生在武大研读中国近代史，曾问以此事。他说此神即象面神迦尼萨（Ganesha），我托他写信到印度代抄关于迦尼萨的资料。那时抗战已近胜利，中印邮便并不阻滞，他的朋友倒替他抄到了资料十几页。我才知迦尼萨在婴儿时期因故失首，偏入天教人以象头续之，遂成象面神。

但他也常现无头婴儿相 (Headless Child), 这个婴儿字样与国殇“殇”字有点关联吧! 理学院教授张资琪先生想研究中外化学同源问题, 在古代中外文化交通上, 他引我为同好, 常和我谈论, 并将我所撰关于屈赋论著一概借去阅读, 他有几本购自英伦的印度神话也借给我。我读了以后, 对于迦尼萨的认识又进一层, 遂写了一篇《国殇乃无头战神说》送给武大季刊, 一年多也未发表。那篇稿子后由我索回, 直到四十一年始由台湾《大陆杂志》刊出。

三十四年, 日本宣布投降, 我们抗战获得最后胜利, 大家乱糟糟地复员。因交通工具的缺乏, 我和大部分同人淹留四川乐山武大的分部, 直到民国三十五年秋冬间始得出川返鄂。

大概是为了前两年研究屈赋所耗精力太过, 同时又值更年期, 生理上起了很大的变化, 到了武昌以后, 每日总是病恹恹地打不起精神。看书看不进, 写文章更像连笔都提不动。同时我的屈赋研究也的确遇着暗礁, 胶着了。

回到武昌尾三年, 因健康关系只解决了《山鬼》和《国殇》两篇, 又写了一篇《天问九重天考》便什么成绩都没有了。《九歌》最后《礼魂》一篇, 歌辞既短, 又羌无故实, 其为各篇公用的送神歌不成问题, 但除去《礼魂》外尚余十篇, 共祀十神, 这十神里山鬼我已知是酒神, 国殇我已知是无头战神, 其余八神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呢? 是东一个, 西一个随便凑合的呢? 还是隶属于同一集团呢? 武大同事金克木先生留学过印度, 精于梵文, 我曾问他印度有没有十位神道的集团, 他说他在印度时曾看见一张画, 许多神在一起, 数一数一共十位, 其中有一位没有头颅。我听了不禁狂喜, 这不正是《九歌》的十神吗? 没有头颅的, 不正是无头战神国殇吗? 于是再三追问那十神各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他们要聚集在一起? 金先生很感困难地回答说, 他当时看见这幅画是无心的, 在什么书里或在什么庙的壁画看到, 于今早记不清了, 连想写信到印度去问, 都无法问的了。听了他的话, 我又由狂喜变成失望, 我当时便下了一个决心。屈赋问题既都来自域外, 非到外国去一趟不能解决, 我将来还是再到法国一趟吧。(四) 关于屈赋第二步的探讨三十八年, 我毅然抛弃武大十八年岗位到上海。淹留上海三阅月, 也曾跑过几次旧书铺, 拜访过几座收藏甚富的图书馆, 都毫无所得。

京沪警报日急, 我应了香港真理学会编辑之聘, 到了香港, 一年以后, 到了法国。在法兰西学院旁听 E. Dhorme 教授的巴比伦文化课, 我的法文既久荒, 那课程牵涉范围又太广, 当然不易领会, 承他介绍了一本他自著的《巴比伦亚述宗教》(Les Religions de Babylonie et d'Assyrie), 又开单介绍了十几种关于西亚的宗教神话。倒是 Dhorme 教授自己那本著作给我益处不浅。在巴黎大学我听汉学权威戴密微 (Demiéville) 先生的课, 自己借此在高等中文部看书, 看《道藏》和《大藏经》。在《道藏》里, 我收获颇多, 佛经所阅仅寥寥数卷, 可说一无所得。我对戴密微教授说我想研究屈赋, 请他指导。他一听屈赋二字, 头都胀大了, 他说中国文学种类甚繁, 作家也不少, 为什么你偏要研究屈原的东西? 改换一个题目吧。我一定不肯, 并对他说我之远来法国便是为了解决屈赋问题, 争之再三, 他才答应。他指示了一些英德法汉学家有关屈赋的著作, 叫我先读了再说。

除了德文我完全不懂以外, 英法作家的著作多是些《离骚》、《九歌》、《九章》的翻译, 照王逸、洪兴祖等人的注解, 逐句译之, 并无神话, 对我

的研究可说半点用处也没有。

我非常失望，想这一趟远来海外尚无结果，这个研究想必终于落空了吧！

四十一年春，得台湾舍甥来信，家姊淑孟女士患风湿症甚重，已到了不能行动的地步。

我和家姊手足之情极深，同时自己资斧已竭，到处求人接济也不是办法，遂决定了回到台湾的主意。

到台湾后，家姊的病经过一些治疗也好起来了。师范学院聘我教书，除了中文系一年级基本国文外我要求开楚辞，每周三小时。我那时对于楚辞除了前述那一点成绩，其余尚在大荒山无稽岩畔，开这门课，实可说是冒险的。不过人总有惰性，我开了这门课，可以督责自己用功，一面教，一面学，也许终有解决全部问题的一天。况且教楚辞有新旧二法，新法是我自己所发现的。若教不下去，便改用旧法，各家注释用之不尽，随便拿来对付一下，便可敷衍过去了。

我探讨屈赋的新路线系于无意间得来，解决《九歌》十神是否同隶一个团体的问题，也是出于偶然的机，说起来真是奇巧不过的事了。当我把《山鬼》、《国殇》两篇将次讲完之后，因替中文系一年级学生讲姚鼐游泰山记，参考《古今图书集成》里的泰山故事，忽见泰山司命字样。想到巴黎的时候，戴密微先生嘱阅法国某汉学家《司命与死神考》，而泰山的东岳原属冥司之职。《九歌》里面的大少司命莫非便是死神吗？我在域外神话里已读了不少死神故事，像西亚的尼甲（Nergal）希腊的柏鲁托（Pluto），以前并不觉得他们和《九歌》大少司命有什么关系。不过《大司命》里“天门”、“玄云”、“飘风”（即羊角风），“冻雨”、“阴阳”、“寿夭”与死神不能说没有干涉。再者《大司命》里“广开兮天门”是大司命说的话，“君徊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旧注谓“屈原见司命从天而降，逾空桑之山以要之”，未免太好笑，屈原是个凡人，有何能力飞空而要司命？此人既非屈原是谁呢？忽想起西亚尼甲故事，大地原属女死神所管辖，女神称大地夫人，尼甲以武力迫此女神为夫妇，夫为冥君，妇为冥后。希腊柏鲁托之劫夺司春女神卜赛芳，神话学者谓即由西亚尼甲故事衍化而出。那么，这位逾空桑之山以欢迎司命者一定是大地夫人了。

我想法一定，即动手写关于大司命的那篇文章。不久便写成了。再将《九歌》十神仔细推勘。除去《大少司命》、《山鬼》、《国殇》四篇，尚有六篇。《东君》旧注系祭太阳神，不必再有疑问。太阳之神和《九歌》这些神祭在一起是什么道理？西亚七星坛系供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者，《九歌》莫非也是祭九重天主神之歌吗？那么东皇泰一好像是木星之神，河伯好像是水星之神，湘夫人是女性，西亚七星坛金星神是唯一女性，不必说，湘夫人一定是金星之神了。湘君是土星吗？歌辞有乘飞龙的话，希腊土星正以有翅之龙（Winged Dragon）驾车，也不必说，一定是了。剩下了一个云中君，旧注指为云神丰隆，云神地位很低，周礼祭风伯雨师尚不及云师，他又何得参与九重天主神之列？我想云中君定是月神，为的《归藏》和《史记·封禅书》屡以云中、东君并列。既承认东君是日神，则我们非承认云中君是月神不可，西亚的月神辛（Sin）乃男性，是太阳神侠马修（Shamach）之父。我这各神都是一个逼拶一个，逼拶出来的，说起来倒也十分有趣！

我发现屈原《九歌》的主神和《封禅书》齐地八神将也大有瓜葛。列表于次：B 天主\*剿 侵 癩 春硬 N 饗堑陌 牵 牛幔 笱D 波 (Nebo)

C 地主 = 蚀之神，即大司命；西亚的尼甲 (Nergal 兵主 = 荧惑之神，即国殇；\*饗堑哪峒祝 ê 蟾牧礮战神 Diarra

E 日主 = 太阳之神，即东君；西亚的侠马修 (Shamash 月主 = 太阴之神，即云\*芯 晃饗堑男粒 樱棕睿 G 阳主 = 木星之神，即东皇泰一；西亚的马杜浚 停幔颍洌酰耄\*

H 阴主 = 金星之神，即湘夫人；西亚的易士塔叮 桑螽瑁笠幔颍\*

I 四时主 = 土星之神，即湘君；西亚的尼尼伯 (Ninib N 以谏 叱晷础豆 溲\*无头战神说》，已知他是战神，于今和《封禅书》八神将一比并，才知道他在天属于火星。

西亚、希腊的火星正都是战神。《封禅书》说兵主祠蚩尤。《史记》集解引《皇览》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阡乡城中，高七丈……肩髀冢在山阳郡矩野县重聚乡，大小与阡冢等。传言黄帝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首异处，故别葬焉。”蚩尤的头葬在寿张县，肩髀（即尸体）葬在矩野，相去很远，这正是证明蚩尤乃是一位无头战神。而“身首异处”这句古代传下来的话也得到相当的解释。今人谓断头为身首异处，是不对的，必如蚩尤之身首分葬两处，才可以这样说。商代王陵有许多无头躯体殉葬，其头皆另埋，这也是身首异处的注脚。商王陵那些无头人，定是故意做成无头战神或战神部下的模样用以保卫王陵的。

我把木星之神当做阳主，金星之神当做阴主。是根据三国时西蜀谯周的说法。谯周说“予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史记》索隐引）我们知道古书里有所谓东王父，西王母。东王父又称木公，正是木星之神；西王母，又称金母，正是金星之神。东皇泰一和湘夫人之代表阴阳，我曾在东皇泰一的疏证里有详考，现不赘。我知道把水星之神当做天主，最足启人疑讶。但在西亚，水星之神哀亚历史最古而地位最高，它与天帝阿努有同等重要。二者同主北极星 (Pole Star)，为紫微宫天皇大帝之神。

它也曾一度为宇宙主。哀亚又为苏末人神坛最高之神，假如齐地八神乃苏末人携来，则当然尊它为天主了。

第八重天的主神的蚀神，我后来研究佛经的大日经疏才知道。地主在梁父，地主正是死神，在天为蚀神。八神里独缺少司命，可见八神之入我国，为时甚早，是在七重天盛行的时代。

我得到这个发现以后，喜不自胜，四十二年学术季刊来信以“屈原”为题，教我写篇文章，我便宣布《九歌》是整套神曲，《九歌》歌主是隶属于同一集团之神。还有个山鬼，我以前曾主张他不在《九歌》系统以内，后来又取消前说。原来西亚七星坛后变为九层，其后连地面一层基础也计算在内。《天问》：“璜台十成，何所极焉？”乃指此而言。希腊以“十”为完整的数目，九重天连地球共十重。希腊酒神曾一度死亡下降地府，故亦具冥君资格。他是代表九重天以外的地球。

发现《九歌》主神以后，又为他事耽搁，未为屈赋探讨者达七、八年之久。

(五) 四十九年迄今的工作直到民国四十九年，我厕名国家长期发展

科学委员会研究员之列，这是每年都要交研究成绩的，半分马虎不得。四十九年度，我交的稿子是《论九歌河伯篇》共八万字，五十年年度研究题目是《天问》全篇。我将教学时所写天文地理各篇加以补充，三个神话十余年前便曾写过，改窜若干情节加以节录便行。自历史部分直到乱辞，约占《天问》三分之二的篇幅，疏证约十四五万字，都是五、六两个月里临时趑趄赶出来的。那年夏季气候奇热，盛暑麀兵，其苦可想。写完全稿以后，又须托人写钢版，换了几个抄手，费了好多唇舌，弄得焦头烂额。好容易将二十五万字的成绩交去，我的健康也就一蹶不振了，直到次年一月后才渐渐恢复过来。五一年度我研究的题目是《论九歌东皇泰一》，仅六万余字，连参考带撰写，个把月便脱稿，于是全部《九歌》只剩下东君和云中君。希腊关于太阳神阿波罗，月神狄爱娜的故事甚富，并且莫不奇趣横溢，美妙动人，西亚则甚稀少。我国对于月亮尚有嫦娥、玉兔、吴刚、桂树诸说，对于太阳除了三足乌以外好像什么都没有。资料既少，我打算归并于一题来撰写。

因为要交科学会的卷子，几年以来，我对屈赋不能不用功，一用功，对屈赋内容的认识确实迈进了一大步；许多问题以前不能解决的，都解决了，《九歌》乃祭九曜之歌的假设，也完全证实了。这不能不感谢科学会对学人协助的功劳。将来我打算以我的一部分研究，纪念科学会创始人胡适之先生。屈原作品以《九歌》、《天问》为最重要，假如能把这两种文章解决，则《离骚》、《九章》等置之不论亦无不可。若《九歌》疏解能继《天问》而告成，我打算先行出版。当然各篇材料盈虚的调剂，错误的改正，证据的补充，以及一切大小问题的再讨论，再决定，还得费上几年工夫，才得成书问世，又要花上一大笔的印刷费。可是这些问题现在都暂可不论，我若能及身完成这个研究，也算未曾虚生一世，只怕耽搁过久，时不我与，此愿未必竟能贯彻呢！

我的屈赋研究与历代楚辞注家不同之点究在哪里，前文已述，我研究此问题用的是什么方法，得到一些什么收获？现在也不妨在这里谈一谈。

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也是世界的一支。我这发现为时甚早。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乐山写《昆仑之谜》的时候，便把这个理论在该书的《余论》里宣布出来了。不过在开始时我尚以为域外文化之涌入我国系在战国时代，即屈原时代，不久便发现商代甲骨文已有这种痕迹；还有其他种种迹象，于是我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意见；这便是域外文化之入我国共有两度，第一度当在夏代，或者还要提早一点，第二度则在战国中叶。

本来中国人种西来说，或中国文化外来说，近三百年来外国学者颇有讨论。为省事与方便起见，现在我节引方豪神父《中西交通史》第一册第二章《史前史上两问题》第二节《过去中外学者之意见》，方神父说关于这些问题共有几种说法：

有主埃及说者。德国耶稣会士基尔旭著《埃及之谜》又著《中国礼俗记》，均以中国文学有同于埃及象形文字之处，而认为中国人系埃及人苗裔。另有法国雨爱主教从古代海上通商史之研究，而谓印度与中国系埃及殖民地，两国民族，至少大部分属于埃及人血统。又有英国人渥柏敦认为中国文字系由埃及象形字之流行体演变而成。其后伦敦皇家学会尼特姆在意大利都灵博物院见一埃及依西斯（I s i s——即拙译的“埃西”）神像上刻的埃及文字，梵蒂冈一中国职员在《康熙字典》里查得相同者十二字，乃遍请罗马名学者证实其说。

此外又有根据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及公元前一世纪之西里史家第奥道罗所著埃及名王拉姆斯二世征服中国事，而主中国埃及同源论者。

有主巴比伦说者。一八八 年后，伦敦大学拉古贝里 (L a - c o u p e r i e) 昌言中国古代之“百姓”即巴比伦之巴克族 (B a k)，百姓即为“巴克”一音之转；并谓神农即萨贡 (S a r g o n)，仓颉即同基 (D u n g i)，黄帝为有熊氏，有熊即洪特 (K u d u r - N a k h u t e) 无一非巴比伦名。一九一三年，英国教士鲍尔 (C . J . B a l l) 著《中国人与苏末人》(C h i n e s e a n d S u m e r i a n)，认为中国文字源自巴比伦。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亦从之，见两人合著之《中国文明发达史》。

当时我国人士附和此说者不乏其人，如丁谦之《中国人种从来考》，蒋智田之《中国人种考》，章炳麟之《种姓篇》，刘师培之《国土原始论》、《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立国篇》、《种原篇》等。

有主印度说者。一八五三年法国哥皮诺 (A d e G o b i n e a u) 以为白种人实负发明文化之责任，埃及与中国文化均为印度民族即白色阿利安种之首陀罗人所传入。

有主张中国文化必源于另一较古民族者。此为一七七五年法国巴伊 (S . B a i l l y) 研究巴比伦、印度、中国古代天文学后之结论，彼以为此三民族之古代科学均为另一已消灭之民族所传授，此古老民族似在亚洲近北纬四十九度处，而向南北迁徙，同时法国生物学家步风 (B u f f o n)，亦宣称人类文化乃发生于中亚北纬四十度至五十度之处。

此外尚有数家之说从略。

这些说法当时虽喧阗一时，风从者甚众，后来则被一一推翻，没有一个能更存在的了。

我现在的屈赋研究又唱起这种论调，并非旧调重弹——在我写《昆仑之谜》时，这些说法尚一概不知道——实是确有所见。我取西亚希腊印度等国的宗教神话与其他文化因素和屈赋对勘，发现我国古文化与两河流域吻合者十之八九，便说十分之十也未尝不可。至于埃及的文字问题，我没有讨论的资格，但我总觉得中国与埃及文字，既同属象形，则必有同者，如日月及牛马等动物，似未可因几个字之偶似便指为同源。至于埃及宗教神话据我浮浅的研究，觉其与我国相距实在太远，不过他的太阳神奥赛里士与其妻埃西故事，情节颇类西亚的旦缪子与易士塔儿，则由于埃及与西亚彼此感染，与我国无关。

希腊和印度与我国吻合者约十之五六。盖她们的宗教神话虽亦由两河流域传去而颇有改变，必须细加钩稽，始能得其概略，不像我们之与西亚简直是一对孪生子，面貌精神无一不似。所以我又曾大胆宣言：希腊印度文化都是由两河流域传来的，中国亦然。但我们中国接受西亚文化却远比希腊印度为早。我们是西亚文化的冢子，而希腊印度仅算二房三房的子孙。

我说这话知道有许多人要反对：要骂我认人为父，太缺乏民族自尊心。假如中国文化与西亚果有相同之处，何不说是中国传去的呢？关于这，我要很严肃地告诉他们，我们现在是在研究学问，学问之事以寻求真理为第一，不能掺杂丝毫的感情作用。我是中国人，我当然爱中国，也希望中国文化西传之说能够成立，无奈那位铁面无私的时间老人不允许，因为中国历史

实在不及人家的长。现在我替我国争得一个“文化冢子”的地位，我以为是已经够光荣的了！

第二，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这个说法范围太大，暂且不提，现仅以神道为例看是如何。我说《九歌》的九神历史甚古，不但我国之神均由此九神衍变，世界神道也未能例外。本来世界神道多逾牛毛，我中国乃多神教国家，男女神道也是林林总总，各有姓名，各有渊源，其事迹尤为繁复，诘究不易，今若以九曜之神为纲领，寻觅其辗转演变之迹，则大部分问题皆可涣然冰释。这方法真最痛快、最简捷也没有！

今以《九歌·大司命》为例。王逸不知司命为何神，故无注；洪兴祖始引《周礼》疏，谓三台有二星，文昌有一星皆曰司命；又引《礼记·祭法》郑注，谓司命为宫中小神，又引《文选》五臣注，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辅天行化，诛恶护善，似非宫中小神之谓。

后人对于司命的解释始终跳不出这个圈子。我在古书里发现一大堆司命。以天星而论，虚宿里又有二颗星主哭泣死亡事，也叫做司命，《庄子·至乐》篇、《史记·扁鹊传》，有起死回生的司命；《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有太一之佐的司命，有晋巫荆巫所奉祀的司命；班固《白虎通》有谴过的司命；应劭《风俗通》有齐地所尊崇的司命；《易林》有司生的司命；江淹《邃古篇》有鬼之元首的司命；唐人笔记有专管小儿疾病的司命；宋人笔记有专指灶神而言的醉司命；泰山有泰山司命及九天司命；民间称灶神亦曰司命，或曰九天司命，更看葛洪《抱朴子》，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司命之繁，简直令人眼花撩乱。前人注解《九歌》大少司命除了照洪兴祖的说法外，其他古书里的司命，简直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这也不能怪，他们对司命的根源、地位、职司、权能，一点也不能了解，你又能叫他们做什么呢？现在我们研究域外宗教神话，知道所谓司命者便是死神（God of Death），也即是冥君或地府主者，所以你可以说他是“鬼之元首”。他是司人寿夭的，但司命分为司生司死两类。生神能起死人而肉白骨，《庄子·至乐》篇、《史记·扁鹊传》所谓的司命属之。司生的司命又为“孩神”，所以他管小儿。死神原由火神变来，火神天然为灶神，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宫中小神”，可是古代灶神地位极高，神固宫中之神，你却不能说他小。少司命是第九重天的主神，所以称为“九天司命”。至于司命上应星象，更不待论。

奇怪的是死神和生神很早便莅临我国，桓子孟姜壶那个“大巫司誓与大司命”便是《九歌》的大司命；那个“南宫子”便是司生的少司命。又《遁甲开山图》：“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山知死。”死神在泰山的梁父，即《史记·封禅书》八神将的“地主”，亦即是“后土”，也即是历代帝王封禅泰山所必禅的地点。而生神呢，则在亢父山。

死神在外国的埃及为奥赛里士，在希腊为冥君柏鲁托，在印度为米特拉，为阎摩。

于今请再以《九歌·湘夫人》为例。《九歌》，既为祭九曜之歌，湘夫人属于哪一曜呢？曰金曜。此神起源石器时代，为时绝早，初即名之曰维娜斯（Venus），指金星而言，后乃名之曰易士塔儿（Ish-tar），金星本为爱情之星，其神遂亦成为爱神，又变为肥沃植物之神，同时又成为母

神，为的母神求子嗣之繁衍，肥沃和植物神求蔬谷之丰饶，性质是相类的。因易士塔儿历史太久，权威太大，每至一处，便将当地女神吸收融化于她自己中，故其神格方面极广，故事变化多端。

她在西亚与最早原始深渊的精灵曰蒂亚华滋又名蒂马特 (Tiamat) 者混合，又与较古女神婆 (Bau) 妈妈 (Mama) 妈咪 (Mami) 者混合；其后则天帝阿努 (Anu) 之后阿留留 (Aruru)；暴风神恩利尔 (Enlil) 之妻润利尔 (Ninlil)；月神之妻润卡拉 (Ningala)；日神之情人爱叶 (Aya)；土星尼尼伯 (Ninib) 之妻葛兰 (Gala)；水主之妻唐克娜 (Damkina)；木星马杜克之妻 Sarpani-tun 都有易士塔儿的成份在内。至于她以她的本名为生神旦缪子的情侣；为亚述国家最高神亚苏尔 (Asshur) 的妻子，那更不必多提了。

易士塔儿传到地中海的国家则为腓尼基主神安东尼 (Adonis) 之妻阿士旦特 (Astarte)；为非里基亚主神阿提士 (Attis) 之妻西倍儿 (Cybele)；为希腊爱神兼美神阿弗罗蒂德 (Aphrodite)，为罗马之维娜斯 (Venus)。

其在埃及则为太阳神兼死神奥赛里士之妻埃西及其他若干位有名女神，其在印度则为大自在天之妻婆婆谛 (Parvati)，为偏入天之妻吉祥天 (Laksmi) 及若干有名女神。其在我国则为西王母、女娲、高禊神、天渊玉女及螺仙、织女、马头娘、素女、太真夫人、碧霞元君、骊山老母、东陵圣母、汉皋神女、洛水宓妃、青溪小姑，高唐神女、太华玉女。便是闽台最为崇敬的妈祖，也是易士塔儿所演变的一型。

我们仅举死神与金曜为例，中国的、世界的许多神道是不是都贯穿起来了呢？其他文化因素可以照此法贯穿的还多得紧，为避免喧宾夺主起见，只有暂不论了。

其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所谓经便是五经或十三经；所谓史便是《左传》、《国语》、《国策》及二十四史；所谓子，便是《山海经》、《穆天子传》、《吕氏春秋》、《庄子》、《列子》，及其他书；又有汉代一些纬书；所谓集，范围更为广大，不能列举其目。或者将说这些书并不能说不可以凭藉，不过材料的真伪，时代的先后，总该问一问吧？像《列子》人皆以为系晋张湛伪撰，纬书尤系汉哀平间醉心利禄的贱儒所作，怎么可以拿来应用呢？屈原乃战国末期人，二十四史和各家集子在他之后，怎说可以拿来解释他的作品呢？答曰古书固多伪，但其中资料则未必全伪，譬如《归藏》，其书久佚，隋刘炫伪撰一部，今亦不存。今所辑本中有“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生禹。”

《山海经·海内经》固言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明明是说鲧死后还能生儿子。读了《归藏》才知道“鲧复生禹”的那个“复”字应作“腹”，才与《天问》“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相呼应。禹孕于其父之尸体，刀剖始出，我现在西亚神话里找到根据。作《归藏》者并不知数千年后有人要援它的文句来解释问题，怎会预先布下那种圈套教你来上当呢？所以《归藏》无论是汉以前传下的佚文也罢，隋刘炫伪作的也罢，总有一部分资料是真的。二十四史及各名家集固在屈原以后，但文化锁链是一环套一环接连地下来的，数千年后人的思想原建筑于数千年前人的思想上，他们偶于书中无心间讲到古代故事，读者炯眼烛及，慧心领悟，便是绝好的考证材料。

我们现在来举个实例吧？我国民间言大地顶在鳌鱼身上，鳌身偶然摆动，便发生地震。

所谓鳌者相传其首如龙，其身如鲤，旧俗元宵节张灯，有山，之形状大率类此。故“ ”字或作“鳌”。但古人则谓乃海中大龟，王逸注《天问》“载山，何以安之？”也说“，大龟也。”郭氏《玄中记》：“东南之大者有巨焉，以背负蓬莱山，周回千鱼，巨，巨龟也。”有云系“海中大鳌”，龟鳌一类，不必强为分别。印度亦有龟负大地之传说，正出一源。

谈到这个龟，话可多了。《吕览》、《月令》、《淮南》均言北方之帝颛顼，是主水的，其兽玄武。玄武者乃龟蛇纠盘在一处之物。崔譔之引庄子佚文“北方禺疆，灵龟为之使”，而《列子》言帝命禺疆以巨鳌十五，背负蓬莱瀛洲等五仙山。可见龟是惯于负重的，我国每以石龟负穹碑，名之曰赑，不知其故，现始知是由负地而来。女娲断鳌足以立四极，这个观念也由龟负地而来。因此我知颛顼与禺疆仍系一神之衍，后衍为玄武，宋以后为避圣祖赵玄朗之讳改称真武。真武乃北方主水大神，黑色、仗剑、披发、徒跣，乃其特征。真武部下有龟蛇二将。印度偏入天也是北方主水大神，黑色，常卧大蛇上，蛇又幡于大龟背上。苗族高天上帝，亦有龟蛇为伴，墨西哥亦有龟蛇相伴之大神。

考其渊源实为西亚水主哀亚，哀亚之形式甚多，龟蛇亦其一。凡人类在野蛮时代，想象中之神貌多狞恶，且多为动物之体。人类文化进步，神亦逐渐变为温良，动物则转为部属，于是哀亚成为大神，龟蛇则成为其部下或使者了。有时哀亚为蛇而其妻唐克娜则为龟，这便是龟蛇盘结一处的“玄武”，不过哀亚故事最为复杂，我在《河伯》篇有详叙，在鲧禹治水故事里也有充分的发挥，现在只举小事一端，以见古书必须融会贯通才能看出道理。《庄子·外物》篇，记宋元君夜半梦有人披发而闾阿门，自称为清江使河伯之所，被宋国渔人余且者所得，乞元君救他。元君卜之乃是神龟。使人召渔人问之果得白龟，“其圆五尺”。千古以来读《庄子》的人知道这个披发的龟神便是披发的真武大帝吗？我们读苏轼《凤翔八观》诗，能知道那黑衣横剑，披发凛眸的翊圣将军便是真武吗？再推上去，我们能知道那个立于鳌背的魁星，所立便是巨龟，而魁星与伏羲、仓颉等又有相通处吗？台湾王爷人不知其为何神，我说他便是于《九歌》的河伯，是哀亚变型之一，因为王爷之龟，名甚著，供神红龟实宜专祭王爷，可是台湾人能知道吗？

其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全貌。我尝以为我国历史无非是一部帝王家谱，所详悉记载者一朝之兴废而已；所仔细铺陈者一代之典章制度而已；所津津乐道者圣君贤相之治绩而已；所反覆咏叹者文人学士之篇章著述而已；于民间之传说则恶其鄙俚而不屑加以采掇，于民间之祭典亦恶其不经而不愿一过问，凡此我可为杜撰一名曰“官方文化”。民间口耳相传之故事神话及不见经典之祭祀，小说、唱本、戏曲，更稍推广，则汉唐以来笔记稗史亦可包括其中。凡此可为杜撰一名曰“民间文化”。民间见官方文化之高文典册，煌煌不可逼视，每形秽自惭，不敢妄作攀附之想，而安于他们那一点可怜的文化圈子以内。我以为官方民间本为一整个，如鸟翼车轮，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于今则以成见为梗，尔为尔，我为我，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于是研究中国文化者乃大感不便了。你想索之官书吗？资料每苦不足，你想索之民间吗？又怕它荒唐诞妄，不足以取信。但研究楚辞或研究中国文化，民间文化实有不可忽视之点。

现在请再举例。伏羲者，古人固视为始制文字之人，与其妻女娲又皆属建立文化的圣王之一，不过他们的形状却是人首蛇身，太诡异了，一位圣君生成了这样一副尊范，实在叫人不敢领教。我国史家工于作伪，为什么不替他们掩饰一下呢？原来伏羲女娲作此形状，具有极大的传统，无法摇撼得动的缘故。这传统是什么？曰羲娲乃人类祖，凡人类祖必赋蛇形，笔者以前曾写过《希腊伏羲》、《羲娲人首蛇身的来历》，发表于《新生报》副刊，兹不赘述。

谓羲娲为人类祖，这便须借重民间祭典了。我国层叠地造成的上古史将羲娲列于三皇之后，三皇前又冠之以盘古，似乎盘古乃人类祖。但汉时刘歆作《世经》第一位君主却是伏羲，我们更看《列子·杨朱》篇：“自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年”；《陶渊明传》：“夏月卧北窗下，凉风暂至，自命羲皇上人”；《高士传》：“焦先，乃伏羲以来第一人”，都有视伏羲为亚当之意，但意义尚不明显，及参考民间祭典乃确然无疑。河南陈州相传为伏羲建都处，有太昊伏羲墓及庙，每年自二月二日至三月三日止，数百里内外男女老幼麇集伏羲墓庙焚香叩拜，甚至山西、山东、陕西等地的人民也不远千里而来，称为“人祖盛会”，且河南各县有为数颇多的“人祖庙”，供的都是伏羲。我们再证以苗瑶等族的神话，始知羲娲系以兄妹为夫妇者，正洪水以后第二代人类之祖。

我前面说官民文化各自发展，两不相涉，于伏羲事亦可见之。官方的史家仅说伏羲是古代一位圣王，民间却视之为人类之祖。建庙呀、建墓呀，每年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盛大祭典呀，完全无视于官书之存在；官方对于那个“人祖盛会”也奉帝王命来祭祀，却始终不将人祖二字见之官书。于是数千年来官民两方文化各自传衍，如泾渭之水并流一河，而判然分其清浊，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

民间保存古文化力量之巨伟，方法之巧妙，有时实远胜官方。譬如科举时代士子最为崇敬的魁星，是一个赤身鬼脸，手持一笔，独足鳌背上的神。我在《九歌·河伯》篇考证他是西亚水星尼波，他固是首创文字者，故手中持笔。所立之鳌实为巨龟，即其父木星马杜克所戮之原始深渊女怪。西亚作书用泥版，尼波之笔乃是一种槩（Stylus）或为苇管，所以尼波称为“槩神”（God of the Stylus）。尼波又是卜神，故又称“占筮苇管主有者”（Possessor of the Reed of Augury），传入我国后变为“夔”、“终葵”、“钟馗”，及为二十八宿里的“奎宿”，官方说“奎主文章”，但却把持笔的事忘了。民间的伏羲和钟馗间亦持笔，魁星之笔更为显著，但西亚尼波所持为槩，我们的魁星却是一支毛笔。槩和毛笔样子并不太相象，我们古神所持多规矩权衡之属，为什么不误为这类东西呢？但历代老百姓塑画魁星像者，却于不声不响间将槩变为毛笔了。若非老百姓确实知道这位神道手中所持者乃作书的工具，又何能如此呢？又水主哀亚乃是“智慧之神”是“文化的创始者”，尼波乃他的替身，文学之事固舍智慧莫属，所以我国历代奉魁星为科第的主保，民间这种选择也是可惊的。

又如孟姜女哭倒长城与娥皇女英哭舜而泪染湘竹有关，与西亚易士塔儿姊妹之哭旦缪子，埃及埃西姊妹之哭奥赛里士也有其渊源。因为孟姜女故事本是华周杞梁之妻故事的演化，原来是二女。白娘子水淹金山寺后被永镇雷峰塔，来源见下文。二郎神劈山救母策源于《山海经》，张衡《西京赋》

及扬雄《长杨赋》，亦将于他文述之。真武之披发乃民间传说却可于《庄子》中见其踪迹，保生大帝吴本起死人肉白骨，也可于相传老子与徐甲故事中，觅其端倪（《庄子·至乐》篇亦是）。

我们现在请再来谈谈禹锁巫支祈的故事。这故事民间盛传，朱熹曾于其《楚辞辩证》里加以讪笑，诋为不经之说。经我考证这故事渊源远而且古，我们的十三经廿四史抵不上它半分半毫。原来西亚有一篇开辟史诗，说水主哀亚用巫术催眠其仇敌阿伯苏（Apsu）以链锁而杀之。这篇史诗已有四五千年历史，但在其前尚有多种型式，有一篇系以哀亚为主角（今所传者乃以其子马杜克为主角），是说哀亚用链子将阿伯苏锁住而后击杀之的。

我曾考证这故事传至希腊为盗火者被链系高加索；传至北欧为叛神罗吉被链系于某山；传入我国则为《山海经》受梏之危危，斩前被械之蚩尤。

《山海经》有大禹锁巫支祈于军山一条，今本久佚，唐人《古岳渎经》记所系水怪曾被人曳出，引《山经》以证，我们始知。

其后演变为李冰锁孽龙，更变为许旌阳之锁蛟，法海和尚之锁白娘子。

西亚哀亚所锁阿伯苏是男神，但阿伯苏与其母原始女怪蒂马特实为一，所以我们说大禹所锁巫支祈乃女性亦可，今平剧有《泗州城》一剧，泗水的怪物是“水母”，这不就对了么？夫泗水锁水母仅凭民间口耳相传，历世之古乃在西亚相传四五千年创世史诗之上，民间文化的价值即不说远在官方之上，至少也该说是平等。

关于这个题目我的话已太多，说此收住，别的话将来再谈吧。

选自《屈赋论丛》

## 二

读某报副刊白勒斯著《神秘的百慕达三角》，甚感兴趣，全译本出版后立即购买。其后又在报上读到瑞士丹尼肯的文章，与白氏著作颇多相通之点，可算是姊妹篇。按报纸广告将丹氏所著《文明的历程》、《来自外太空的播种者》、《史前星际大战》、《史前文明的奥秘》四本书都买了来。阅读之下，觉得丹氏著作，远逊白氏谨严，但也不是完全胡说乱道，并觉得二氏之书，可与屈原作品相表里、相发明，是以有此文之作。

我知道读者乍看此文题目，定必失笑，以为苏某人研究屈赋真的走火入魔了。屈赋产生二千数百年前，白丹二氏理论则出近世，况其书并未得学术界承认，拉在一起来谈，岂不荒谬透顶？不过我要请读者少安毋躁，读完此文，再下评论。要知屈赋充满域外文化分子乃不争之事实，那些分子又来自史前文化，我使两者发生关系，并不悖于事理。不过读我此文，必先对拙著《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有很深的了解，对于白丹二氏著作也必全部阅过始可，这是要预先声明的。现在将本文分甲乙两部来讨论，眉目始可清楚。（甲）白勒斯著作与屈赋关系一、百慕达与离骚西海（1）阿特兰替斯与百慕达三角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有对话四十余篇，其中有《泰米西斯对话》（Timaeus Dialogue），系他与希腊立法者梭伦谈话的

记录。梭伦告诉他曾旅游埃及，某庙僧侣告诉他说：九千年前大西洋有一片陆地沉于海底。这片陆地未沉前，其文明发展甚高云云。这陆地名“阿特兰替斯”，原文为A t - l a n t i s，应译为“大西洋洲”，于今大家皆照音译，大概是为了地理图上无此地名，求免混淆起见，我也只好依样画葫芦了。

这陆沉地文明故事，至今尚流传世界各处。英国哲学家培根曾撰《新阿特兰替斯》(New Atlantis)，也是根据柏氏对话的。他故意说今日的美洲就是阿特兰替斯，沉没的话不可靠。他又假设一航海者飘流于大西洋，登陆一大陆地，其文化极高，政治风尚亦极优美，这是培根借此寓其政治理想的乌托邦，与我们所要谈的那个“失落的文明”，并无关联，只有搁开一边，以后不再提及。

阿特兰替斯沉没时间，柏拉图说是九千年前，那么距今约一万一二千年。沉没地点，据白著学者推测有大西洋、爱琴海、里海、北海，甚至德国、瑞士约有十余处。

所谓百慕达三角，据白著是“离开美国东南海不远的大西洋，有个三角形地区，北从百慕达，南到佛罗里达，在西经过巴哈马，穿越波多黎各，到达西经四十度之处，然再折回百慕达。这块地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未被人了解过充满神秘而困惑的地方，这就是通常所称‘百慕达三角’”(The Bermuda Triangle)。

于今在巴哈马岸边即百慕达西侧，有许多史前大石建筑，呈现各种形式，而由空中探测，则在海底又有无数像人工所造的三角形，圆锥形的几何形体，尚有类似大庙的基础，类似城垣、道路的痕迹。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学者皆认为沉没的阿特兰替斯，便在这个海底。

西藏古籍《达济安之书》(Book of Dyg-an)，也有公元前九千五百六十四年，在今佛罗里达与古巴之间，有一大陆沉没海底之说。我想这传说未必来自柏拉图的对话，实根据当时事实的传闻。佛罗里达与古巴之间，正是今日的百慕达三角。

(2) 百慕达三角便是海外的三角仙洲 距今约西千余年，巴比伦第一皇朝有刻于泥版的地图一块，大地正圆，大瀛海环其外。瀛海西边有三角形者三，东亦有一。相传这三角仙洲又名幸福岛或欢乐岛，乃永生不死神仙聚居之处。西亚文化今多渐灭，关于仙洲的记述，今“吉尔曷姆士(丹译祁加美)冒险史诗”，稍有涉及。诗言吉氏欲求永生不死之药方，远征幸福岛，晤见洪水后第二代人类之祖纳比西斯顿。绝氏告以生死乃自然大律。无人可以违背，有何不死方之可求？吉氏责问尔我同属凡夫，你何以独能不死？纳告以大洪水故事，并言己之所以永生者乃蒙神恩赐，他人不能援例。事见拙著《天问正简》(下简称《正简》)神话部分《绪语》，今改《最早的不死药故事》及乱辞“北至回水萃何喜”章。那篇史诗对于幸福岛景物并无何等描绘，可见那时西亚人对于写景的技巧尚欠修养。

这个大瀛海外的三角仙洲，其说也传衍及于天下。笔者十余年前撰《离骚新话》，有《离骚的西海及不周山》刊南洋大学中文学报，曾列举论证九项，说明传衍情况。其中有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之“西海福田”；海希奥德(比荷马晚五百年之希腊诗人)及罗马诗人韦琪尔之阿尼特史诗(被木马计破城逃出之主角)均言及的“西海幸福岛”；埃及“奥赛里士乐园”；苏格拉底之“大地上之奇山”；印度之“西方极乐世界”等等。传到我们中国便是“西海”。就是《离骚》屈原自述他自己离开大地中心的昆仑山，率领许

多随从，安排盛大仪仗，经过流沙、赤水，到了作为天柱的不周山，再向左转，而以趋向“西海”；为他那趟旅行最终的标鹄。“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所语即此。不周山是天的支柱，是在大地的边沿。想到仙洲，还须渡过大瀛海，但仆悲马怀，不能再进，他只好自海边投下海中自杀。（屈原自杀原在汨罗，此处则系幻想，不可不知。）

百慕达三角的海面照白著说并非三角，实为椭圆，甚至可以说是正圆，那么，为什么要称之三角？说“百慕达三角”是近代人所取，也不见得。这名字由来一定相当古老了。否则“死亡的三角”、“魔鬼的三角”诸语何来？凡是口耳相传的话，铭刻人们记忆反较文字记载为深，我有许多例子，今暂不表。那块巴比伦地图海外三洲是线条斩截的三角，也极足启人疑窦。仙洲形状作圆圈或不规则的块形均无不可，为什么要画作三角？这能说与百慕达三角没有关系吗？不过那仙洲的三角当不完全指海面的百慕达，而是指沉落海底的阿特兰替斯。那块大陆未沉前疑其地理形势作三角形，百慕达的三角之名，反倒是蒙此而然的。然则巴比伦地图，又何以作三个三角呢？我再作一大胆假设：恐是连南北两美洲而言。北美洲像个不规则的倒三角，南美洲则是相当整齐的顺三角，连沉没的阿特兰替斯恰好三个，这话远远传到西亚人的耳朵里，就把它们作为海外三角仙洲了，并画作并排的形式了。

这“三角”二字，古时声名甚大。西亚吉尔曼士冒险史诗说吉氏远征的幸福岛是一个三角洲（Delta），埃及奥赛里士的乐园名为Duat，也说是在西海外之三角洲。连我们中国都听到三角洲的话，东方朔《十洲记》言“昆仑上有三角山，方广万里，形如偃盆，下狭上广，故曰昆仑山三角……”《十洲记》有人说非东方朔所作，原文又错把大瀛海西边的三角仙洲搬到大地中心的昆仑，不过可见三个仙洲之为三角形，已很早传入中国。

（3）仙洲景物及其在水底冥界 西亚吉氏史诗对幸福岛景物无描写，传衍普世者则绘述较详。荷马的“西海福田”言其地四季如春，花树芬芳，果实繁盛，鸟鸣如天乐，凡人在世建有功业及英雄豪杰之人，寿终以后则来此福田，享受福报。统治者有弥诺士等三人为冥界判官。其他所言大同小异。柏拉图《斐都对话》（Phaedo Dialogue）：其师苏格拉底告以大地上有一境，处纯光明域。其中有大山、树木、花果，远比我们世界芳冽娱人，鲜明悦目。珍玉宝石珊瑚玛瑙，我们视为罕物且体渺小而数零星，彼境则填坑满谷，光辉更胜百倍。又有大珠作金银色，随地皆是，俯掬即得，犹此间之瓦砾然。其境气候温和，景物优美，人民呼吸为至清至纯之以太，从无疾病，寿命绵长。又有神庙，建筑庄严，神居世间，乐与人接，人亦乐于受教，故智慧德性皆高，视日月星辰皆知其奥秘……

印度西方极乐世界写得更详细，更美丽，当系后起，故能踵事增华，后来居上。

除苏格拉底大地之山外，其他福田，欢乐岛皆须于死后始能到。便是印度极乐世界也是人死之后，托生莲花，花开见佛。

我国三神山，见《史记·封禅书》书云：“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药皆在焉。其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这可见齐威、宣、燕昭为求三角仙洲，颇费了些气力。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费了无数金钱及人力，大规模入海求仙，并

无结果。汉武帝威服匈奴，通西域，知昆仑山之名，以为海外仙洲难于寻觅，昆仑也是神仙聚居，不死药所在处，所以遣张骞及其他使臣穷河源，图到昆仑，也没有什么结果。直到三国时代，吴孙权还曾遣了一支海军，甲士数万人，求夷州、鞍州，亦无功而还。海外求仙运动，至此结束。

我们知道齐威、宣、燕昭和秦始皇都是向中国东方海面出发的。因为据巴比伦泥版地图，大瀛海东也有一角。本来当也是三个角，泥版岁久湮灭，遂仅存其一。况《列子·汤问》篇第五，固言方壶、瀛州、蓬莱在勃海之东的“归墟”。归墟原来在大地之东。据白著，伊凡·山德森著《不可见的居住者》说地球上类似百慕达三角的危险区共有十二处，其中之一是日本东的“魔鬼海”(原书有图)，如此，则巴比伦泥版东边之角，有了交代。

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日本条引元代王恽《泛海小录》说由日本对马岛行八九百里至三神山，岛上居民皆徐姓，自云徐福之后。炎武已斥其为附会。

我们再转回笔锋，论《史记·封禅书》“三神山反居水下”的一句话。这句话真要教人惊喜得直跳起来，老天，这难道不正是沉没大西洋阿特兰替斯的传真吗？至希腊、埃及、印度言福田、福岛、及极乐世界，均云在冥界。冥界原也在水底。我的证据甚多，下文当略述。

在这里，我要着一插笔。“福田”英文是Elysian Fields，法文是Champs Elysées，其义亦为“极乐世界”，巴黎有一条天下艳称的林荫大道，即以此为名；法国总统府也以此为名。我想当时命名者应该都是博雅君子，为什么这些乐园原在冥界水底，都不知道，而乐以水鬼自居，深不可解。或者是指未沉没前的阿特兰替斯吧。

(4) 求达仙洲海途之困难 百慕达三角在过去廿六年里飞机船只相继失事，丧失生命者达千余人，所奇者，人物残骸，皆踪影不见。是以称之为“神秘”，以“凶险”，以“魔鬼”。那些机舰失事的原因，大家推测是被外太空人带走了，被居于海底的旧文明民族掳去了，或钻入天空或海底什么能入不能出的洞窟了，或进入四度空间了，或被海底能发强大磁力的水晶球吸下去了，这些话在未被科学确实证明以前，我亦不能深信。但机舰离奇失踪是事实，“死亡的三角”、“魔鬼的三角”、“霉运海”种种诅咒，当亦非由今始。并非白勒斯先生一个人造谣。我们若相信百慕达三角便是大瀛海外的三角仙洲，则自古以来便有难以渡过之名了。在吉尔曼姆士冒险史诗里称之为“死水”，吉氏乃半神之体幸得渡过，始达幸福岛。希腊人名此海为“苦河”谓有大毒，人不可渡。又云大瀛海乃有翼之龙所化，蛇有名曰Aibu，义为“仇敌”(The Enemy)专与人为难。《山海经》谓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郭璞注：“其水不胜鸿毛。”《后汉书·西域传》：“大秦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史记·封禅书》：“三神山者，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三神山……望之如云，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至云。”《秦始皇本纪》：“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士徐市，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能至。愿得善射者与俱，见则连弩射之。”这是说大地东边的神山之凶险，却也由西边神山反映而来。

我此文一段四节是做《百慕达三角与离骚西海》拦截八股的，这段八股拦截得很自然吧？

## 二、流沙赤水与白水

(1) 流沙与赤水 《离骚》：“忽我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以津梁兮，诏西皇使涉余。”中国古籍每以流沙与赤水并言。《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又“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又“西南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山经》原是域外传来的地理书，其中有事实上的地理，有神话上的地理。传入我国后，又混杂入若干中国地理，再也没有人能分析得明白，是以历来中国人目《山经》为小说家言。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历来相信昆仑有源出该山流入大海的四条大河。其实昆仑前身本是西亚阿美尼亚高原的阿拉拉特山，四条大河是否皆源出此山，未可考，而西亚人却是这么相信着的。那四条河分东西南北方向入海（事实未必是），《山经》有青水、赤水、白水、黑水的名目，每一色代表一个方向。阿拉拉特这座“世界大山，翻版遍天下。”详见拙著《昆仑之谜》，现不赘述。我以为那黑水之名，借自黑海，赤水之名，借自红海。所以四水应该各有其二。一个是河，一个是海，古人则皆以水名之。《离骚》此处的赤水，并非在两河流域境内的那道河，而是指红海。红海之名是自古即有的。《旧约圣经》红海之名屡见。摩西率领以色列人民数十万逃出埃及，上帝大显威力使红海之水分开，埃及军队追来则都被淹没，是件大事。红海之得名是因其色红。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云：“凡海水之色，大率都绿，惟东西二红海，其色淡红。或云海底珊瑚所映而然，亦非本色也。”可证。

流沙，当指阿拉伯大沙漠，我们看阿拉伯半岛的地图，半岛南端那个沙漠大得惊人。非洲北部之撒哈拉沙漠，其大为世界第一，而阿拉伯沙漠当亦可称第二，它连上叙利亚沙漠，几乎占了半岛一半的面积。这两个沙漠都正当红海之东。屈原《招魂》又云：“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糜散而不可止些。”我想这个流沙也指阿拉伯大沙漠。

屈原招魂时，身在中国，流沙自在中国之西。

我想读者一定要诘责我道：屈原自昆仑原身的阿拉拉特下来向西进行，想赴西海。自阿美尼亚高原直贯地中海而出至大西洋，岂不是一条捷径？为什么要到叙利亚、阿拉伯两大沙漠渡红海而入非洲，绕了这样个大弯，有何意义？这个我却不知道，辞人心理，谁能推测？或者地中海曾经陆沉过（见后），其凶险谅不下百慕达三角，自古无人敢行，非洲埃及古国，文化之高，足与两河流域媲美，两地又素有交通，屈原以前在邹衍那类域外来华的学者口中亦曾聆及，想去拜访一下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兽吧！再者他的旅行团若仅擦过叙利亚沙漠的边缘，自红海北端渡过，直贯埃及，利比亚古国，到达非洲北部的摩洛哥的“修达”（Ceuta），便到了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不周山（见后），绕的弯子也不算顶大。我们看世界地图便知。况屈原在《离骚》后半部作的原是“精神的漫游”，并非实际行动，我们大可不必替他的旅行辛苦担忧。再者红海中亦有流沙，见犹太经典摩西率以民渡海故事。（2）白水 《离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维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条白水是两河境内的幼发拉底斯，因其方向为西，故有白的名色。屈原登上昆仑的悬圃，原想直叩天关，奈帝阍不肯为他开门，只好怏怏而下，渡过白水，在昆仑境的阆风，将马系住，开始向那广大仙境内的仙女求爱，及一个一个碰壁，始听从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向西远征，以求抵达那不死之乡的仙洲。就是那三角仙洲。

这条白水是在昆仑境内也就是在两河流域境内。不过如我前文所说赤黑二水取名自红海黑海，则其余二水亦应同例。青水取于什么海，我尚未考出（或者即是藻海吧？），白水想必就是百慕达三角的那个奇异的白水。

白著说：“墨西哥海湾中在藻海和巴哈马附近，白水所发出的闪亮的白纹，也是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叫做萤光鱼的鱼群，经常在此游动，它的背部发出的亮光，闪烁水面而造成的；也有认为这由于墨西哥湾的地质是石灰质，鱼群游动而将石灰泥带起所致的。还有认为是水底无线电活动造成的。”当哥伦布第一次西航时，于太阳下山两小时，发现了白水。曾加以记录。美国太空人乘阿波罗十二号赴月球时，回望地球看见有一道白光，认为便是百慕达三角的白水。我记得当时报纸也曾记载过。试想人在数十万里的太空回望，地球已渺小得几乎不可看见，竟能见球上的白光，则其光强大可想。我以为必须聚七大洋水，水中又发数百万伏特的电力之光，或足致此，谓是区区百慕达海萤光鱼的闪烁，便太远于事理了。太空人所见地球上白光究竟是什么，将来能知，此时不必妄测。

《职方外纪》：“近小西洋一处，入夜则海水通明如火，西儒尝亲见而异之，持器汲起，满器俱火光；又滴入掌中，光亦荧然可玩，后来渐次替灭。”纪云“小西洋”，则所说或是百慕达的白水吧？

因白水有这么奇异，又在阿特兰替斯沉没处，西亚人遂取以名其四河之一河，并锡以嘉名曰“生命水”。

赤水，流沙，白水与白勒斯的著作有关，我所以写入此文，但屈赋白水是指幼发拉底斯河，而白著白水则是海，是不同的。

三、直布罗陀与不周山（1）直布罗陀海岬 说起这个海岬之由来，又不能免于神话。

古时人说天地各有柱撑拄，而古人又好以活物顶天载地。载地的是个巨鳌，就是大龟，这与本文无关，可置不论。顶天的是四个巨人，据希腊神话是盗火者柏洛美索士和他三个兄弟分立大地四极，以头顶著天体。

那四兄弟中的阿特腊士（Atlas）气力之大尤为有名。西洋建筑上的人形柱名曰Atlantes，以人形顶住大厦，即取义于此。我国战国时代的凤首盃，也是四个人形顶住盃身，想也受希腊人形柱影响。此器现存故宫博物院，读者若有兴趣，不妨去察看一下。

（请参考拙著《天问正简》一三三～一三五页）。

那个阿特腊士又相传是大地极西一个国家的国王，其国畜牧成群，园囿无数，有一大园，名曰“赫斯白丽之园”（Garden of Hesperides），园中有金苹果树，满结食之不灭的苹果。这种金苹果又是神话最大的课题，关于其故事均脍炙人口。

这大地极西之海，名曰“西海”（The Western Sea），这又可见《离骚》的及中国古籍的“西海”并非泛指，却是一个专名哩。今日大西洋原文为Atlantic Ocean，即由Atlas而来。沉没的“阿特兰替斯”也由他名而来。照荷马史诗说阿特腊士之国系在天海之底。

那赫斯白丽大园种种美丽景物，衍变为“福田”、“幸福岛”、“极乐世界”及“三角仙洲”已见前述阿特腊士顶著天体，俨然是个天柱，后来又说他不胜负荷之重，化身为山。

又说未化前与希腊神话里最著名的大力士赫邱利（Hercules）有过一段交涉。赫邱利奉命去取金苹果，请他指引，代顶天体片刻。又传衍

为赫邱利在大地极西安置了两座大岬作为天柱。据柏拉图、白里尼及其他希腊作家均言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北二岬是赫邱利拔别处之山置此作为天柱的，故名之曰赫邱利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此岬在今西班牙的西西里，出了海峡，便是大西洋。其地古时皆属希腊殖民地。人们视此处为天地边缘，望而生畏，再也不敢出海峡一步。

（2）不周山 《淮南·天文训》说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则不周乃天柱之一。

《山海经》的《西山经》：“又西北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郭注：“此山形有缺，不周市处，因名云。”《大荒西经》：“西北海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不周山又曰幽都之门。”

这两则《山经》文字均极简略。只有不周说明是山形不合，即是郭注的“有缺”及“不周市处”。又幽都门即是《旧约·约伯记》，上帝问约伯：“你曾进入海源么，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么？”我们知道大西洋的Atlantic Ocean又简称为Oceanus，义为“海泉”，又为“海源”，谓大地所有海洋皆源于此处。屈原《远游》“轶迅风于清源”，清源二字似亦指海源。死国亦在此处，而不周山所在则为幽都之门。这就无怪前面所说的一切福田、幸福岛、极乐世界都在水底了。就连中国民间极鄙俚的十殿冥王传说，十王也各居于海底礁石畔，见《玉历传抄》。

（3）共工头触不周 屈原《天问》：“鯀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共工与颛顼争帝，不胜而怒，触倒不周山天柱，见《列子·汤问》第五、《淮南·天文训》、《原道训》、王充《论衡·谈天》篇、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拙著《天问正简》“共工头触不周山”条言之尤详。

希腊神话里阿特腊士力大无穷，性情凶暴，到中国化而为共工。阿特腊士虽当过天柱而负荷天体，却没有像共工般捣过那么大乱。不过希腊神话对于阿特腊士的故事，本来零碎错乱，尚未编成系统，安知他没有干过像共工的事吗？况且他兴兵背叛天帝，原是个叛神呀！

共工触倒天柱后，天倾西北，日月星辰都集中天那一边了，地陷东南，百川水潦都奔注于地这一边了。总而言之：四极废，九州裂，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酿成了滔天洪水之灾，若非女娲出来补天止水，重整乾坤，这个世界完全毁灭，其祸之大，惊心动魄。我想这与当时“阿特兰替斯”之陆沉，是大有关联的。据柏拉图对话，阿特兰替斯之沦陷是地震，山崩，加以日夜不断的倾盆豪雨，洪水大发，于是这块大陆，沉没海底了。沉没是突然的，好像是一夕间事。沉没既是突然，料无一人民可以逃出，邻近南美洲的人，遂疑为天柱倾塌，而编造出像共工的故事。

日本东边不也是有个像百慕达三角凶险的“魔鬼海”吗？记得《列子·汤问》第五，说大地之东的归墟，本有五个大岛，各广三万里。归墟无底，此五山无根，常随流飘荡，天帝命禹疆以大鳌十五只，轮班负载，俾其安定。后被龙伯大人钓去五鳌。岱屿、员峤二岛以失鳌而沉于北极，仙圣播迁者以巨亿计。这场浩劫也非常惊人，龙伯大人当是共工的演变，他们同是巨人。

看列子记载，似乎魔鬼海远古也有些岛屿像阿特兰替斯陆沉。

但天下固多巧合之事，却未必巧合至此。我想列子所记，恐怕是大西洋那边的故事传来的空谷回声而已。

我向来以为巴比伦泥版三角仙洲出于想象，共工故事也出于想象，现在才知道都有事实为之根据。白勒斯先生的书，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并

对之有许多攻击，现在应该知道尚有些价值了。

(乙)丹尼肯著作与屈赋关系丹尼肯先生虽著了四本书，学术界毁誉不一。关于他的书，我想将来另撰一文评论，现在仅就其与屈赋有关的几个节目，提出来谈谈。

### 一、天与地

(1)深渊 屈原《天问》“洪泉极深，何以窺之？”洪泉即是洪渊，唐避高祖讳，改之为泉。洪渊就是西亚人所谓深渊。西亚人说未有天地万物之前，整个空间为无边无际的大水所充满，名曰“深”(The Deep)丹尼肯“来自外太空的播种者”(下简播种者)五十六页有一幅自秘鲁陶器上复制下来的图，就是说大神在深渊中创造天地故事。

那两幅图是连环画，右边的一幅表示神在深渊中指挥作战。三神乘成朵黑云，云似在波涛汹涌之海上。中间主神一手执一类似电话听筒之物，一手执西亚神像常携之提囊，囊底朝上。背后一僚神似执一小棒，及似就口待吹之笛。主神前面一神将执鸟状物。主神与神将之间，空中虚悬一莫能命名之武器。空间小黑点无数，代表深渊之水。

第二幅，即左端一幅，一大魔顶盔贯甲，右手持大椎，左手执盾作抵御状，盾上蟠大蛇一条。魔身前后有奇异飞行物三，对魔奋勇夹攻。空中有一两头龙屈作天穹。天穹上下也有许多黑点，表示天内外皆水。

我国汉代也有一石刻，左一大神，载高冕，左手执类似大囊物，右手持大椎，乘成团之云，其前小神亦分两行，各持长索，想备以缚魔者。中间神将二，乘成簇黑云，怒发飞立，向前攻击。图右众小神将一双头龙屈作天穹，尚有神升穹顶用索捆绑。天穹下，魔之原神跪伏于地，一神以椎与凿击之。图之右端，乘云神将甚多，云中亦有鸟形物，并有一神手持杯状物飞空中。

这幅石刻人物繁多，富有动态，原无题名，我题作“大神屠龙创世”。拙著《屈原与九歌》采之为封面，因它可与《东皇泰一》篇马杜克屠龙创世事互证。及《天问正简》出版，想再觅一幅汉刻作封面，再也找不到像这一幅构图之佳的，只好照旧采用。凡读过我这二本书者，想都已看见过了。

两头龙也可说是虹，因为古人说虹有两头，似驴，能下饮涧水，甚至入人家窃啜浆粥。

麽些文字虹字正作两头驴首之形，我曾写过《涧虹饮涧》一文，发表《畅流》半月刊。至于秘鲁陶器和我国汉刻，则不是虹，因有神魔交战的大场面。

世界古人都说整个空间充满大水，那种设想，真太奇怪了。但据科学家说，我们这个地球初自太阳中脱出时，热度高至一万二千度，一切元素皆游离空中，不能发生化学上的化合。及热度逐渐下落，氢与氧始拼化成水，在大地大气层外圈成为海洋，但一切海洋皆虚悬空中。以近地的温度比几千哩以外的高，洪水才降即化水汽蒸发了，必待热度再降，那空中的海洋才能化大雨降下。那大雨片刻不停，狂倾猛泻，彼时整个地球成为洪水世界。千百年的混乱过后，洪水涌向低洼处成为地面的海洋，山川陵陆始逐渐出现。照这样说则古人深渊之说，能说不是指大地未成时，海洋虚悬空中的状况而言吗？

印度的《大楼炭经》，《起世经》“……起大重云，遍覆梵天世界(虚悬空中之海洋)既遍覆既，注大洪雨，其滴甚粗，或如车轴，或复如杵，经历

百千万年！——有大风起，其风名阿那毗罗，吹彼水聚，混乱不停，水中自然生大沫聚——如此辗转吹水沫造四大洲，八万小洲”（地球造成）。所写的又岂不是这种情况吗？

奇怪的是：古人怎会知道呢？

（2）地圆 《天问》：“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方字乃分字之误，我在《正简》中已解说过。坟者系指大地并非平面，乃是作隆起之形的。我在正简里已引过《易经·说卦》：“坤为地，为釜。”釜者乃覆釜，中高而四下。又引《周髀》学派：“地如覆~劓\*中高外下。”并有古印度人大地图为证。汉以来言天者有盖天、宣夜、浑天诸说。浑天者言天地之体如鸡卵，天包地外，如蛋白之裹黄。既说地如蛋黄，当然是圆的了。柏拉图《斐都对话》（*Phaedo Dialogue*），曾记其师苏格拉底对他说：大地之体圆形，居天中，重力平衡，日星环绕，故得不欹不坠。不待空气及他力维持也。又云大地有如皮球，十二块合成，各有异色。巴比伦泥版三角洲的大地，是正圆的，而且滴溜滚圆。

丹氏《史前星际大战》，说在南美厄瓜多尔隧道，看见一个元前九千年到四千年的石制护身符。一个人手捧日月，站在地球上。球上经纬线刻画分明（二页）。在他的《史前文明的奥秘》又将这件石刻重映一次。

这都可见地圆之说世界古人早已知道。可恨后代子孙不长进，反说天圆地方。中国古人以玉器象天地者，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注“璧圆象天。”“以黄琮礼地。”注“琮八方礼地。”《淮南·天文训》：“是故天不发其阴，则万物不生，地不发其阳，则万物不成。天圆地方，道在中央。”宋玉、唐勒等大小言赋所以不敢信为战国中叶作品者，因《大言赋》有“苍天为盖，大地为舆”语。盖圆而舆方。系采用《淮南·原道训》“以天为盖，以地为舆”之说。纬书有一条就曾驳斥此类说法，谓假如地方天圆，天是覆在地上的，那么地的四只角不是覆不住了？纬书之富有科学知识可见，所以我屡次赞成刘师培拥护的论调。

西洋虽未言地为方形，但以为是扁平之体，不信其为球形。四百年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闻当时人地圆之说，为之大笑说：若真如此，则所有海洋之水，怎存留得住，岂不流泻得点滴无存吗？又说听说地球下面也有人，人倒挂著怎样能生活呢？

（3）大瀛海 《天问》“天何所沓？”及“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都是说明大瀛海的。我在《正简》里疏解“天何所沓”条，曾举埃及、印度、西亚、希腊、希伯来及战国邹衍之说，谓古人相信我们的天仅覆在瀛海向内边沿而止，瀛海以外的仙洲，与我们的天无干。“沓”者合也，就是问天与地在何处相合。

世界古人都说环抱地球之瀛海乃是有翅之龙，中国名曰应龙。希腊名瀛海为“河海”（*River Ocean*），言其抱地循环而流如河。《天问》“河海”二字，系直译希腊原文。也许希腊是沿袭西亚的吧？屈原在《九歌·山鬼》篇用“三秀”来音译酒神松果杖 *Thyrusus*。在这里又用“河海”，义译 *River Ocean*，文胆之壮，远胜不敢题糕的刘郎。真把后世章句小儒吓死！

丹氏著作常引西亚吉尔曷姆士（祈加美）冒险史诗说祈氏好友恩基度乘鹰升天，下视大地：大地像山陵，海洋像湖泊；再视，大地像麦片粥，海像水槽（《文明的历程》六三页）。又引依泰那乘鹰升天诗，下视陆地像一座

山，大海则像一条河流；再下视：大地像一个圆面包，大海像盛面包的篮子（《史前文明的奥秘》十一至十三页）。祈加美史诗，现暂不论，依泰那因大地妇女都不孕，升天求生育草，下视陆地见海洋环绕地球，如衣带绕著人腰。所指海洋都是大瀛海。丹氏学问虽渊博，脑子里似尚无大瀛海之观念，一心只想到史前人类乘机升空所见陆地光景，海洋像湖泊，像水槽，怎能表出大瀛海的景况呢？……只有地像置于盘子的圆面包，海洋如篮稍正确。据我所见另一本，依泰那第三次下瞰地球，见大地如置带水之碟，其小如拳，周围水光一圈，莹然照眼。则更正确了。

（4）清气与以太 屈原《九歌·大司命》：“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这清气又名精气。《远游》：“精气入而粗秽除，”又曰：“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希腊神话言神仙所呼吸者为至纯至清之气，名曰以太（Ether）。古希腊书中常见以太这个字。像柏拉图《斐都对话》，苏格拉底谈大地奇境，即言彼境之空气，犹之吾人之海水，彼处之以太，乃当于吾人之空气，是他们日常所呼吸的。丹氏在其《史前星际大战》一书中，也说外空人在其原住星球上发生大战，战败的一群，寻觅逃遁之处，发现我们这个地球尚差强人意，即驾太空船莅止，但地球空气恶浊为他们所不惯，只好经常载着防毒类面具，所以我们在穴绘上所见外星人常载着头盔，穿着臃肿的衣服，佩带着呼吸仪器之由来云云（一九九页）。试想彼时地球地旷人稀，林木浓密，并无工厂至各种废气将空气染污，而外星人仍不惯，恐无此理。所以丹氏之说似不可信。

## 二、人祖及洪水

（1）人祖蛇形 屈原《天问》有《旧约·创世纪》故事，人类元祖亚当，在《天问》为安登，人祖母夏娃，在《天问》为女媧。“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体，孰制匠之”一简文字，即指此而言。女媧有体二句，旧注谓女媧人首蛇身，一日七十变化。但夏娃在《创世纪》里则仅一凡人，并不会变化，所以我说二句是暗指夏娃之体是上帝取下亚当一根肋骨造成而已。

丹氏《播种者》一书说外星人来地球，将人猿改造为人类，但当他们离去不久，这类新人种不忘兽习，又与其他种类杂交，遂致产生各种奇形怪状的畸人。他说这种堕落应归咎于老亚当身上。外星人回地球时见此形况大为震怒，将这些变种一概消灭。这或者就是基督教所谓“原罪”的意义云云。

又说《卡巴拉》一书乃元前千二百年的记录，其中有一则说在亚当之前，上帝曾另造一男人，此人与蛇交合（一六九页）。我也在某一宗教神话见说根据犹太法典谓亚当有一魔妻，其形如蛇。丹氏则说犹太法典曾细述夏娃与蛇合欢事。丹氏并言：他在一个尼泊尔陶器碎片上见一胴体丰满的女人与蛇尾纠缠一起的图画（一七九页）。如此说来，则亚当夏娃与蛇都有不正常的关系了。我在《天问正简》的《自序》中曾说：“普世人祖皆半人半蛇，或人首蛇身，而伊甸园中的一对，则是完全同我们一样的血肉凡躯，毫无异状”，引为欣幸。

谁知这一双贤伉俪仍不免为蛇的耻辱。真是哪里说起的话！不过，我们若不想做人类元祖则已，想做，则这份耻辱，是非接受不可的。全世界谈到人类元祖，无不与蛇有关。可不是像犹太经典和丹尼肯先生所相信的与蛇合欢，而是元祖本身就是半人半蛇，或人首蛇身的。我在《正简·（后羿射日神话）》篇论之纂详。历举曾为人类元祖的西亚水主哀亚；旦纆子与金星

神易士塔儿一对情人；埃及奥赛里士夫妇；印度摩纽；及希腊凯克洛甫士及中国伏羲女娲为证。伏羲女娲本系神话人物，其后渐变为历史人物，算是开物成务的圣君，但对于他们之人首蛇身一事，却从来无人敢于抹煞。可见这件事具有撼摇不动的权威。为什么普世言元祖定要教他们作此异相？神话学家谓阴阳二元素为万物之源，交蛇姿态即表此种意义，或者像丹尼肯所说古时代有一种飞蛇教的关系，但不如像我在《河伯》篇所说水主哀亚为人类祖，为文化之创始者，他具鱼、蛇、羊、龟诸形，言人祖者仅采蛇之一形而遗其余，当是此说最古最普遍。

丹氏看见尼泊尔陶器碎片一个具有蛇尾的美女，以为即是人与蛇交之证，不知那蛇的下半段是生长在美女的腰下，人蛇原属一体，如何可以合欢？若陶器是完整的，则他当看见另有半人半蛇身之男性，则他的推测的结果又将不同了。（2）生命树 生命树是伊甸园中最重要的节目，我们谈亚当夏娃，不妨连带在此提它一笔。《天问》：“何所不死？长人何守？”我解释说“所”字当是“树”字之误。因《天问》问题从不重复，在地理部分已提到“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问的便是不死国（“不死之国”、“不死之民”皆见《山海经》大荒南经、西经），不应在此处重问一次。况《海内西经》提到昆仑，有“不死树”和“圣木”，不死树便是生命树，圣木便是智慧果树。长人是守生命树之天使，上帝恶亚当夫妇违背命令，将他们驱出乐园，而以一把四面轮转发光焰的剑置乐园东首，使基路伯把守。

我在《正简》里固曾说西亚石刻常有带翅天神守神异之果树，我国汉代武梁祠石刻亦有带翅天神守果树图，当皆与《旧约·创世纪》有关。丹氏《史前文明的奥秘》搜集此类石刻甚夥；如三页、三一页、四一页，都是相当精致石刻。那生命树美化得像丝带络成的工艺品，亏他认出是树。特别是四一页三幅中之中间一幅，一男一女相对而坐，中一带果之树。

女之左有一蛇。这是从西亚人印章上拓下来的，现藏大英博物馆。夏曾佑《中国上古史》有介绍，谓即是伊甸园故事。民国四一年，我游伦敦，特在该馆购得拓片。据馆中人告我，这个拓片虽有男有女，有带果之树，有蛇，但据学者考证与伊甸园故事无关。我那张拓片相当模糊，丹著这一张倒异常清晰。右边男人，头戴牛角冠，照西亚惯例，是神而非人。又那张脸中间裂开一缝，像有前后两副面目，莫非是木星神马杜克？那么与他对坐的女人是其妻 Serpanitum 了。亚当夫妇未受魔蛇诱惑时，都是赤身露体的，此图中男女则衣冠楚楚。此图既由印章拓下，而印章则是西亚商人记录财产之物，当然不会有题目。“诱惑”二字之题，不知丹氏何所据而云然（见三三页）？又女左之蛇，蜿蜒缘壁而下，并非盘旋树根，谓盘旋树根者，又是丹氏记忆的错误。（3）洪水 《天问》：“鳌载山”，何以安之？释舟陵行：我郢冢 俊笔侵复蟻\*水及挪亚方舟故事。中国谓大地为巨鳌所负载，鳌即龟，鳌'舞则地震，地震则洪水发，\*晷形“陵衍”之误，言两山平处。相传方舟在洪水退后，搁于阿拉拉特两峰平行处。

史前洪水之事，普世皆有，约有六十余则，我国正经正史及苗瑶少数民族所传又四五十则，合计在百余则以上。洪水成因，学者说法不一，丹氏则主张外星大战时，失败的一群逃到我们这个地球上，犹恐胜利那方面的追踪，一面遁入地下隧道；一面在太阳系第五行星上故布迷阵，作调虎离山计。胜利者遂将第五行星爆炸毁灭，所以今日火星与木星间有一条三亿哩长的非自然的裂口，数千万块石块布满其间。天文学家颇感困惑，认为火木两星间

当有一行星爆炸。但不知何故爆炸。丹氏则说行星不能自己爆炸，那是人为的。又说由于第五行星毁灭，我们这座地球地心引力失却平衡，脱离原来轨道几度，结果造成可怕的大洪水泛滥（《史前星际大战》一九九～二〇〇页）。这真是“夸海口”、“说天话”了，谁又敢认为真呢？

笔者以前尚不敢信史前果有淹没大地洪水之说，现在意见改变，认为一定有，否则何以普世各民族众口一词传说着这个话题呢？不过洪水成因，未必如丹氏所论，以前有第四冰河及地中海陆沉诸说。第四冰河期有人说距今五万余年，或更早，那时人类尚在石器时代，无文化可言，我以为地中海陆沉比较有理。地中海何以陆沉呢？这与万二千年前大西洋阿特兰替斯之突然沉没海底能说没有关系吗？地中海与大西洋遥遥相对，阿特兰替斯那片大陆沉海时，大海水位定必高涨，海水由直布罗陀海峡灌进来，便把人民繁庶，物产丰饶的原来一片陆地变成海了。当然所淹没的不止那一处，不过别处洪水退去，陆地仍然显露，而地中海则永远是海罢了（地中海原为盆地，一万年或三万年前淹没，西洋许多学者皆如此说）。

### 三、巨人与大石文化

屈原《天问》：“何所不死？长人何守？”那个长人系指天使，不必论。《招魂》：“魂今归来兮，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屈原将长人安置于东方，是因《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国”或者列子龙伯大人的故事，三闾亦有所闻。因蓬莱五山都说在大海东方归墟里，像负周围三万里大山的巨鳌。龙伯一钓便是五只，其身量之长大，整个地球也承载不起，当然是神话的夸张。一仞八尺，千仞就是八千尺，也太长了些。唐人编的《法苑珠林》卷八有个长短人表，长者至千万丈，短者仅数寸，当然不足信，不过照史前所遗大石文化，巨人恐怕是有的。笔者以前曾写一篇《原人坟墓与巨人》（原收《蠹鱼集》，今收《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里）。谈到大石文化，又谈到爱琴海米森尼城垣，谓西洋史家说古代希腊半岛有一种族，身裁气力皆比普通人大，名曰巨人（Cyclope），米森尼城垣想系此类巨人所筑。这话被当时也涉猎希腊神话的左翼文坛巨头茅盾笑个不亦乐乎，说Cyclope原系希腊神话人物，某人居然当传真人，其谬可想。其实我的话也无非根据法国某史家所说。某史家并谓希腊神话的Cyclope，当以此族人为根据而加以放大的。

根据地心吸力定理，谓古代巨人不可能有，若有，则其胫股承担这种重量，必至寸步难行，且至断折。不过地球有个时期是恐龙世界，龙身皆长四五十呎，梁龙，达八十四呎，巨龙则竟长过百呎，也许有个时期是巨人世界。像龙伯大人那样，当然不会存在，照中国尺码，二三丈或者有吧。不然，那些今日遗留全世界的巨石文化，如何解释？

丹氏在南太平洋复活岛看见六百来尊石像，竖立海岸，各高六十呎上。石质皆属极其坚硬的火山岩，距离竖像处也有一大段路。当时岛上土人怎样能用石斧石凿从岩上将大块石头切割下来？拿什么工具来雕刻这些石像？那类石块，我们今日的起重机尚不能举起，当时如何搬运？如何竖立？

他曾与一友共作试验，雇工多人用石斧猛敲岩壁，石斧粉碎，岩壁不动分毫。石人还有帽子系红色土壤和碎石制成，每顶也有十吨重，不知当时何以竟能抬高戴到石人头上。

还有许多地方的大石文化遗迹，现不逐一引述。

丹氏主张巨人是从火星来的，因火星地心引力没有地球大，故火星人

的体型也远比地球人来的笨重。又说做这种大石工程的工具都是外星人所遗。火星来人的话，我们不敢轻信，工具的话倒值得研讨，这真是个难解释的谜。四、神祇及其器用

(1) 飞仙 屈原《远游》：“仍羽人于丹邱兮，留不死之旧乡。”羽人就是有翅膀的人，人不会生翅，则非神明莫属。屈赋里的雨师萍号，风伯飞廉，其在西亚之前身，无不有翼。风伯至称“鸟神”，到中国还是说“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也。”我在《正简》里曾说：“鸟类飞翔空中，生活自由，西洋某学者至发为奇论：谓鸟类为一切生物中之最进化者，虽人类亦望尘莫及。古人对于鸟类当然更为歆羨，所以他想象中的鬼神精灵，皆作鸟形。”(二页)又云：“全世界神话人物，无论神魔，大都有翼。《旧约》天使亦无不有翼，今基督教艺术天使仍有之，可谓痕迹之仅存者。我国古时所谓‘飞仙’、‘羽人’皆指此。汉武帝封栾大为五利将军，使其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使者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授印，示不敢臣。后世称道士曰‘羽士’曰‘羽流’，称仙去曰‘羽化’、‘羽解’，皆存其遗意，惜人们对羽字的真正意义，已在若明若晦之间。”(三六四页)

丹尼肯先生所收集生翅神明画像与刻像甚多，《史前文明的奥秘》尤为丰富，指为地球土人对外星人形体之描绘。我窃不敢赞同。要知外星人能航行数百光年到达地球，则其科学进步已达高点。他们要飞翔空中，自有轻便的飞行器，要身体上生长着或佩带着笨重的翅膀做什么？

(2) 肥胖的女像 除了我们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皆有肥胖的女像出现，名曰委娜斯。就是希腊神话的阿弗罗蒂特(Aphrodite)，罗马曰委娜斯(Venus)，乃爱神兼美神，属天上的金星。在希腊罗马，此神美丽无比，但在数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则臃肿不堪，丑陋吓人。若说是非洲人对女人的审美观念，则此类女像之出土者并不限于非洲。

据丹氏书在法国的加维德、劳塞尔、莱斯彭；南土耳其的古库卡；乌克兰的柯斯梯安基；奥地利的维伦道夫；德国的彼德斯佛斯以及其他各地，都有发现(《播种者》四十页)。丹氏说是外星人将雌性动物用人工制造并在蒸馏器中培养的结果。其实委娜斯固属于爱情之星，但她也属于肥沃及母性之神。野蛮人将她形容这样痴肥，无非是谷物丰饶和子孙繁衍愿望的具体化(《屈原与九歌》三一六页)。不过古人或有以肥硕女性为美之观念，《诗经》“硕人”、“硕大且卷”，可证。

屈原《天问》后羿射日神话介绍雨师妻和妾。妻为无头女神，即《山经》的刑天，曰：“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协字当是戚字之误，即刑天舞戚干。接着两句：“平胁曼肤，何以肥之？”即指雨师妾，也即是上述的委娜斯。“平胁”乃“爱奶”之错，爱义为长，《史记》“李广爱臂”。“曼肤”就是说她肥胖。丹氏又好像不懂委娜斯所以肥胖之故，乱说外星人在蒸馏器所培养的女性。外星人难道没有爱美观念，将女性创造出这副可憎的模样，是何道理？

(3) 有角的鬼王 屈原《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鬻鬻些。”近世长沙出土墓中人俑，其头上生的角，歧嶷如鹿，吐舌长达地。丹氏《播种者》九七页，记意大利卡蒙尼加出现的人像头上之角也如鹿角之歧嶷(见《文明的历程》一二二页)。又记外蒙高更五世的古墓，有刻像头上长着错杂的角，当也是鬼王之形。中国人至今画鬼，头上尚长着两只肉角，而活无常则吐舌唇外。台北南海路历史博物馆收藏出土陶像，

其头生两角，吐舌唇外者，为数甚多，皆死神像用作殉葬人俑者也。西洋人画或雕刻魔鬼像，也要叫他头上长着两只角。

#### (4) 神仙的器用

(A) 天式 这是神仙的武器。《天问》“白蜺婴弗”到“大鸟何鸣”二简八句是叙印度诸天搅海神话。王逸不得其解，捏造了个崔文子与王子侨的故事，十分可笑。搅海神话是说神魔合作搅海取得不死药，神食言不以分魔。一魔幻为天形，窃饮其药，偏入天急祭轮宝斩断魔头，魔以咽药仅至喉故，身虽死而头则永生。《天问》“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天指偏入天。我国佛经以“天”字译天神，如大自在天、大梵天、吉祥天，那延罗天等。大概梵文“天”字为“提婆”(Deva)义为光明、自然、清静之所。但天神亦名提婆。《金光明经疏》：“外国呼神亦名为天。”想不到战国时便已如此，岂不可惊？偏入天的轮宝原文为Disc，国人有译为“圆板”、“圆形物件”者，本亦未误。但其那个Disc在偏入天手中旋转不息，中国罗盘上圆片，名“式”，一作“栻”，也是能旋转的，所以屈原译之为“式”。这个译法真好极了，非大文学家如三闾者不办。想不到两千数百年后的现代学者竟将这个法宝译为“圆板”、“圆片”，或“圆形物体。”那个法宝祭起时在空中横飞三匝，然后直落人身，故曰“天式纵横”。

若说此种圆板形武器乃由石饼或金属饼演化而成，则这种东西掷出仅可杀敌一人，掷出后即不能收回，以为武器，岂非太不经济？但神明却偏偏喜用。埃及神像头上辄顶一圆板，拥以牛角二只，初疑其表神顶之圆光，而神话则谓为实体。相传奥赛里士之子霍鲁斯(Horus)兴兵与其叔赛特大战，以报杀父之仇，战不利，将败，头上圆板忽飞下，两角变两翅，火焰耀目，直冲敌阵，当者披靡，遂转败为胜。印度神佛顶上亦有此物，后却真的变成圆光了。偏入天的轮宝，梵语斫羯罗(Calera)飞空时，自生风火，威力惊人，印度神话最为乐道。

西亚神常居轮形物中。南美所发现的壁画，神或居圆圈，或居星球状物里。丹尼肯一概指为外星人的飞碟或飞球，我们看神话里这类物件，自生火焰，旋转不息，倒真像飞碟，况前文已说过，铁饼类武器，掷出不能收回，人似乎不喜用，人既不用，则神亦无从取法。若此，则印埃轮宝可议。或者神仙法宝掷出可以自然收回吧？不过说外星人万年或数百年前即曾来过地球，是件疑案，姑予保留为妙。

(B) 神仙交通工具 屈原《九歌·湘君》篇“驾飞龙兮北征”，又曰“飞龙兮翩翩”。屈原《离骚》“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丹氏书中说古代飞蛇之车就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埃及太阳神常乘船游空中，又说是太空船，其实屈赋的飞龙车，另有典故，乃土星神之车，与外星人没有关系。

要谈人类升空所见太空景象，屈原《远游》末段倒真足以当此，不过也是古人的幻想，并非事实，当于他文论之。 结 论

丹尼肯氏说南美是文化的发源地(《文明的历程》第九章)，以马雅人及印加人文化之古及其天文历法知识之高，为证。这一说是相当有道理的。不过我要更进一解：我以为与其说世界文化起源于马雅印加诸民族，无宁将这项绝大荣誉颁给那个“失落的文明”，就是沉没海底的亚特兰蒂斯。这片大陆之沉没距今一万一二千年，未沉前其文化进展之高，柏拉图屡有称述。其人民生活之幸福，也颇像苏格拉底所描绘的大地之山及古印度人的郁单越洲(印人谓大地分四洲即郁单越洲、阎浮提洲、弗婆提洲、瞿陀尼洲，以郁

洲最好)要知大地之山和郁单越洲都在大地上,并非神仙境界呀!

阿特兰替斯文化发展究竟到何程度,我们难以深知。想象她的人民能造太空船,飞到银河深处,一定不会;说已达到我们今日的标准,恐也未必。不过我想已很高。她的文化辐射到全世界,而墨西哥秘鲁等处,因地理较接近,所以马雅印加进步较早。东渡大西洋而及未陆沉前之地中海。到了后,即向四方扩展,南被埃及;东被两河;又渐及印度;同时由苏末人带到我们中国(我曾说域外文化两度来华,这是第一度,时间尚在夏商以前)。不过那时候阿特兰替斯早已消失于大地了。

或者要说你素来主张普世文化同出一源,其源皆策之两河流域,现在又这样说,则你的立场岂不要全盘更改了吗?我以为小作调整,未尝不可,全盘更改,则也不必。史前文化痕迹模糊,史后者则斑斑可考,历历可指,我的立场是站在史后文化上,史前史后,两者是大不相同的。

六四年七月廿日写毕

选自《屈赋论丛》

### 三 从屈赋看中国文化的来源

中国文化究竟是中国人关起大门创造的?还是曾受别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大问题。

以前有若干外国学者对这问题加以讨论,第一派主埃及说,谓不但中国文化自来埃及,中国人也是埃及的苗裔。第二派主巴比伦说,其说曾使我国学人发生莫大兴奋,著论附和,如丁谦、蒋智田、章炳麟、刘师培等人皆是。其中刘师培主张尤烈。第三派主印度说,谓中国文化系由阿利安种之首陀罗人所传入。第四派主中国文化必源於另一较古民族,谓巴比伦、印度、中国的文化,均为现已消滅的某一古老民族所传授。此外尚有数家之说,现暂不论。

以上几派理论初发生时虽耸动一时,但论点粗略,且颇多乖谬,不久便都被推翻。於今欧美学者對於我们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兴趣颇浓,上古史则少人过问,大概以著手不易,想中国学者自己研究一个结果出来,但中国学者也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我是主张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是同出一源的。廿余年前,我撰写《昆仑之谜》便曾大胆宣言道:故以夏禹为中心,而中国古史问题可以解决;以昆仑为中心,而中国古代地理及中外交通史问题可以重新估定;以屈原《九歌》、《天问》为中心,而中国天文、地理、历法、神话及战国整个学术史问题亦可迎刃而解,三者合并之结论,首要者为证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次要者为证明“中国古史混有外来神话及历史之成份”及“战国学术思潮乃外来文化刺激所产生”,由是,则先秦史地与文化史皆将全部改观,其关系岂不诚重且大哉!

十余年来,我研究屈赋的结果,上述这几条理论愈来愈得证实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几支古文化,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希腊、希伯来等果然

同出一源，换言之，中国文化并不是孤立的，是世界文化的一支。那么在上述各文化中，中国文化是蒙受哪个影响呢？我是主张第二派说法的，但不说是巴比伦，因为两河流域，并不止巴比伦一国，比巴比伦文化更古的还有，我只笼统地说是“两河流域”或“西亚”。我研究屈赋的结果，中国文化与西亚文化完全像一个模子倒出，当然是直接从西亚来的了。中国文化与希腊、印度、埃及、希伯来也有其相同之点，这是因为这几支文化也受西亚影响的缘故。

在先秦典籍里，我所发现的证据大小不下数百，现仅从我所撰《天问正简》引论里，举其荦荦大者二十余端，先谈一谈，余者待我的《屈赋新探》全书写成，自然可以看到。这荦荦大者二十余端虽然不全出於屈赋，却都自我的屈赋研究中辗转引申而出，所以我此文题目名曰《从屈赋看中国文化的来源》。

### （一）洪水故事

屈原《天问》：“鯀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是讲共工触到不周山导致洪水的事。“不任汨鸿”至“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是讲鯀禹治水事。全世界都有洪水的传说，虽有详略之不同，文野之差异，而大略皆谓上帝或创造主创造人类之后，见人类作恶多端，自悔造人之事，乃降洪水将人类消灭，逃出水灾的子遗之人，便成了第二代人类之祖。

（1）西亚 梁启超《太古及三代载记》，附《洪水考》，言五州皆有洪水之传说，独埃及、波斯、巴比伦古传记不见有洪水之迹，这话是不确的。西亚有好几种洪水传说。一、巴比伦祭司裴洛苏士（Berossus）用希腊文撰写开辟故事，曾言及洪水。他说洪水前有一君王名Xisuthrus在位时，得土星神克洛诺士（Cronus）梦中指示，谓将有洪水消灭人类，乃造一船逃出此祸。二、苏末人遗下文件，言大神恩利尔（Emilil）与智慧之神哀亚（Ea）为仇，欲以洪水淹杀之，哀亚乃造大船，携妻唐克娜（Damkina）子马杜克（marduk）及部属多人，乘之脱险。三、西亚有吉尔曷姆士冒险史诗（Epic of Gilgamesh）言吉氏为伊拉克国主，感於生命无常，欲赴大瀛海外之三角仙洲访求不死药，遇人类第二代始祖Pir Napishtin自述大神恩利尔憎恨人类欲降洪水加以消灭，因他是个义人，智慧神哀亚指示他造船携眷，逃出这场大灾。（2）希伯来 《旧约·创世纪》挪亚方舟故事，众所共知，从略。

（3）回教 《古兰经》言安拉将降洪水前，命义人努海造舟携其眷属及信主之人，生物则雌雄各携一对，水发，飘泊多日，其后舟泊於朱定山巅而免。

（4）波斯 《波斯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言某年大雪，冻凝世界，雪融则化为洪水，大神叶马（Yima）教义人文提丹（Vendidad）如何逃生。（5）印度 有人名摩纽（Manu）救一鱼，洪水将至，鱼教摩纽造舟得免。摩纽遂为第二代人类祖。但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对洪水则又有一种说法。（6）希腊 史家阿坡罗多尔（Apolodoro）所纪洪水故事系天帝宙士将降洪水，陶可新（Deception）及妻辟拉（pyrra）得盗火者柏洛美索士（Prometheus）指

示，造方舟逃出。夫妇掷石以为男女，人类复繁。奥韦德（Ovide）《变形记》（Metamorphoses）亦记其事。另有故事则言阿加底（Arcadie）王乘兽皮所缀之艇脱洪水灾。又有某地国王则赖一鹤之指示，溺水得生。此外则裴倭替（Beotie）、阿替加（Attica）、底比司（Thebes）诸地言其开国之主皆曾遭洪水厄。（7）叙里亚所传洪水故事与希腊陶可新大略类似，谅系同一故事所衍。某城有一天后庙，庙前一潭，谓洪水之退，系由此潭所吸吞。每年二次，海水自此潭涌向天后庙下，以纪念水灾云云。

（8）欧洲洪水故事甚多，但皆不出挪亚方舟型式，殆受《创世纪》影响者，兹从略。

（9）北欧日尔曼神话谓有巨人伊弥尔得罪大神布尔，布尔杀之，所流血为洪水，独有夫妇二人获免。

（10）美洲土人所传洪水亦属挪亚型。且有巴别塔，谓人类造塔企图登天，塔将成辄被雷震塌，因上帝不欲人登天。（11）中国古代典籍好像有四次洪水灾。第一次是伏羲时。见《淮南·览冥训》：“……然犹及宓牺氏之道也……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载，地不周覆，火灾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於是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女娲为伏羲妹，相传继兄为王。则伏羲时有洪水。第二次是颛顼时。《列子·汤问》第五，谓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遂有洪水之祸。《淮南·天文训》、《原道训》亦如此说。《山海经·大荒西经》与《海内经》颛顼女娲并称，亦言及洪水之祸。第三次是尧时。《虞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第四次是舜时，《淮南·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盖命禹治水者为舜，故《淮南》不得不将洪水安排於舜时。梁启超《太古三代载记》谓：“古代洪水似有三度，伏羲神农间为一度，少昊颛顼间为二度，尧舜间为三度。相距各数百年，为祸甚烈，实则仅有尧舜之一度。其《洪水考》谓“综什鲧禹两代，至少已历十七年（鲧治水九年禹八年），据《汲冢》、《竹书》，共工衔命治水又在鲧前四十余年，则尧时共工前后历岁殆逾六十。要之斯役必稽时甚久，故种种诞说，缘会而生。”梁氏不信伏羲颛顼两次洪水为真，因其非正史所载，笔者则以为其实即尧舜时洪水又何当靠得住？除官方纪载外，我国西南部的苗、徭、傩、罗、夷人，直到交趾支那、印度中部，所传洪水故事不下四五十则。大概谓某家长膝下有儿女一对，仇家发动洪水，淹死家长及人类，仅兄妹得脱，乃结为夫妇，再造人类。

外国学者研究全世界洪水故事约有九十余种，尚不包括中国的在内。若将我国官民两方者加入，则当有一百数十则以上。

洪水成因，梁任公谓大抵为地球与他行星或彗星彳道偶尔偈错，忽相接近，致全地球之水见吸而涨。外国学者有主冰期冰河溶化之现象者，有谓第四期冰河溶化将地中海一带陆地淹没，致成今日之地中海，子遗人民四散奔逃，带着这个恐怖的回忆同往，遂成为传遍世界的洪水传说。今日学者又谓西亚替格里斯及幼发拉底斯两条大河，每逢春夏必然泛滥，为害极巨。四五千年前吾珥（Ur）与古修（Kish）曾遭极大水患，至于陆沉。今发掘得冲积土层数层，证实此说。两河流域既为文化摇篮，则洪水故事当由西亚传至普世。（二）十日故事

《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是叙十日故事。洪水与十日也是世界性的，我国所传则较详。十日故事先要看《山海经》。因《山海经》将十日的渊源叙了出来。《大荒南经》第十五：“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东经》第十四：“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群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出，一日方至，皆载于乌。”《海内东经》第九：“……下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似说我们这个世界，以前原有十个太阳，都栖在扶木上，每日一个太阳由乌鸦之背，载运出去，独照世界。十个太阳轮流执行任务，总要等第一个太阳回到扶木上，另一个才出去。

后来适值神魔之战，那十个太阳受魔方怂恿，同时并出，于是将神方一位名女丑者——即女娲的另译——炙杀了，女丑的丈夫颛顼也似乎同被炙杀了，发生了洪水之祸。颛顼夫妇得其十个儿子十巫操不死药救活，神魔双方于是展开了一场大战。后羿将九个太阳射落，仅余一个太阳。

十日与洪水是有连带关系的，这可于《大荒西经》第十六看出。经说“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雨泉，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此文有两个“颛顼死即复苏”，我主张第一句的“颛顼”乃“女丑”之误。因女丑被十日炙杀，得十巫救活，经有明文。且颛顼乃男性，何得说“是谓鱼妇？”“风道北来，天乃大雨泉”即洪水之谓。《淮南·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载，地不周覆，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积芦灰以止淫水……淫水涸，颛民生。”所谓淫水便是洪水，洪水时代居然有火。而且那火还是“炎而不灭”的，岂不奇怪？然则此火当是十日并出时所致之灾了。

《虞书·尧典》说洪水发生于尧时，《淮南·本经训》却有“逮至尧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万民，而民无所得食。”

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猓”的一番话。

洪水原是共工与颛顼争帝，失败后，头触不周山将天柱触折，天塌下来跌碎，天顶上的水都流了下来，地陷东南，地下的水又向上涌，因此造成了洪水的大祸。因此我们可作判断，所谓伏羲便是颛顼，因为他们的妻子同是女娲。所谓尧与舜时代的洪水，也即是颛顼时代的洪水，四次洪水，原来只有一次。所以《淮南》所谓尧时十日，即是颛顼时的十日，《山海经》女丑颛顼故事便得到贯通了。梁启超先生洪水之患延绵六十余年，那个计算该推翻了。

我国西康僰族有《创世纪》，言古时有六个太阳，七个月亮，太阳光芒过于强烈，晒干了地上的水及草木，生物皆渴死。有英雄曰支给阿耳，用箭将六日七月都射跑了，于是九年九月中没有太阳及月亮，仅有微微的星光，有阿山我叔布者到某山找着某人，叫他到天与日月相商，白昼一个太阳，黑夜一个月亮出来照明世界。以下说创造人类故事，又说洪水故事，说洪水共有二次，与《旧约·创世纪》虽有文野之不同，但大体不相远。方舟、巴别塔都有依稀的痕迹。中国西南贵州苗族有射日月歌谣，谓古时共有八日八月，石溶树焦，阿热难受。有英雄名扬亚斫岩桑为弓箭，射落七个日月，各留其一，人们始能生活。又有开辟歌，谓有六个铜匠，七个铁匠，以石头炼为铜

铁，打造天地，炼金银造八个太阳及月亮，多余的金银屑则撒向天空为繁星。八日月嫌太多，有英雄射落其七，仅各余其一，不敢露面，使牯牛公虎呼唤之亦不敢出，最后使公鸡唤之，始出。

湘西苗民则说古时有十二个太阳及月亮。亦有说两个者。印度人亦谓古时有十二个太阳。英属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则说法与中国同，谓有十日。被天狗吞其九，存其一。西亚吉尔曼姆士冒险史诗，义人Pir Napishtin对吉氏说大神恩利尔想降洪水前，使地祇们以大火把将大地先乱烧了一通，想必即是十日说的变型。再者纪元前二千数百年阿迦底有名王名拿哈姆辛(Maram Sin)有一纪功碑，刻一戴牛角盔之武士持弓步上峭崖，碑上端镌完整太阳二，残缺太阳一。此碑上端已崩一角，否则太阳当不止此数。天无二日，何以竟有二三？想戴牛角盔之武士乃射日之天神。西洋考古学家谓为拿哈姆辛自己，恐误。印度民间虽有十二日之说，惜未能知其详。佛典中的《楼炭经》，又名《起世经》，即印度开辟记，这世界末日，七日并兴，将世界烧成劫灰。又印度《乳海的搅旋》说日天子苏利耶，月天子旃陀罗因瞥见阿修罗中之罗缙盗饮不死甘露，以告诸天。偏入天掷出轮宝，断罗缙头。罗缙身体死亡，头则饮甘露至喉部故，飞上天空，永生不死，怀恨日月告发，每追逐而吞噬之，日月蚀由此来。日月见诸天坐视不理，愤极，发出极其强烈的光芒欲将大地焚毁，幸大梵天命大鹏金翅鸟展开大翅遮蔽日光，大地始得保存。这想必也是十日说的变型。

希腊没有十日说，但有法艾顿(Phaeton)借日车故事。法艾顿乃太阳神阿波罗与海女仙所生之子。因被人嘲笑非神种，上天借父日车巡游天空以自证。谁知年幼不谙驾驶，日车驶离地面太近，几将大地焚毁。这恐怕也是十日说之变。又希腊尚有尼奥璧(Niobe)故事，因她夸口说自己生有十四个子女，胜于仙后丽都。丽都哭诉其子阿波罗，女狄爱娜，子女替她报仇，将尼奥璧所有子女一顿射死。笔者曾在香港出版的《大学生活》上发表《射日与射月》一文，说恐与中国古书“射日”及与我国苗瑶所传“射月”的故事有连带关系。(三)神魔大战故事

神魔之战见《天问》“萍号起雨”至“何逢长之？”共四简十六句。西亚神魔之战，见于他们的创世史诗。谓天地未成形以前，充塞整个空间者乃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水，是曰“深”(The Deep)，即是深渊。经过无穷年岁，深渊生一女性之精灵，名曰蒂亚华滋(Tiawath)，又曰蒂亚马特(Tiamat)，不夫而孕，生出许多儿女。其半为未来之天神，其半则为女怪之党。天神想建立宇宙秩序，终日喧议，女怪恶其扰，兴兵与战，初则屡败，后乃练兵十一队与己共为十二队，将与天神决一死战。天神闻之大惧，且接战亦屡不利，幸智慧神哀亚有子曰马杜克，又曰弥罗岱(Mero-dach)奉命出战，斩女怪，分开其尸体，半造天空，半造大地，又细细析其节肉骨骼，造成天地间的各种事物。西亚这部史诗创史主角，换了好几次？天帝阿努(Anu)地主兼暴风雨神恩利尔，智慧神哀亚，均曾轮流为创造主。及马杜克成为巴比伦主神，又轮到他当主角。我们今日所见较为完全的史诗便是他的传记。

希腊神话有天帝宙士(Zeus)与魔头普非良(Porphyrion)及其人首蛇身之部属大战。魔鬼形状极其丑恶可怖，有三头，五十头及百头者；有遍身皆臂膀，遍身皆眼睛者，腰以上为人，腰以下则两条巨蟒，收梢处非蛇尾而为蛇头，行动迅疾如飞电，缠住敌人，张口便咬，魔鬼气力

又绝大，能拔起大树横扫敌阵，攀倒山崖，磔石以投敌人，天神苦战后始能将其克服。

印度佛教大行后，万神领袖已非因陀罗（I n d r a），但佛经中仍有天帝释（即因陀罗）大战阿修罗事，其规模之壮阔，想象之恢奇，叙述之生动，辞藻之美丽，情节之曲折，更驾乎西亚希腊之上。这当是经过许多文人修改润色的结果。据说神魔间的战争是像人间世一样，是时常发生的。

北欧神话也有神魔之战，但不像希腊位置于宙士初为天帝时，而是位置于世界末日，神魔经过大战后，同归于尽。

中国颛顼战共工，黄帝战蚩尤，夏禹战三苗，其实是同一母题的衍化。颛顼的敌人共工战败而触倒不周山，这能说是一个凡人吗？在《山海经》里，共工演变为贰负。贰负者叛变、携贰、负心之谓。西亚亦称魔头为叛逆者、负心者，可见《山海经》里贰负乃是共工的浑名。黄帝时的蚩尤相传为苗族领袖，但也是魔怪型人物。《龙鱼河图》谓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铜头铁额，食砂子。又会呼风唤雨，驱使猛兽，又能造五里雾。若是人，何能如此？《山海经》里黄帝与蚩尤之战也是神话。如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雨师风伯，纵大风雨。黄帝下天女魃以止雨等等。

凡神魔之战，魔方每拔大树，磔岩石以抗敌，前文已叙。《河图》谓蚩尤“剥木为兵”，“以木石为兵”，传说兵器都是蚩尤造作的，故蚩尤为“兵主”，兵主在外国语为战神。既造有各种兵器，何必又用木石？但古人仍然要教他“剥木为兵”，“以木石为兵”，也可见这个传统说法无法抛弃。印度天帝释与阿修罗战争之事见于《阿含经》、《法华义疏》、《经律异相》等，而《法苑珠林》五，综合诸说，叙之最详，却未见阿修罗拔木拔山事。但印度两大史诗言及神魔之战时辄言魔拔大树，掷山峰以抗敌人。我也曾见故宫有一天帝释与阿修罗战争之图。阿修罗军队正在战败，所拔之树木与山峰乱掷地上。此当是仿印度人所作图画而作者。因想到屈原《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兮”所指便是巨魔。希腊神话，魔鬼有许多头颅，屈原仅以“九”数括之。希腊神话巨魔乃天神敌人，屈原却说他们是天帝的门卫，谅别有根据，惜今莫考。项羽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原来是有出典的。

所谓力士仅止于“扛鼎”、“手裂虎豹”，拔山则非人力所能，因之也不会作此联想，若无出典，楚霸王也不会有此说法。

英国诗人弥尔顿（J . M i l t o n）原是十七世纪的人，他写《失乐园》（P a r a d i e s L o s t），叙述叛魔军队与天使的战争，当叛魔没有武器可以制胜时，也曾拔起大树，攀倒山峰向天使攻击，可见这两件事，是神魔之战中，万不可少的节目。（四）世界由混沌开辟《天问》“曰邃古之初”至“何本何化？”共三简，十二句。所言乃宇宙由混沌开辟事。

“混沌”一作“浑沌”、“\*隘”，又作“浑沦”、“混芒”、“混冥”。《庄子·应帝王》篇“中央之帝为浑沌”谓为无孔无窍的浑然一物。李善云“清浊未分也，比喻自然。”

所谓清，是指天，浊是指地。”《左传·文公十八年》传：“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注“不开通貌”。这与庄子那个无孔窍的中央之帝相通。可见战国时代的人，对于开辟前的状况已有混沌这个观念了。屈原《天问》：“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椅 虺 我允吨 俊备 得髀\*开辟前的宇宙是上下未形的，是冥瘳昏暗的，便是所谓“黑漆一团”的样子，《列子·天瑞》篇说得更清

楚了。曰：“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

庄子言：“古之人在混芒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陆德明《经典释文》“混混芒芒，未分时也。”未分时即天地未分时，《淮南子·俶真训》“大通混冥”，也是指黑漆一团的宇宙。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注：“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所言也是“混沌”。

西亚言天地未被造成前，虽曰是一片大水，但也说是漆黑一团的混沌。渐将这个混沌加以人格化，成为女性精灵曰蒂亚华滋者，称为“混沌孽龙”（The dragon of Chaos）。希腊神话亦谓最古之神为混沌，而此字又含有“洪荒”、“混乱”、“昏暗”之义。

印度谓最早之世界，浑然如一金卵，其后乃由卵中逐渐爆出今日万象纷纭之世界云。

（五）开辟以来分为十纪汉纬书《春秋命历序》谓自开辟至于获麟（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分为十纪。那十纪是（1）九头纪，（2）五龙纪，（3）摄提纪，（4）合雒纪，（5）连通纪，（6）序命纪，（7）修飞纪，（8）因提纪，（9）禅和纪，（10）疏讫纪。每一纪为二十七万六千岁，十纪共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引《春秋纬》，又谓十纪共为三百二十七万岁，魏张揖《广雅·释天》，则谓自开辟至于获麟共为二百七十六万岁，三种说法数目略有参差，想有传抄之误，无关宏旨。

罗泌《路史》、马~兑锺贰贰 跛 锻饬汀返龋 阅 邮榭呈榷暗兰 揖 湮J 停\*各系以古帝王之名，排成系统。近代刘师培等又因摄提、合雒、循蜚、疏讫好像是译音。坚主十纪系从西亚传来，将发音百端附会。语见刘氏遗著，不详引。

照我的意见，十纪果从西亚传来，附会译音则大可不必。何以说是从西亚传来的呢？原来古代巴比伦史家将历史分为“洪水以前”、“洪水以后”的两个时代。洪水前据说有十代帝王，每人统治年代三四万年，七八万年不等。希腊史家某氏曾得到一份，即以入其著作中，是为最早见知于世者。其后考古家到两河发掘，又获甲乙两表，帝王名及城邑名稍异，然同出一源，则无疑问。希腊史家所得表共有十位帝王，统治年代共为四十三万二千年。近代所获两表，甲表共有八位帝王，统治年代共为二十四万一千二百年，乙表共有十位帝王，统治年代共为四十五万六千年。

西亚十纪总共不过廿余万年，或四十余万年，传到中国居然扩充了十倍。凡一事流传久远，每每如滚雪球，愈滚愈大，自然之事。此表虽见于纬书，但恐系在战国时传入者。我们现在，请将中国与世界相同的有关天文地理的问题，来谈一下。

#### （六）天地各有九重

《天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时何功，孰初作之？”我们现在对于天体的观想，除却科学的不说，普通人民认天只有一层，玉皇大帝和整个天庭及王母娘娘都住在天上，若对他们说天有九重，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但古代世界，几个有文化的民族都说天有九重。

屈原《天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又说“九天之际，安放安属？”《离骚》和《九章》也常有“指九天以为正”的话。《淮南子》：“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

其不著“重”字而有其意义者，为《孙子·形势》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上下相对而言，显然有极高极卑之意。《淮南·务修训》：“今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是两末之端拟，可以为公论乎？”“顶”与“底”相对待，也有极高极卑之意。

九重天实出于西亚，西亚开始时言天仅七重。即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及太阳月亮，各占一重天。西亚人常建七星坛即所以象征七重天。其后又变为九重。但当时望远镜未发明，太阳系内更不能发现其他行星，乃以蚀为第八重天，彗星为第九重天。这是参考印度人的天文历法而知道的。

印度婆罗门文化的颂歌常言九重天，佛教兴起后变为三十二天。埃及与希腊，九重天的说法不甚明显。回教则仍言七重天。

不但天九重，地亦九重。战国人九天九地之说，即可看出。屈原《九歌·大司命》：“导帝之兮九阍”即司命夫人引导司命到九重地府，中国古有九幽的辞汇，即九层幽都。易林“天地九重，尧舜治中”。言天地各有九重，尧舜则于人间治理天下。印度的十八重地狱是九数之倍，其后演变为一百二十八狱，九数始湮没。希腊地府亦有层次，见荷马两大史诗。惟仅言至四重而止。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言天十重（第十重天不在数内），地狱九重，为倒立之圆锥体。但丁《神曲》多受古代希腊文化思想，说法是相当重要的。（七）黄道十二宫及九曜黄道十二宫我国自古而有。屈原《天问》：“天何所沓，十二焉分？”古称“十二辰”，又称“十二岁”，又称“十二次”，与西洋天文十二宫相当。外国学者每言中国十二辰实自巴比伦传来，遂有中国文化西来说之倡导。其说甚繁，兹不细论。九曜本为七曜，即日月五星。这是与七重天有关系的。除去日月外，五星排列的次序却并不像我们口头所说金木水火土，而是水火金木土，或水火木金土。

（1）《夏书·大禹谟》“德惟普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水、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2）《周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穡。”

（3）《左传·文公七年》：“晋却缺言于赵宣子曰：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这六府。”（4）《史记·封禅书》所言齐地八神将，除地主、日主、月主外，是天主（水）、兵主（火）、阳主（木）、阴主（金）、四时主（土）。

《大禹谟》、《洪范》等本是有问题的文章，但伪书也不是完全凭空写出来的，书伪，而资料真，事所常有，像这种五行次序竟与世界闹合，不能说不奇，这是值得注意的。L 剖传入中国的印度九执历，九曜值日的顺序为“日、月、火、水、木、金、土、罗日侯、计都。”罗是蚀，计都是彗星。《大日经疏》则水居火上，当是受我国影响。今日西洋一周是：日曜（Sunday）、月曜（Monday）、火曜（Tuesday）、水曜（Wednesday）、木曜（Thursday）、金曜（Friday）、土曜（Saturday），曾见一小手抄本的《太平天国记》，将七曜顺序也改为日、月、火、水、木、金、土。想必受西洋周序的影响。（八）天柱地柱

《天问》“八柱何当？东南何亏？”是说天柱。“洪泉极深，何以妍之？”是说地柱。

古人以为天有柱子撑住，地也有。中国言天柱是八座大山，不周山亦

在其内。共工触倒不周，天柱断折，天便塌下来了。但较早当仅有五柱，中央一柱为昆仑山。昆仑居大地之中，正与天门相对。若能登上昆仑的峰顶，便可进入天庭了。《离骚》屈原假设他到了昆仑的悬圃，正想进入天门，谁知竟为帝阍所阻。希腊言顶天者为四巨人，其后演成大力士阿特拉士（Atlas）顶天的故事。埃及亦言天有五柱，四方四，中间一，人想上天，可爬上中间的天柱，因上面便是天门，仍须济之以梯。故埃及人墓中，每备一梯，以为灵魂上天之用。

地有四柱广十万里。见《河图·括地象》。印度为四象立大龟背上。见《圣经·序论》插图，地亦有如山之柱。古代欧人则地形扁平，承以多柱。

#### （九）天地上下皆水

西亚人相信天地未造成前，仅有一片茫茫无际之大水，名曰“深渊”，前面已说过。及马杜克屠魔创世，以魔尸造天地万物，天地仍在深渊中，不但地下有水，连天顶也有水，马杜克派遣几个神灵，专司天之窗牖，以防天顶上的水漏到地上，成为水灾。亚述的“雨”字为Metru，便是“天顶水”（Waters above the Firmament）。巴比伦洪水故事示梦义人者乃是智慧神哀亚，但亦有谓为太阳神侠马修（Shamash）者：说天顶洪水即将下降，扫荡地面上的生灵。埃及神话，洪涝初辟时有四对大神，有一神名Nu，乃深渊之精灵，其妻名Nut，则为月星之母，亦为苍穹顶上之水。希伯来人的创世纪挪亚方舟故事，洪水发作时“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四十昼夜，大雨降在地上。”洪水消退，是“上帝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约伯记》谓上帝在深渊中造穹苍，又说天上的天，天上的水都要赞美上帝云云。天主教圣经学会所译《创世纪》有一插图表示古代以色列人的世界观。天地都在大水中间，而天则有几个裂口，即是天窗，也即天闸，我国民间也有天窗之说，谓天窗如人家窗牖，可以自由启闭，要下雨则将窗打开，让天顶水流下。共工故事说共工将天柱触倒，天倾塌下来，跌碎，致天顶上的水流注地上而成洪水之祸。女娲炼石补天，水祸始止。

《圣经》尚有一插图，天有两层，中间是水。第一层天有许多洼隆起伏的形状，我断定这便是屈原《天问》所说的“隅隈”。不过天却不在水中，而浮于水——即深渊——上。

《春秋元命苞》：“天如鸡子，天大地小，表里有水。天地各承气而立，载水而浮。”葛洪主浑天之说，谓“天地载水而行”，又谓“天出入行于水中”，又谓“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葛洪的“天地载水而浮”，“天出入行于水中”与前述希伯来第一图相合，但“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则仅地载水，天则浮于水上，与前述第二图相合。

（十）地上大河与银河相通天地既皆在水中，则地水自可与天水相通。但世界古文化民族都喜主张自己国境内最大河流为圣河，而此圣河源自天上，下降大地时先入幽都而后再出地面。西亚的幼发拉底斯是条圣河，发源冥界，而冥界又上通天庭，则其源当在天上。《新约·若翰启示录》若翰说“天使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下流出来。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树果和树叶，可为医治万民疾病之用。”那条河便指幼发拉底斯。回教天园，指天堂也指地堂，天园下流出四河，《旧约·创世纪》伊甸园也有四条大河流出。

印度恒河系自天上流下先入地府，再出人间，见《罗摩耶那》（Ram

a y a n a ) 史诗。

中国黄河据《山海经》是发源幽都，但又说黄河水与银河相通。张通《博物志》，宗懔《荆楚岁时记》，《集林》，遂有海客乘槎穷河源至银河会见织女，得支机石而归，及张骞穷河源乘槎上天会见牛郎织女云云。李白《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即根据此说。

希腊神话世间亡灵先至银河，金杖之神赫梅士引导之入于地府。也许是亡灵先上天到了银河，然后沿着希腊的唯一大河亚切劳斯 (Achelous) 而下来的。但希腊神话未说，我们也不便附会。

(十一) 大瀛海环抱大地大瀛海的说法是具有世界性的。

(1) 中国战国时有所谓大瀛海之说 《史记·孟荀列传》，邹衍主大九州说，又说大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绕之，这便是天与地的相合处。屈原《天问》：“天何所沓？”王逸注云：“沓，合也。言天与地会合何所？”这与邹衍所说“天地之际焉”，意义相同。

(2) 西亚 西亚在极早时代，即苏末与阿迦底民族活跃时代。言有围绕大地之海，名曰“大瀛海”，又名“洪渊”。巴比伦人则称大瀛海为“似蛇之水”(Snake like)，他们有时竟指实此水为蛇。蛇有名曰Aibu，义为“仇敌”(The enemy)，巴比伦古图大瀛海最为明白。

(3) 希腊 名大瀛海曰“河边”(Rvier Ocean)，以其能周流为河也。

“河海”二字居然到了中国。《天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在希腊神话里，大瀛海又人格化为有翼之巨龙，即中国之应龙。

(4) 埃及 埃及人谓世界为一大圈所围绕，此圈名曰“大海(Ocean)”。

(5) 印度 在《摩罗耶那》史诗里讲到恒河诞生因缘，有诸王子超升天界后，将永不至他处。有如在大瀛海之水抱大地云云。至佛教兴起，则谓为大咸海，在第七金山外，地狱在焉。

(6) 希伯来 称大瀛海为“黑暗之蛇”(The Serpent of Dark-ness)，又称“混沌及混乱之子”(The Offspring of Chaos and Confusion)。(7) 北欧 北欧神话谓环绕大地的为米嘉大蛇(Midgard Serpent)，至世界末日，蛇亦为扰乱乾坤者之一。(十二) 大地中心称脐，仙山居脐上古人常以为他们的国家位置于大地正中。而其境内最高之山则居于大地脐上。

(1) 西亚 西亚古代文化最盛，其王每自称为“万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又曰“四极之主”，今有巴比伦古地图，他们的国家处于大地正中。又他们的阿拉拉特大山也处于大地正中，虽以文献残缺故，没有脐之说，但我们可以别说来补。

(2) 回教 回教源阿拉伯半岛，其承继之文化亦与古巴比伦有关，故亦自称回教策源地天方为大地之正中。刘智《天方典礼》言之甚详，又引西谚云“大地如磨盘，天方盘之脐也。”

(3) 希腊 谓阿坡罗预言圣坛所在地迭尔腓(Dephi)为世界中心，神殿中有一大而有孔之圆石称为Omphalos，译为脐，意即“大地之脐”(Navel of the Earth)。(4) 印度 古时称Benares为圣城，谓其处大地正中，为“世界之脐”。又天竺自称中国，

及摩揭陀 (Magadha), 强盛后亦自负为“中国之中国”。六朝《夷夏论》、《戎华论》, 对此问题引起热烈讨论之兴趣。

(5) 其他 日本山阳古代称为中国。又南太平洋有一山岛, 名麦达杰克, 别名“特弗蒂卡那”, 意即“大地之脐”。十八世纪起, 为荷兰航海家所发现, 改名复活岛。见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6) 中国 《史记·封禅书》“始皇祠天主于天齐”, 曰:“齐之所以为齐, 以天齐也。”苏林曰“当天中央齐。”索隐曰:“顾氏案解道彪《齐记》云:‘前城南有天齐, 五泉并出, 有异于常, 言如天之腹齐也。’”陈侯因次月, 因即因齐。而字亦即脐字。齐本姜太公之国, 后大夫田氏得势, 战国初篡国, 号曰田齐。陈田古通。泰山应天中, 即对着天的脐眼, 它自己也非居地的脐上不可, 则中国古时泰山定必居于昆仑之地位。

### (十三) 地分九州

九州之说, 中国自古即有。也是从域外传来的。古中国人名之曰“九有”, 见《商颂·玄鸟》; 又名“九围”, 见《商颂·长发》。《禹贡》有九州之明文, 书不可靠而资料则真。《天问》:“地方九则, 何以坟之?” 即指九州。战国时, 邹衍又倡大九州。谓“儒者所谓中国者, 于天下乃八十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之内, 自有九州, 禹之所序九州是也, 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 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 如一区中, 乃为一州, 如此者九, 乃有大瀛海环其外, 天地之际焉。”这里几个中国, 把人搞糊涂了。原来中国有几种说法, 一是齐国。齐即脐, 脐居人体正中, 齐国居大地脐上, 当然要自命为中国。《孟子·滕文公》上:“陈良, 楚产也, 悦周公仲尼之道, 北学于中国。”《离娄下》:“得志行乎中国。”孟子时在齐, 此中国乃指齐。二是夏商周三代政治活动之中心, 即黄河流域之地。《大雅·荡》:“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女颁榜于中国, 斂怨以为德。”《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 天下犹未平……鸟蹄兽\*\*之迹交于中国。”“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滕文公》下:“当尧之时, 水逆行, 泛滥于中国。”三是指与外国相对待的中国本部, 《荡》:“内于中国, 覃及鬼方。”中国与鬼方对言, 当然指本部。又《大雅·民劳》:“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孟子·梁惠王》“莅中国而抚四夷”亦然。

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的中国, 是邹衍所居的齐国。名为赤县神州的中國, 是中国全部。

这个中国内包禹所序的九州。与赤县神州并列者还有八个大州, 可惜邹衍未举其名。但《河图·括地象》:“昆仑之墟下洞合赤县之州, 是为‘中则’, 东南神州曰晨土, 正南邛州曰深土, 西南戎州曰滔土, 正西吉州曰并土, 正中冀州曰白土, 西北柱州曰肥土, 北方元州曰成土, 东北咸州曰隐土, 正东扬州曰信土。”《淮南·地形训》并有大九州之名, 与《括地象》稍异。

巴比伦有一古地图, 大地作圆形, 中有一圆圈, 黑色, 似指两河流域, 余八圈则为中空之圈, 处正东者三, 东北者一, 正西者二, 西北者一, 正南者一, 正北则无。圈外皆海, 当即邹衍所言之裨海, 裨海更有一大圈环绕大地, 当即是大瀛海。

埃及、印度是否有大九州之说, 今无可考, 暂缺。希腊有九州之说见傅斯年遗著, 惜未言其详。

### (十四) 昆仑与四水

据《山海经》西山及海内西经，昆仑是有四条河的。那四河：一、河水，二、赤水，三、洋水，四、黑水。又有什么弱水、青水。《淮南·地形训》则较为齐整，四河是河水、赤水、弱水、洋水。

今日中国地理上所谓之昆仑，乃汉武所定。汉武帝求昆仑不得其处，与朝中诸臣，参考古图籍，以于阗之一山称为昆仑。近代外国地理学家，为我国绘地图，震于昆仑之大名，不敢不为留一位置，遂截取新疆后藏间丛山之一段名之曰“昆仑山脉”，山脉之名本非我国所固有，若问昆仑主山究竟何在，谁也不能回答。

构成昆仑的条件，第一、是神仙所居，即《禹本纪》所言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其上有醴泉瑶池，尚有像《山海经》所言之琼台玉阙，珍禽奇兽，仙人神物。第二、有四条大河，从昆仑流出，其末流入于大海。

于今对于仙境情况暂置不论，四条大河则一定要有。现仅有一条黄河，发源青海的星宿海，至山东入海。古人硬说黄河本策源于昆仑，到青海罗布淖重源再出。由昆仑至罗布淖一千五六百里，黄河是行于地下的，名之为“潜流”。潜流之江河在地理上不能说没有，但必须是平地，或自高就下。于今新疆称塔里木盆地，地势比青海低千余公尺，请问黄河的水怎样流得上去？再者还有黑水、赤水、洋水三条大河在哪里？虽然地理学家把些与昆仑毫无关系的小水，强解为三河，究竟勉强得很。

照我考证，昆仑本不在中国境内，它是西亚阿美尼亚高原的阿拉拉特 (Ararat)，论高度原不算世界第一高山，但在西亚境内算是最高的了。故此西亚人称为“世界大山”(Mountain of the World)，其发音为Khursag Kurkura，第二字与昆仑发音相近。这仙山名传遍世界，希腊为Olympus，菲里士人为Carmel，北欧人为Asgard，印度为须弥、苏迷卢或阿耨达，回教为天园，希伯来人为伊甸，我国则为昆仑。而最早则实为山东之泰山。

《旧约·创世记》谓有四条大水流自伊甸，有两条河说明了就是替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斯。另有比逊河及基训河。前者疑系阿拉克斯 (Araxes)，后者有人说即埃及尼罗河。但《创世记》四河均出伊甸，而尼罗则自南而北，方向相反，又尼罗在非洲，与伊甸之在亚洲截然相异，未可混为一谈。

回教天园亦有四河，自天园下流出。其名为“水河”、“乳河”、“蜜河”、“酒河”。

印度阿耨达四水，即 s 勝ず櫻 ê 憐櫻 鐮泛櫻出《群櫻 可 e 河、徙多河。

希腊奥灵匹司没有河，则将四水位置于冥界。

#### (十五) 昆仑与悬圃

悬圃见屈原《天问》及《离骚》，屈原自言到苍梧舜葬处陈词毕，即到昆仑的悬圃，想由此上天，惜为帝阍所阻（见前文），乃漫游昆仑境内。悬圃亦见《山海经》（平圃，郭璞注即悬圃）《穆天子传》、《淮南·地形训》。

《离骚》、《穆传》皆作“悬圃”，古人未解其义，改为“玄圃”，后来又改为“元圃”。近代闻一多竟解为“玄藪”。

其实“悬”便是悬挂的悬。《易·系辞》“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诗·周颂》“应田县鼓”，《周礼·春官·小胥》“正乐县之任。”《说文》“县，系也。”

所以县圃实应该照《淮南》作为“悬圃”。我们看《天问》“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尻是人的尾间骨，等于山的基础。人必有尾间，始可坐，山必有基础始能著于地上，现在昆仑的悬圃是没基础部的，那不就悬于空中吗，《淮南》的悬圃有“乃维上天”字样，维也是系挂的意思。

希腊奥灵匹司虽无悬空之说，但天帝宙士曾对诸神自夸神力，谓自天空悬下一条金链，他可将大地海洋及一众神仙悬挂在奥灵匹司山顶，使之悬空云云。

西亚帝王好造悬空花园 ( Hanging garden ),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二世 ( Nebuchadnezzar II ), 所造尤为著名。他们也无非模仿理想中仙山,《天问》、《离骚》所言者乃仙山之景,非指西亚帝王所造者。

(十六) 死神为人类祖为第一代人王人类所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掌握生死的死神遂特受人类崇敬,所有大神也尝兼为死神,或做过一任死神,寝假竟谓死神为人类之祖,又为第一代人王,发明文化事业。(1) 西亚 水主,也即深渊之神哀亚,有死神性。他曾教导人民各种文化事业,文字也是他所发明的。他的唯一儿子旦缪子 ( Tammuz ), 是巴比伦民族的始祖 ( Patriarah ), 也是洪水前牧人王朝的君主。

(2) 埃及 大神奥赛里士 ( Osiris ), 相传为埃及第一代人王,创造文化事业,及为恶弟害死,则变成冥君。(3) 印度 印度梵留那 ( Varuna ), 摩纽及阎摩,皆属死神,但皆为第一人 ( First man ), 即人祖。阎摩又为人王,称“强有力的君王”。

(4) 希腊 海王普赛顿 ( Poseidon ), 相传为人类的创造者,希腊有许多世阀,均认他为祖宗。

(5) 中国 谓伏羲画八卦,即为原始文字,伏羲也创造了若干文化事业。杨朱“自伏羲以来三十万岁矣”,即视伏羲为亚当,河南有许多人祖庙,祀伏羲。而伏羲又为人王。伏羲与颛顼实为一人,先秦各大民族皆以颛顼为祖。(十七) 人祖人首蛇身我国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具有不可摇撼之权威。埃及奥赛里士夫妇皆常具蛇形。西亚的哀亚原形是蛇。最早死神 Nin zishgida 之像,肩上有两蛇冒出,其标帜为相缠之双蛇。在天为水蛇座 ( The Constellation of Hydra ), 称为“蛇神”。我国文昌帝君前身为梓潼大蛇,死后转生也累世为蛇。文昌来自西亚旦缪子。旦缪子有一名号曰“天蛇”。希腊人祖是凯克洛士 ( Cecrops ), 为阿替加第一人王,创造文化事业及文字 ( Writing )。他的形象是上半身为入,下半身为蛇。又欧罗巴 ( Europa ) 故事,卡德马士 ( Cadmes ) 为追踪其妹,不得,不敢返国覆命父王,遂在底比司 ( Thebes ) 建国为主,以打死火星的守泉蛇,家门多遭灾难,愤祷天帝愿不为人而为蛇,夫妇果皆变蛇。卡氏为底比司开国之君,等于底比司民族的始祖,故须为蛇。

(十八) 死神及人祖多兄妹为婚我国伏羲,以兄妹而为夫妇。众所共知。西亚旦缪子与姊妹易士塔儿为相恋之情人。又另一死神尼甲 ( Nerhal ) 与原来冥后也是兄妹。埃及奥赛里士与其妻埃西 ( Isis ) 亦然。印度阎摩与妹阎美 ( Yami ) 共治死国,称为双王。波斯冥君叶马 ( Yima ) 与妻叶梅 ( Yimeh ) 为孪生兄妹。(十九) 死神为帝阎

西亚看守天门的有两位死神,一为旦缪子或曰奚马齐 ( Dumuz

i), 一名吉修齐丹 (Geshzida) 见西亚有名的阿达巴与南风故事 (The Story Adapa and The South Wind)。旦缪子死落冥府, 又复活而上升天庭, 为天帝把守门户, 故旦缪子有“守卫者”(Sentinel) 或“保护者”(Guardian) 之号。印度火神阿耆尼 (Agni), 性质与西亚死神绝相类, 也负把守天门之责, 以抵御魔军及巨人对天宫之袭击, 称“天界卫士”(The Sky Sentinel)。我国死神巫咸为帝阍, 隐见《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 倚阍阖而望予”, 明见扬雄《蜀都赋》“选巫咸兮叫帝阍”。帝阍必巫咸始能叫开, 可见死神与天门的的关系。中国古代帝王每年到泰山封禅。封是祭天, 在泰山顶上, 禅是祭地, 在泰山脚下的梁父。梁父系墓地, 乃死神居处。大约是因死神把守天门, 祭他是祈求他通融放进之意。

## (二) 灶神为司令

郑玄注《周礼·司命》, 因闻司命乃灶神, 指为“宫中小神”。后代《楚辞》注家注《九歌》大、少司命, 见《大司命》“乘清气, 御阴阳”, 又“龙驾”、“帝服”神通既高, 体面又大, 宫中小神, 万不足当, 遂谓二位司命乃是天星, 即天文上的文昌与三台两个星座。其实司命职责极繁, 司灶亦其一, 神固宫中之神, 但不能说他是小。盖西亚死神尼甲原为火星之神, 为火神。灶与火的关系拆不开, 他便天然成为灶神了。印度的死神米特拉 (Mitra) 和梵留灶那也为灶神及家的保护神。希腊罗马的灶神乃女性, 名委斯塔 (Vesta), 地位极为崇高。中国古代灶神地位也并不微小, 孔子有“媚灶”之言, 汉武有亲祠“灶鬼”之举, 黄帝炎帝都做过一任灶神。民国今日常称灶神为“九天司命”。

## (二一) 死神为巫医

中国的死神巫咸, 巫非姓, 实是其职守。《吕览·勿躬》篇: “巫彭作医, 巫咸作筮。”《列子·黄帝》篇: “有神巫自齐来, 名曰巫咸, 知人生死存亡。”《世本》“巫咸始作巫”。西亚死神尼甲为“群神祭司长”。初为死神, 后变生神的旦缪子, 也被称为“巫祝”。盖西亚最初的洪渊人格化的水主哀亚便擅长未卜先知之术。哀亚不兼为死神吗? 希腊海神皆擅先知术, 亦由此来。

西亚最早死神 Ningishzida 是蛇神, 善医术。希腊太阳神阿波罗有子名 Asclepias, 医术最高, 能起死人, 肉白骨, 以死人还阳者太多, 冥府几空, 冥君诉天帝, 天帝以雷矢将之击杀, 上天变为长蛇座。西洋今日药铺招牌尚绘交蛇为帜。《旧约圣经》, 摩西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途中人多病, 摩西铸铜蛇悬使仰瞻, 皆愈。神话学家谓即基于此种信仰。

## (二二) 战神每无头

屈原《九歌·国殇》旧以为祭为国战死者, 是人鬼。但歌中有“首虽离兮心不怨, 魂魄毅兮为鬼雄”二句, 我断定《国殇》歌主, 是天神, 是九重天里火星天之神。火星色红, 象征血与火, 故火星神又天然为战神。

战神何以无头, 此事今已难考。仅中国印度保存若干资料。除《国殇》一歌外, 其一是《山海经》形天故事, 《海内西经》第七, 形天与帝争神, 帝断其首, 葬之常羊之山, 乃以乳为目, 以脐为口, 操干戚而舞。其二是蚩尤故事。蚩尤被黄帝擒获, 斩首, 首葬东平郡, 寿张县, 阚乡城中, 身体葬山阳郡钜野县。《史记·封禅书》八神将, 第三曰兵主, 祠蚩尤。兵主即战神, 被断首, 身首别葬, 与形天相类, 当是形天所衍。蚩尤又号“炎帝”,

见《史记·五帝本纪》、《论衡》等书。又号“赤帝”，见《大戴礼·五帝德》篇。《淮南·天文训》：“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神为荧惑。”《春秋纬文耀钩》：“赤帝赤Y吓 裡S 蝗 荒戏健！庇 筋 腔鹦恰F 淙 蛞笊妨\*发现商代帝王陵墓，规模甚大，殉葬卫士多至数百，皆无头之躯干，其头别葬。考古家称之为“无头葬”、“人头葬”，何故如此，不能说明。我以为是模仿战神，战神无头，故将卫士切去头颅，因形天蚩尤身首皆别葬，故头颅另葬一处。

印度彭甲伯（P a n j a b）地方人崇拜一无头骑马神，云此神战死故无头，敬之可胜敌。此无头神在印度全境则为象面神迦尼萨（G a n e s a），相传此神乃大自在天之子。

为婴儿时为土星S a n i 毒眼所视而失其首（黄帝乃土星神，斩火星神首，此当然有关）

幸偏入天来，令以象首续之，复活，乃为象面神。一说大自在天，不识其子，断其首，以象首续之活，乃使统天军，为天军领袖。他本身虽无战军之号，其弟迦帝羯耶（K a r t i k e y a）则为战神，亦为神军统帅。希腊火星神阿里士（A r e s），罗马名马尔士（M a r s）是否有断首事，无考。但阿里士性情粗暴，神仙们都不喜欢他。相传智慧女神曾以巨石击仆之，身横七亩（我们知道地府有巨人，卧地身横九亩。此事曾传到我国，《春秋·穀梁传》纪鲁叔孙叔臣射杀长狄侨如，身横九亩）。又酒神狄亚仪苏士与阿里士也不睦，曾以火焚其躯。又被某海神捉去，加以链系。斯巴达作阿里士像，双脚系用链子锁住。我们知道原始女怪之死有斩首、碎躯、火焚之说。其夫阿伯苏有被链击之说。这种死法以后常在魔身上反映。蚩尤被斩前也曾受械，所弃械变为枫木。阿里士既有火焚，受链之事，则或亦有断首之事。（二三）马头娘

我国有马头娘故事。马头娘相传为蚕神，三国时张俨有《太古蚕马记》，干宝《搜神记》言之更详。黄帝妃嫫祖为蚕丝始创者，《三才图会》嫫祖背后有一马。其实此事来自域外，埃及有马头女神，特为河马。巴比伦有一石刻，亦有马头女神，希腊地母狄迷特儿曾变牝马避海王之逼。某地刻其像辄作马头女身形。印度有马头观音，皆同出一源。（二四）螺仙

螺仙见《搜神记》，今江浙民间亦有此种传说。四川民间于蜗牛螺蛳，皆称“娘娘”，初以为此等生物至为委琐，何以有此尊称？及读希腊神话：爱神阿弗罗蒂德（A p h o r o d i t e）诞于海水之泡沫，又云诞于贝壳，始知其故。盖阿弗罗蒂德与罗马委娜斯（V e n u s）原是一人。而此神在天上为金星，金星则为西亚大女神易士塔儿，来头极大，无怪如此。印度吉祥天乃偏入天之妻，亦有生于泡沫之说。

#### （二五）牛郎与织女

《诗·大东》“卑彼牵牛，不以服箱”，“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可见牛郎织女之名，早见于我国。《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谓织女为天孙。《荆梦岁时记》谓织女为天帝女。《史记正义》，《星经》及《观象玩占》亦谓为女。《岁时记》言“天帝怜女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可见牛郎乃天河西之星，并非民间收童。此说流传俗口，竟谓牛郎乃凡人。应劭《风俗通》、《风土记》更有牛女七夕相会使鹊为桥，是日鹊首无故自髡，乃两情人桥上相会足踏之故。

考西亚易士塔儿为天帝阿努女，与旦缪子为情侣。旦缪子在天为牧人

星座，在北斗前。

北斗为车，斗四星是车轮，杓三星是牛（或马），牧人星在前牵挽。中国天帝女嫁天上牵牛郎，或由于此。后来讹传为民间牧童，便太远于情理了。

我现在这廿几条证据都是粗枝大叶的说法，详细情况要看我的屈赋研究。再者本文所举例子大都出于秦汉之际，或者有人说这或者是战国时传入。但我研究战国前文籍，如甲骨钟鼎及地下实物，发现夏代便有域外文化的色彩，所以我胆敢宣布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是同出一源。

选自《最古的人类故事》

#### 四 屈赋里域外文化分子问题

屈原作品尤以《九歌》、《离骚》、《天问》充满域外文化分子，此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者。这类域外文化分子究竟由何而来的呢？据本人研究，有商以前已入中国者；有战国时代外国学者携来者，兹分别说明于下。

（A）域外文化第一度的来华所谓商以前那当然就是夏代了。尽管夏王朝地底资料至今尚未发现；也尽管夏代初期几个帝王的事迹颇为神话化，不像历史人物，但笔者却主张夏王朝是存在的。我们看有关屈赋的文化分子起源甚早，即可知之。这里请粗枝大叶举出几项证据：

（1）《九歌》、《九辩》之为神曲 《九歌》、《九辩》相传为禹乐，或其子启上天所得之乐。《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王逸谓《九辩》、《九歌》为禹乐。《山海经》则言夏后开（开即启，避汉帝名讳改）上三嫫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这两节文字都把《九辩》、《九歌》与夏启发生关系，总不能说是毫无理由的。

（2）夏启 征伐当时一个诸侯有扈氏，大战于甘，作《甘誓》。他宣称有扈氏的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近代学者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系战国中叶邹衍一派人所鼓吹，所谓阴阳五行之学，夏初哪会有？遂断《甘誓》为伪作。但笔者则敢说阴阳五行之说，战国前便有，像甲骨文有“方帝”，又有“贞帝于东”、“贞帝于西”，似为东西南北中的五方，故方帝即五方之帝，五方帝不正代表五行吗？商代既有了代表五行的五方帝，我们又哪能坚断夏代没有？至“三正”，当是后来的“三皇”、“三一”或“三官”。（3）齐地八神 《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到了齐国封禅泰山，同时祭祀八神。那八神即前文所谓天主、地主、阴主、阳主等。史公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其祀绝，莫知其起时。”这是说八神祀典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已久断绝了，若非始皇好神仙，崇祀典，到齐国境内，苦心搜求，这八神祀典的根据地在哪里，谁也不会知道。八神与屈原《九歌》的主神其实相同，前文已提，后更当详论。我看《封禅书》说姜太公封齐，始开始八神的崇拜，不确，“自古而有之”，那句话才可信。古到什么时代呢？不在商，便在夏，据我看，恐自夏即有。

（4）仙山或首都位大地脐上 世界文化古国均谓其国境内名山，或

其国都所在，或最重要的地点，在大地脐上，上对天脐，那就说是居于大地的正中了，遂名其国曰“中国”。

“中国”二字，早见诗书，不过并非我国的特创名词，实来自两河流域，流传至于其他国家。印度摩揭陀自称“中国”，其他亦有称者。晋僧法显赴印度求法，时印度佛教文化正昌盛，印僧谓蛮夷边地之人，能慕法远来，咸以为喜，而法显见诸僧威仪可观，自幸以蛮夷边地之人，亲到中国。其同伴竟有终老斯邦，不愿东返者，惟法显愿流通佛法，感化同胞，独自回国。其实这不能怪法显这批西行求法的和尚“自卑感”太重，印度在那时候本就以“中国”自命的。魏晋六朝时佛教大量传入东土，拥护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于是“夷夏论”，“华戎论”，闹得锣鼓喧天。有个和尚名僧愍谓：“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今华人自称所居之土为中国，好像是“出自井坂之渊，未见江湖之望的‘井蛙’”，是不能同他谈什么的。僧愍谓天竺为中国，当然是根据佛经和法显的《佛国记》，但他的知识还是有所局限。假如他生在今日，便知印度也还不算中国，真正“中国”二字的源流，应该上溯更早时代，而觅之于西亚。

现在请再把脐字来谈它一谈。《封禅书》八神之天主祠天齐，“齐之所以为齐，以天齐也。”苏林注：“当天中央，齐。”此注不甚明白。颜师古引解道彪《齐记》：“临前城南有天齐泉，五泉并出，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齐也。”齐即脐之古体字。《左传》：“后君噬齐。”注：“若口噬腹脐。”人因脊骨弯曲程度的关系，想用口去咬自己的脐，一定咬不到，后世遂有“噬脐莫及”的成语。因解氏《齐记》有“天之腹齐”语，我们始知天齐者即是天脐。陈侯因，此陈侯即是齐威王。“因”古作“𠂔”，后乃省作“齐”。齐本姜太公所封之国，战国初期为强大的大夫田和所篡取。“因”之名，乃田姓代替姜姓，取得齐国之义。“陈”与“田”古通，故曰“陈侯”。如希腊提非、回教天方、南美瓜地马拉，印地安玛耶族首都提卡尔，及南洋某岛，均谓其地居大地脐上，其起源均甚古。欲知其详，请读拙著《昆仑之谜》一书。

观此，则齐国之为齐，其起源当甚早，并不始于姜太公之始封。泰山之所以为封禅圣地，实因它原居于昆仑地位。汉武帝酷慕长生，屡求群仙所栖，不死药所在之仙山曰“昆仑”者不可得，与朝中博古之臣，共按古图籍，以于闾某山为昆仑，对于处于自己国境之内，且曾登履七次之泰山，竟失之眉睫，实为可怪，若非泰山典故久已失传，何至于此？泰山典故在秦始皇、汉武帝时便已失传，可证其历世之悠久。（5）夔与巫咸 夔相传为舜之乐官，奏乐时能使百兽率舞。天生独脚，故有“夔一足”之说。甲骨文有若干夔字，皆作一足\*踳之状。笔者考证，夔后变为“终葵”，殷有终葵氏为遗民七族之一。复衍变为“钟葵”，淮南王佗子名刘钟葵，以后以钟葵名者有杨、丘、葵、张、慕容诸姓。又变为“钟馗”，即我国民间所传喜于啖鬼的钟进士。以后便没有再变什么了。但在天文上有“奎宿”，为文章之府。张衡《西京赋》“奎踳盘旋”，前人谓“踳”乃开步走的意思。

《诗·唐风》“有杕之社”、“独行踳踳”，注：“疏行貌”，又“无所亲貌。”《孟子·尽心下》“行何为踳踳凉凉。”义亦同上。则开步走之义未的。张赋既曰“奎踳”奎即天文上的奎宿，其来自夔。夔既一足则奎踳当是一足\*踳以行之状。古人又曾说大禹治水辛劳，一脚偏枯，只有独脚走路，遂有“禹步”之说。“奎踳”当从此来。奎后来又变为魁星，乃头生双角，青面赤身之鬼。他一手持笔，独脚立鳌鱼背上。相传他的笔点到人的额头上，那

人考试始可获取，所以科举时代，魁星与文昌同为士人虔敬供奉的对象。不过我国鬼神名号的变化并非一条直线传下来的，而是时时综错变换着的。《战国策》蔡泽貌陋，相士唐举历举他的奇丑之相，有“魁颜”一语，前人解魁为魁梧，我们可以说人躯干魁梧，万无颜面魁梧之理。“魁颜”二字明明说蔡泽脸色发蓝，有似魁星的鬼脸罢了。甲骨文的“夔”字是头生双角的鬼状物，钟进士的“钟馗”也是狞恶如鬼者，与魁星相貌皆相类。

巫咸之名亦见甲骨，称之为“祖咸”，或曰“戊”，不下四五十条。我们都知道商民族的始祖是契，为舜的司徒，现在为什么竟以巫咸为祖呢？经我考证，巫咸乃死神，死神照例为人类之祖。甲骨所称的祖咸非商人一族之祖，实乃全人类之祖而已。“巫咸”之名已见甲骨，可见其来我国之早。（6）  
鲧禹与洪水故事 鲧禹故事与洪水有拆不开的关系。相传鲧窃上帝息壤填洪水，致水势愈塞愈大，为舜所殛。然《诗经·商颂》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之句。《山海经》亦有此语。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山海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又注《天问》：“洪泉极深，何以窞之？”引《淮南子》云：“凡鸿水渊藪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注云：“息土不耗灭，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

洪氏所引《山海经》见《海内经》。郭璞注“息壤”云：“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开筮曰：‘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洪氏所引《淮南子》见《地形训》。《海内经》于“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句下更云：“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鲧禹治水一失败，一成功，失败的原因，是鲧一味用土去填。成功的原因，是离开了许多河道将洪水疏导到大海里去。现在《商颂》言禹敷土于洪水中，《山海经》说禹布土，《淮南·地形训》也说禹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那不是跟他父亲的作为一样了吗？无怪朱熹在《楚辞辩证》里大以为疑，说道：“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则父窃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朱熹于《天问》“窞洪”之疑问也曾说：“禹之治水，行之（疏导使顺行也）而已，无事于窞也，水既下流，则平土自高，而可宫可田矣。若曰必盪之而后平，则是禹复为鲧，而父子为戮矣。”

其实《天问》、《山经》、《淮南》所言洪水，并非尧时泛滥成灾的大水，乃是西亚开辟史诗所说的当地地尚未造成时充塞整个空间的原始深渊。这原始深渊，西亚名之曰“深”（The Deep），《商颂》时代名之为“洪水”，战国时代名之为“洪渊”，与原来语意尚甚相接近，唐避李渊之讳改为“洪泉”，那就讹远了。因凡所谓“泉”者，乃是滔滔长流，随山石曲折的一股水，与“渊”大是不同。

西亚开辟史诗言木星之神马杜克屠龙创世，取芦灰堆积于所屠女怪的腹甲（女怪形体当如巨龟）上创造“伊斯哈拉”（Esharra），是为大地。所谓“禹敷土”“禹布土”皆指此而言。只有顾颉刚读《商颂》曾悟到这个“洪水”是原来便有的，与鲧禹父子所治的洪水无关。可惜顾氏未研究西亚神话，未能说出究竟的道理。

至于禹能导水（见《大雅》）奠山（同上）。制定朝夜（见《淮南·天文训》），测量四极，主领山川（见《山海经》，《周书·立政》篇及《墨子·明鬼》篇），与西亚开辟史诗主角马杜克无一不若合符节。《墨子》、《山经》或出于战国；《淮南》成书在西汉之初，或不足塞反对者之口，《商颂》系宋襄

公大夫正考父所作，产于春秋时代，但其所根据的传说，应该比春秋时代更古。

禹妻涂山氏与其子启也颇多神话。后羿故事尤为荒诞。那个在夏史上篡夏的后羿，居然能射落九个太阳，这能说他是个凡人吗？

夏初历史大半属于神话，民间口耳相传，至战国始著之竹帛。

(7) 圣河主盟誓 西亚的死神证盟誓，而大河每言发源地府，故河亦证盟誓。《左传·襄公十九年》：晋荀偃病疽，卒而目不瞑，栾怀子誓之曰：“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晋文公与舅犯盟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白水也即是黄河，黄河之神便是河伯。《封禅书》谓有专祠河之巫，名曰“河巫”，其祠在临晋。

希腊奥灵匹司为仙山而苦无河。河既策源地府，乃以司蒂克司(S tyx)位置之于冥界，指以发誓，虽天神亦不敢违背。印度圣河恒河，亦证盟誓。

齐、晋、秦，自春秋以来即为大国，楚也是大国，其祠奉九神由来已久，哪里会像陆侃如，闻匡斋之说，要等外面传来，始能奉祀呢？

(B) 战国时代域外文化再度的涌入前文言域外文化夏时已入我国，有些文化分子已混合于我们自己文化体系之中，融汇而为一片，早已分不清哪是外来。哪是固有的了。有些文化分子以传入年代过于久远，竟把原来意义完全遗忘了。我们现在举最简单的几个例子为证：第一例我已说过齐之所以为齐，以泰山居大地脐上，所以泰山应该居于昆仑地位，但汉武帝一意向国境以外寻觅昆仑的仙山，对国境内的泰山居然熟视无睹。若非解道彪《齐记》说临前有天齐(天脐)泉，五泉并出，有如天之腹脐。我们直到今日还不知齐国之所以名为齐，原来是因脐字而得。第二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自国都咸阳跑到泰山封禅，把“其祀久绝”的齐地八神都挖掘出来一一拜祭。他到琅邪奉祀四时主。在海滨停留三个月，筑琅邪台，对这位神可谓敬礼备至。及他沿长江返国，经过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闻博士言此风系湘君所作，则大怒，发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以为报复。他不知湘君和四时主原是一神，他对四时主这样恭敬，对湘君则又这样傲慢，说起来岂不好笑，但在这个故事上，又可以证明域外文化传入中国甚早，所以到秦始皇时，居然模糊得无法辨认了。

到战国时代，域外文化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再度涌入中华。这种域外文化虽还和第一度的是一样的东西，但经过这样久长的岁月，一定会发生许多变迁，加上许多新资料，增加许多新枝节，俨然以崭新的姿态和面目出现。我们的大辞人屈原本已接受了全盘的中原文化，是一个绩学之士，他奉命使齐四五年，这四五年中他与那些稷下谈士们不能没有交游，又获得域外文化的新知识不少。他的《九歌》，九位大神乃是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时所带来，但关于各神的故事以前不甚明了，而此时则变成明了；关于各神事实，各种情节的点染，以前不甚完备，而此时则趋于完备。所以《九辩》、《九歌》虽夏代时便有，但那时一定极其简陋，屈原的新《九歌》出来，我们始能拿来和西亚、希腊、印度相印证。又如《天问》分天文、地理、神话、历史几个部分，可说是域外知识的总汇。而那些域外知识大半是新的，是战国时代传进来的。

战国时代域外文化何以又大量传入？不但文化传来，尚有许多域外学者携家而至，又是什么缘故？我假设这与马其顿亚历山大侵略欧非亚三洲有

关。人的性情总是安土重迁，若非有不可抵抗的灾祸在背后驱迫，是不肯离开故乡故土的。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在世时候便有混一欧非之志，许多人早已想逃避了。那些学者在游牧民族口中，或商贾口中，知道远东有一大片安乐土，便决心迁来了。他们之来有三条路线，一条是采取法显、玄奘的西行路径，由印度翻过喜马拉雅大山，先抵我国秦蜀，而后渐至各国。一条是沿着印度洋的边岸，慢慢向东走，抵广州登陆，惟以那时广州没有文化，自不乐勾留，乃沿海北上，到了今山东的芝罘或登州登陆，那就到了战国时代的齐国了。另一条是由印度到云南的大理，——大理是古时国际通道——辗转而达到楚秦燕赵诸较大之国。或者这些学者先到印度，本想停顿下来，而亚历山大又向东侵略，兵锋及印度河，他们不得不再逃避，一逃便逃到中国来了（参看论丛《我国古代移民通商沟通文化之伟绩》）

#### （C）外来学者传播其知识（一）稷下谈士

这些学者也是人，需要穿衣吃饭，何况很多携有家室，到了中国以后，有的寄食于当时王公大人之门，像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门客，动辄数千人，他们溷迹其间有何难处？又齐国的稷下更为才智士的集中地，我想为这类域外学者是更好的庇身之所了。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邹 S] 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索隐：“稷下，齐城门。或云出名。谓齐之学士集于稷门之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接予、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索隐引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又引《齐地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堂趾，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出，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亦异说也。”

（二）战国四公子门客我们再看战国四公子及吕不韦传。《史记·孟尝君传》：……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待史，主记君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以为孟尝君亲己……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

《魏公子列传》：

公子为人仁，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春申君传》：

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见

赵使，赵使大惭。

这四位公子并非同时，以孟尝君时代较早。他于齐宣王二十二年号孟尝君（或云孟尝乃其谥号，非是）而《史记》却说他的父亲田婴始封于薛为泯王三年，轮到孟尝继位岂不太晚了吗？齐宣王在位实有二十九年，二十二年为元前三二一。信陵之得封为君，在元前二七六，他与赵平原君为姻娅，则二人时代大致不远。

楚黄歇以辩士使秦，在范雎相秦之后。范雎相秦在魏安 王三十一年，后三年，黄歇始相楚，在元前二六六。所以《史记》在平原传中说“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在《吕不韦传》中又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似四公子是同时人，不知自元前三二一扯到元前二六六，相差有五十余年了。笔者所云外来学者寄食于四公子之门，也不过言其大概，严格说来，寄食孟尝之门，是可以的。因为田文之父婴原就好客，当他发现其子文的聪明才干以后，便“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可见孟尝君父子都好客。孟尝之养士当比他之袭封为早。邹衍与公孙龙都是域外来华的学者，而《史记·平原君传》曾记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则平原君也曾为若干域外学者的食主。只有春申君时代较晚，吕不韦更晚，也许他们也养过域外学者，但为域外学者的子孙，或其再传弟子罢了。

我们说得保守一点，齐国的稷下才是这些域外学者栖身之所，为的齐宣王即位与亚历山大侵印度时代相当。（三）邹 衍

我们现在再来读《史记·孟荀列传》：……其后有邹子之属，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其次邹衍……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襍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窃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所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为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我敢断定邹衍是域外来华的学者，而且是所有来华学人中的巨擘。所以他的学术能够倾动朝野，风靡一时。《史记》本传说：“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索隐：“惧音劬，谓衍之术，皆动人心，见者莫不惧然驻想，又内心留顾而已化之，欲从其术也。按化者，是易常闻而贵异术也。”按“惧”应作“矍”，惊视貌，作为惊惧是不对的。“矍然顾化”，盖谓各国显要乍闻邹衍之议论，为之矍然失惊，思考之余，颇欲采取其言以为施政之标准，可是后来还是没法实行。《史记》又说：“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弔敝师。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

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惠王郊迎一句据胡适考证恐不可靠，因惠王与平原君非同时代人）邹衍曾游赵，平原君闻其所言“至道”，而绌喜言坚白同异的诡辩家公孙龙，已见前文。

邹衍游燕时，备得昭王的礼遇。及昭王子惠王即位（据钱穆考证邹传“适梁，惠王郊迎，此惠王乃燕惠王非梁惠王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竟将邹衍拘捕下狱。《史记》虽不载此事，汉人书则屡见不鲜，似乎不是虚构的。《淮南子》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日，天为之下霜。”（《太平御览》十四引）《论衡·感虚》篇：“传言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又《寒温》篇、《变动》篇，也有涉及邹衍系狱，天为陨霜的话。邹衍下狱后，燕惠王恢复他的自由没有？各家无说，想必那时邹衍的年龄也有七十以上，便病死狱中了。这样一位大学者结果如此不幸，令人惋惜不置。

#### （四）邹衍的学说

邹衍的学说当然有专书发表，现在且将他几种学说简单地来谈一谈。

（1）大九州与大瀛海 邹衍有所谓“大九州”和“大瀛海”的理论。所谓“九州”也是战国以前的就有的说法。齐侯铸钟：“成唐（汤）有严在帝所，专受天命……咸有九州，处土禹（禹）之堵。”《左传·襄公四年》传：“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径启九道。”九州有三种说法：一、《禹贡》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二、《尔雅》九州：冀、幽、兖、营、徐、扬、荆、豫、雍。

三、《周礼》九州：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

这三种资料均属晚起，援以为证，颇多危险。比较可靠的书经，仅言“东土”，“西土”，“四方”，“四国”，甚至于“四海”却无“九州”二字的明文。仅《咸有一德》，相传是伊尹作的。中有“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诗·商颂·玄鸟》：“奄有九有”，传：“九有，九州也。”伊尹时代，居然知道说“九有”的话，可疑。也许是后人自《商颂》采取了这两个字。混入《商书》《咸有一德》的吧？

《诗经·商颂·长发》：“帝命式于九围。”疏：“九分天下，各为九处，若规围然。”又：“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九有解见前。《诗经》的《二南》、《国风》、《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均无九州字样。只有《商颂》有，而其有亦不过代字，如以“围”、“有”代“州”，“州”字明文，则始终不见。《商颂》是春秋时代的宋襄公命他的大夫正考父做的，其起较晚。因此，笔者敢断言“九州”二字疑系起于春秋时。但还指不出确定地域。九州区域据《禹贡》、《尔雅》等所言甚为广阔，如雍州直达今甘肃青海，梁州达云南贵州。必秦汉大一统以后，始能作此区分，以前则无此能力。但尽管春秋战国时无此能力，人们脑子里实已有了“九州”观念，不然齐侯钟和《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和戎时何以提到“九州”的话？春秋时还有一种野蛮民族，称为“九州戎”，见《左传·哀公四年》：“土蔑乃致九州之戎”。注“九州戎在晋阴地陆浑。”这九州戎不知是戎人竟抱有囊括九州之志故以自号呢？还是其族名之音近于“九州”二字，别人遂戏以称之呢？总之，在春秋末期已有“九州”之说，此为其证。

邹衍入了中国以后，提出“大九州”的说法来更正我们的小九州。他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

者九，乃所谓九州也。”这段文字虽简单，缺欠那时域外文化知识，仍解不明白。文中共有三个“中国”字样，第一个中国系指齐国。齐济古今字。齐以泰山故，谓其国处大地脐上，故齐训为中。孟子对齐宣王说：“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莅，注疏家皆以为系临莅之莅。窃以为不然，齐既训中，则宣王原在中国，又何必临莅？此莅字当作位字，言其位于原来位置也。

齐国那时尚未明确地自号为兖州或青州，邹衍只好称之为“中国”。以下两个“中国”则指全中国，秦楚燕赵一概包括在内。邹衍意思，大地上共有九个大州。一个大州又分为九个小州，一共有八十一个小州。全部中国名为赤县神州。这赤县神州又区分为冀、兖、青、徐等九州。这即大禹所划分的九小州。这九小州是不得参与九大州之列的，故曰：“不得为州数。”这九个大州各有裨海环绕，人民禽兽莫能相通。其人民肤色，语文同，禽兽种类同，便算属于同一之州。像这样子的一共九个大州，始有所谓“大瀛海”环绕其外。大瀛海的外边，便是天地的会合处了。屈原《天问》：“地方（此字疑为分字之误，）九则，何以坟之？”所问乃是邹衍所说的大九州。希腊古亦有九州之说，亦言大瀛海，称之为“河海”，埃及称之为似蛇之水，遂有谓为有翅之龙者。其详见拙著《天问》天文、地理两部。其源实出西亚。今有一西亚古石刻，大地上有八个圆圈，似指八大州。中间有一黑点，代表一州，两河出其间，似指巴比伦、亚述立国处（图在《天问正简》中，此处从缺）。

九州观念战国前便传来中国了。大瀛海呢？我以为虽无明白的瀛海之名，观念则有，特模糊不清而已。《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莫遂莫达，九有有截。”上两句言契孙相土，拓地至广，但到大瀛海便被截住了。下二句言相土开疆辟土，无不如愿，但大九州外有大瀛海截住，不能更进，又将如何？《山海经》有海外东西南北经。“海外”二字亦指大瀛海之外。后人将“海内”当作中国，海外当作中国以外的国土，是会错了这两个名词意义之故（大瀛海详见《天问正简》）。

（2）以黄帝为民族始祖 邹衍学术在《史记》本传里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的历史系统自他所处的战国时代上推至于黄帝而止，说是“学者所共术（述）。”我国在春秋时便以颛顼为各民族共祖，战国以后，又改为伏羲。不仅以为各民族之祖，并以为全人类之祖，邹衍何以特尊黄帝？原来公元前八九世纪，亚述有名王特崇土星之神尼尼伯，黄帝正为土星之神，邹衍也许是尼尼伯学派之一吧。（3）《山海经》与邹说的关系 其二，自黄帝上推直到天地未生时窈冥状况，这就涉及战国时代若干种开辟论，如《易·乾卦》的“万物资始，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及“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吕氏春秋》的“天地有始，天微以生，地塞以成，天地合和，生之大经”等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这段话好像是一部《山海经》的提要。笔者早说过《山海经》的地理并非中华地理——有些是的则系后人混入——我怀疑它是两河流域地理书。所谓《大荒》及《海外》诸经，则系神话地理。这部地理书恐系邹衍的讲义，由其弟子笔录，录者非一人，故体裁总杂，文词亦颇鄙俚。录成后，托大禹治水时命伯益记述的，后人遂以为《夏书》。

《周礼·春官宗伯·钟师》条：“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大夫奏采苹，士奏采蘩。”贡公彦疏：“驺虞义兽，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圣之德，则应之……谨按《古山海经》——《邹书》云驺虞兽说……是其圣兽也。”贾公彦乃唐时人，他所见《古山海经》称为《邹书》，想必就是邹衍著的意思。若是，则实是一个珍贵的佐证。

(4) 明堂与五德终始 邹衍学术中心点像《史记·封禅书》所言：“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邹衍以《主运》显于诸侯”。前一段，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后一段，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如淳虽是三国时人，这个注解大体是不错的。《古史辨》第五册六二一页说：

邹衍书本有两种：《五德终始》是“五德之次从所不胜”的，所以说“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五行相次用事，随方面为服”，是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春夏秋冬，相次用事的，如《吕览》、《月令》及《淮南·天文训》及魏相奏议所说。

所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便是五行相克的道理。“五行”一字早见《甘誓》及《洪范》。两文即说不全真，资料当是夏商时传下。五行相克，春秋时已见一些痕迹。如前文所引晋史墨对赵简子言吴虽能入郢，终亦弗克。理由是“火胜金。”据此以推，则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辗转相克，不需解说便可明白的了。至于将五行之德排列起来，使与我国古来朝代一一相合，像所谓“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想必是邹衍替我们安排的吧？

至于“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钱穆谓如《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淮南·天文训》等等，很是。下文说邹衍的学说并未完全消灭，是被战国秦汉学者剽窃而去，引入自己著作，钱穆氏的话是可以为我证明的。

不过《吕览》、《月令》、《淮南》关于“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诸端的记叙，当以《吕览》为最早，《月令》次之，《淮南》最晚。我们现在抄《吕览·仲秋纪》一段以概其余。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雋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盲风至，候鸟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紵 撝淖撝 子癸 陈榘肴 \*其器廉以深。

五方帝各有其色，这在秦襄公到秦灵公、秦献公作\*\*祭白黄青及炎帝，早见历史记载。

战国时代这些方帝的颜色，成为国家的颜色，以君主为代表。到了哪位方帝当值的月份，天子要搬到所谓“明堂”，一个代表时令的偏殿里住下，食的东西，用的器具，听的音乐，都要与这个时令相配合，车马服饰的色彩也要与这个时令相配。春季一切青色，夏季一切赤色，秋季一切白色，冬季一切黑色。一年仅有四季，而五方帝却有五位，多了一位中央土的黄帝，如何安置？只好寄之于季夏之末与秋季相接的一段时间里。《吕览·季夏纪》第六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庙太室，乘大辂，驾黄骝，载黄“紵 禄埔撝 朴癸 仇 肱# 淦鬣鬣\*“R。”范耕研云：“月令正义，四时五行，同是天地所生，四时布于三百六十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而位

本宜处季复之末，金火之间，故在此陈之。”《淮南·时则训》比之《吕览》、《月令》更为精密完备。好像天子御女颜色也与季节相合。春季三个月，居东宫，御女青色。复季居南宫，御女赤色。戊巳的土日，居中宫，御女黄色。秋季居西宫，御女白色。冬季居北宫，御女黑色。这已经太好笑了。军队所用兵器也要与时令相应。譬如春季兵器是矛，注“矛盾锋锐，似万物钻地以出。”夏用戟。戟有枝条，像阳气布散。季夏系中央土之日，其兵剑。注：“剑有两刃，谕无所主也。一曰，谕无所主，皆主之也。”秋季其兵戈。王念孙注云：戈字乃‘噍种 螽\*’噍搭帷 9 攀\*天子救日时陈五兵，钺陈于西，西为白帝的方向。冬季其兵铍，铍系长矛之一种，高诱云：“铍，象阴闭。”训练军队，用惯了一种兵器，岂能为季节而改？这不是太儿戏，也太危险了吗？《吕览》、《月令》、《淮南》所言天子都住在“明堂”里，虽有什么“青阳左个”、“明堂左个”、“总章左个”、“玄堂左个”，都是那个号为“明堂”的大建筑中的小建筑。《礼记》有《明堂位》一篇，言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明堂既为天子朝见诸侯之所，齐宣王境内怎会有此呢？据赵岐注：“谓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狩，朝诸侯之处也。齐侵地得而有之。人劝宣王，诸侯不用明堂，可毁坏，故疑而问于孟子，当毁之乎？”焦循正义曰：“阎氏若据《释》地云：《封禅书》初天子封太山，太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是古明堂，至汉武帝时犹有遗踪……左传隐公八年，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注云：“郑桓公封郑，有助祭泰山汤沐邑在祊。祊在琅邪郡费县东南，郑以天子不复巡狩，故欲以祊易于鲁，以从鲁所宜。计尔时距东迁五十六年。泰山下汤沐邑郑尚能守之，则明堂仍为周天子所有，齐焉敢侵？不知几何时而为齐得。”

又至宣王时不复东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谓齐毁明堂，无王愈可知。”又引孔广森《经学卮言》曰“汉时公玉带上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近泰山明堂之遗象……”

焦循又引阮元《明堂论》：“神农氏作，始为帝宫，上圆下方，重盖以茅，外环以水，足以御寒暑，待风雨，实为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则于是，祀先祖则于是，朝诸侯则于是，养老尊贤，教国子则于是，飨射献俘馘则于是，治天文告朔则于是；抑且天子寝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黄帝尧舜氏作，宫室乃备，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门三朝，后曰路寝。路寝之制，准郊外明堂四方之一，向南而治，故路寝犹袭古号曰明堂。若于祭昊天上帝，则有圜丘；祭祖考，则有应门内左之宗庙；朝诸侯，则有朝廷；养老尊贤教国子献俘馘，则有辟雍学校，其地既分，其礼益备，故城中无明堂也。然而圣人事必师古，礼不忘本，于近郊东南别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册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时令，朝四方诸侯，非常典礼，乃于此行之，以继古帝王之迹。”我抄了许多关于“明堂”的考据，无非在证明“明堂”这种建筑，中国自古有之。阮元所谓古代天子一切都在明堂里办，明堂是天子唯一居所。文化进步，哪件事应该在哪个地点举行，才划分清楚。但仍要于近郊东南别建明堂，于其中“祀五帝，布时令”则与《吕览》、《月令》、《淮南》所言相合。

我们现在将话头带回来。明堂制度当是域外文化第一度入华时带进来

的。“祀五帝，布时令”的事，大概已有些简略的条文，其成为《吕览》、《月令》、《淮南》所言的状况，则疑系邹衍来华时所增益。各篇中所述文物制度与时令相配之精密，细致，令人舌挢不能下；天子生活之拘板也几无生人乐趣可言。你看他在哪一季里所吃的东西有一定，所御女颜色也有一定，半毫不能差错，即贵为九五之尊，恐也不如一介平民了。《史记·孟荀列传》说：“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这也是无怪的吧！

(5) 邹衍学说之被剽窃 《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汉书·艺文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篇，共一百零五篇，后失传。清人马国翰辑《邹子》一卷，亦不过从《史记·孟荀列传》、《封禅书》、刘向《别录》等摘抄了十几条简单文字而已。我想象邹衍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著述完全失传是不可能的，当是被别人剽窃窜入他们自己著作中了。从前的人是无所谓“学术良心”的，也无所谓“著述主权”的。剽窃了别人的东西，谁又注意？谁又能出面抗议？

邹衍的著作在距他不远之时，人家便大肆剽窃了。《史记·孟荀列传》说：“邹 [S]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 [S]，炙毂过髡。’”《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在邹衍及身之日，他的五行学说，还被儒学大师孟轲攘夺了去。《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在孟子后，那是错的。也许这是以年龄来论的。孟轲以周显王三十三年（元前三三六）适魏，见梁魏王，王已称他为叟，再过十七八年，以周赧王二年，齐宣王二十四年再至齐，时在元前三一九，他年纪当然更老了。而邹衍和一些域外学者避乱来华，当在亚历山大侵略印度之际，约在元前三二六以后几年里。邹衍来华时究竟多少年纪，自难详知，但决不是像孟子一样的“叟”。故此，我敢说邹衍到齐在孟子前，年龄则比孟子轻一大截，故《史记》误认他“在孟子后。”

荀卿《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热徊恢F 录 且玻 焯芒 \*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里“五行”杨倞谓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谭戒甫的《思孟五行考》广征博引，也主五行即是五常。五常是儒家所极力鼓吹的道德规条，若真是五常，荀子为什么要加之僻违无类，幽隐无说，闭约无解的抨击？可见不是。今《孟子》七篇中并无五行之说。外篇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正》久佚。看这四篇题目似乎也不会有五行学说杂出其间。恐怕仍在内篇里，被后人认为异端，删去了。

荀子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可见孟轲盗窃邹衍学说，而托之子思。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又是孔子之孙，荀文中的“先君子”，据杨倞说即是孔子，下文又说“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世。杨注：“仲尼，子游为此言，垂德厚于后世。”又可见孟子不但假托子思，还一直上溯到儒家之祖孔子身上。孟子在墨翟学说里大作其贼，反骂墨为“无父”，为“禽兽”，那么他偷了邹衍的东西却挂在子思身上，原是这位亚圣所惯为的事。刘节云“战

国时，齐鲁之学，孟子为盛，而五行说盛倡于邹衍辈亦在齐鲁之间，或与孟子有关，故荀子讥之”（《洪范疏证》）。其实孟子之五行学说是“必与”邹衍有关，并非“或与。”

五行之说我国夏代即有，生克之理，《左传》已稍见端倪，但邹衍入华以后，所谓《五德终始》与《主运》之理，擘析细密，灿若列眉，则为他携来的新资料。孟子剽窃了这新资料而附会于子思，不知者当然不知其所由来，故荀子谓其“案往旧造说”，“案饰其辞。”

孟子在齐与邹衍曾相过从，今所传孟子佚事，言孟子曾对邹衍说，“我老矣，不能从子作海外游也。”似乎邹衍曾邀约孟子同游海外，即他所从来处，孟子以老谢之。这段话似系从《孟子》七篇刊落资料而来，且与五行一类话头一同被删削，偶然得被保存者。我敢证其为真实。因为邹衍乃域外学者，以前从无人知道，造伪史者决不会有“从游海外”之语。

（五）惠施及公孙龙的诡辩学派与邹衍同时来华或先后来者尚有公孙龙，见前引《平原君》传。《孟荀列传》云：“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庄子·骈拇》篇：“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汉书·艺文志》有《公孙龙》十四篇。今本《公孙龙》有“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六篇。其《白马篇》云：“白马非马，可乎？曰可。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应有白马，是白马非马审矣。”其《坚白论》云：“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一，二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庄子·天下》篇又说一个学者名为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又云：“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牛；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口止展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二十来条又说是公孙龙的话。希腊在苏格拉底前有一派诡辩学派，其所辩理论，今已失传，但有几条则颇与战国惠施，公孙龙等所言相类。如“轮不地”、“飞鸟之影未尝动”等条。他们的话诚如庄子所言；“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然非有高度的脑力，精密的思考，亦不能提出这类问题，产生这类智慧和思想的。产生这类智慧和思想又非有高深的文化背景不可。我们战国时代文化忽然跃进到这个地步，我认为是难于想象的。除了说是域外学者挟此以俱来，是很难有别的解说的。

（六）《墨经》中之科学定理还有一个大学派便是墨家。笔者曾怀疑墨翟是希伯来的学者，他揭橥“兼爱”的宗旨，创立“钜子”制度，又一意阐

扬“天志”，很像罗马日教的前身。其《墨经》里《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蕴藏着若干科学定理。《备城门》至《杂守》十一篇也有许多机械理论。虽是“别墨”所撰，总也算出于墨派。墨翟率领其徒众并带了许多书籍来，本身生活极其俭朴，生存条件较易，又以宗教家的热忱，推行其教义，是以不须要多少时间，其言便盈于天下。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文化进步，一日千里。不是王官失守，学术散在民间；也不是封建制度崩溃，列强崛起延揽人才，破格用人；也不是井田破坏，农业社会忽变为商业社会，经济情形大为变动的缘故。这些缘故固亦不能说毫无影响，而实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域外学者避乱来华，携其学术思想以同来，中国学术界受此刺激，始涌起了学术思想壮阔的波澜，成了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

选自《屈原与九歌》

## 五 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迹

我对于自己的屈赋研究，过去说的话本已不少，无奈总得不到读者什么反响，于今《屈赋新探》第一集《屈原与九歌》出版已将半年了，批评文字也算有了几篇，说的话，可以说对我“称许过当”，令人读之汗颜，但朋友传说则谓学术界颇多反对的意见。他们的话总括起来不过一句，就是“域外文化在汉以前传入中国是决不可能的。”但域外文化这句话正是我的“中心思想”，我一百数十万字的《屈赋新探》完全以此为根据，为基础，根据失去了，基础动摇了，则全书的价值自然等于一个“零”了。现在我向读者解释的正是这个问题。

屈原的《天问》和《九歌》，以前所以不大为读者所了解，历代楚辞注家所以费尽心力，不能疏解明白者，就是为了《天问》和《九歌》的内容多为域外的文化分子，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学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王逸号为楚辞权威，他注《九歌》一些难解的话——譬如《九歌》里常有祭神的男女信徒向所祭之神说许多爱恋思慕的话，宛如人间男女对所爱之对象者，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如此，于是他灵机一动，宣布这些话都是“譬喻”，正如后世所谓“托夫妇以言君臣”，是屈原借以表明他自己与楚怀王君臣遇合之关系的。于是十篇《九歌》，在王逸笔下只在屈原与怀王身上反反覆覆兜圈子。我替王逸这个方便法门杜撰一名，曰“王逸的象征主义”。这个象征主义，倒并非王逸所单独发明，汉儒解释《诗经》，早就在大用特用了。

朱熹的《楚辞集注》论《九歌》也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褻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朱熹这番话把王逸的象征主义，算已充分发挥了。自王逸到朱熹，自朱熹到明清，甚至现代的旧派楚辞注家，都墨守着这个原则。头脑比较开明者，不敢譬喻之说，则从六朝神弦曲里采取一二句子，证明民间祭神照例要

夹杂一些“褻慢”、“荒淫”、“燕昵”的话头。

《九歌》既是湘江流域民间祭神之曲，当然逃不出这条定律的支配。

但若问为什么有这条定律，则那位说话的学者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早在四十余年前，我撰写《九歌中人神恋爱的问题》便凭藉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等证明《九歌》那种现象，是“人神恋爱”的关系。而人神恋爱又由“人祭”而来。此文原收于我的《蠹鱼集》，后收于我《文星十书》，即以文题为该书之名。

至于《天问》以文理杂乱，内容深奥，能解得通的，二千数百年来更无一人。

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九歌》之神乃九曜之神，是域外来的。《天问》更是域外文化思想之总汇，不明域外文化情况是无法解释的。这域外文化策源西亚，也就是两河流域，传播遍于世界，世界几支古文化国家如埃及（埃及与西亚文化同其古远，各自发展，但曾相互受影响）希腊、印度及沿地中海诸国，均在此种文化势力笼罩之下。这种文化曾两度来我中华，一度在夏商前，一度则在战国中叶，后者正当屈原时代。

我曾在《屈原与九歌·自序》里说过，屈赋之难于理解者，是因为中间横梗着一道坚墙。这道坚墙不打破，再过二千数百年，或几个二千数百年，屈赋所给我们的，依然是“闷葫芦”一个，打破了，则屈赋立刻出黑狱之冥冥而就白日之昭昭。全部内容，皆将点滴无遗，纤洪毕现地呈露于我们面前。所谓坚墙，便是域外文化。

我相信自己这些话并非夸诞之辞，读了我的《屈原与九歌》，便将开始相信。读完我的《屈赋新探》一百数十万字，更将认为我的话果然大有道理，值得研讨。

我们中国人向来相信在汉以前，中国完全是个闭关自守的国家，汉武帝通西域，对外始有交通，也知道有什么“身毒”、“乌孙”、“西域三十六国”等等，但其地域皆在中亚和东南亚，于今竟说文化来自万里外的两河流域，毋乃太过于遥远。而且域外文化在战国前便已来华，实是一桩极大的事，何以从前竟无人知道，历史上竟无丝毫痕迹可寻呢？况中国接受外来文化原非一次。像汉晋以来的佛教文化，明清以来及近代的西洋文化，他们的高僧大德和传教士，怎样抱宏道之旨，排万难而来中华，我国热心慕道之士，又怎样冒万死，而西行求法；我国又怎样立庙度僧，译经制典，事实皆朗若列眉，斑斑可考，为什么战国前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事，竟如云雾中的神龙一样，既不见其首，又不见其尾呢？为此说者，若不能把域外文化两度来的“来踪”“去迹”交代明白，则他说的话又怎能教人信服呢？

这真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天下事固有许多离奇怪诞，出人臆度者，我们却不能因其怪诞而否认那件事的存在，照逻辑学上原理说，凡事有因乃有果，我们固必须由因以觅其果，但也可以由果而溯其因。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迹”，固不能像佛教文化和西洋文化之载诸史册，易于查考，它所留下的痕迹，却明明白白存在我们文化体系里，成了我们的新血轮，新细胞，甚至于新生命，无论如何，不能抹煞。

我所主张域外文化曾二度来华，第一度在夏商前，以时代久远，这文化是怎样来的，实难查考，不过它所留下的痕迹，则有以下各端。这几端均在战国前，与两河流域及世界几支古文化国家所有者，若合符节。除非你否

认世界几支古文化所有诸点，是笔者个人所伪造的，否则你不能否认中国文化体系里这些显明的痕迹。

现将这几端痕迹，简单列举于次：（一）齐国之所以为齐，因居大地脐上，脐在人体中居于正中，即在人体上半部与下半部的中间。国家或仙山，既云居大地脐上，则处大地之正中，故齐又号“中国”。（二）齐境泰山在古代居于昆仑地位，它在大地脐上，上对天之脐，为天门。中国帝王封禅所以必在泰山举行者，即因由泰山上天是一条捷径。封禅的原意就是升天成仙，所谓“成功告天”，是后儒的强解。

（三）西亚世界大山——即昆仑——下面即是地府，地府又名幽都。泰山下有梁父山，乃是一个大坟场，帝王封禅时在泰山顶上行封礼以祭天，在梁父行禅礼以祭地。古时谓人死之后魂归泰山，实则归梁父的地府。东岳大帝也即是死神，地位等于印度的阎罗天子。后来渐有地府十殿之说，人们便把魂归泰山的事给忘记了。

（四）齐国境内有八神将，即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实则是连大地而言的七曜之神。七曜即水、火、木、金、土、日、月的七颗行星。源出西亚，有七星坛以奉祀。后变为九曜，加蚀、彗二曜，七星坛也就加了两层，变为九星坛了。

传入我国时尚为七曜，可见传入时代之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到泰山封禅，连带地将八神奉祀之地——寻出。《史记·封禅书》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其祀绝，莫知其起时。”亦足证八神入中国时代之古，连始皇时，都搞不清楚了。

除此以外尚有鲧禹与洪水故事，夔与巫咸故事，是否发生于齐境无可考，但都与西亚最古的创世史诗及神话有关。

齐地原为鸠爽氏故居，其后又有季荊氏、逢伯陵氏、薄姑氏。周武王伐纣得天下，封功臣吕尚于齐，后来为齐首都的营丘尚为夷族的莱人所盘踞，大约姜太公用了若干武力加以扫荡，始能将莱人驱逐或逐渐消灭。皆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史记·齐太公世家》。上述这些域外文化分子是鸠爽氏等民族所接受的，还是莱人，不得而知，但我看当是鸠爽氏及莱人一类民族。据《左传》杜注，鸠爽氏乃少皞之臣，则其时代尚在唐虞以前。少皞、唐、虞，我都不信其为真实历史人物，惟鸠爽氏时代绝早，则可断言。这类民族我相信他们文化水准尚高过华族（华族二字乃姑指，无非言其为与夷狄异之民族），正如徐偃王时徐之文化高过周民族。后以各种因素，被华族压抑下去，他们便被称作“夷”、“狄”、“蛮”、“戎”，他们所携来的域外高等文化也被华族接收，又由齐辗转传布诸国，竟当作中国所固有的了。

及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又大量传入。这一次与第一次不同，是挟着排山倒海的威势传进来的。我曾作一揣测：是与马其顿亚历山大侵略欧非亚三洲有关。大批学者为逃避兵祸，携带着学术知识，辗转逃到了远东这片安乐土。这些学者也许尚携带眷属同来。他们也是人，需要穿衣吃饭，到中国后，或居留齐燕诸大国，受当时君主的礼遇与贍给，或寄食于王公大人之门。战国所谓四公子大概有几个曾为这些外来学者的食主。有些学者则以他们的学问为交换生活的工具，收受生徒，靠束\*或学生的供养为生。齐国的稷下更为此类学者聚居之所。以邹衍为之巨擘。

自夏前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到战国中叶，时间已经过一千数百年甚至二千年之久，文化总是向前进步的，域外文化在不断进步之中，乃是自然之

理。第二度传入的文化比第一度传入的，条理当然更加细密，组织当然更有系统，幅度当然更增广阔，内容当然更见精深，是以那文化一到中国，殿堂倾倒，举国风靡，而激起了战国中叶波澜壮阔，光芒四射的学术文化的黄金时代。

这些域外学术思想，散见于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之书中。连号称中国正统的儒家学说，也沾染了不少这种文化的色彩。屈原曾使齐三四年，以他天生“妇 牟呕# ú 难 叮\*及其善于吸收新知识的灵敏头脑，必与稷下谈士中那些域外学者深相结纳，殷勤请教，所获域外知识非常丰富，返楚后，乃写成《九歌》那一套神曲，更以全部域外知识，如天文、地理、神话与杂有外国神话之夏、商、周三代历史事实，撰成《天问》那个鸿篇。又写韵文的自传《离骚》，充满遁世升仙浪漫思想的《远游》，更以溢出的资料写《招魂》。

屈原这类作品的内容在当时原是人人知悉的，其后域外文化传入的事，渐为人所遗忘，他大部分作品内容，遂成为千古不解的大谜。

域外文化传入中华，果然是一桩大事，为什么竟渐为人所遗忘呢？这又如前所述，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难题，勉强解释，则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原因是遭遇了政治上巨大的压力。

秦始皇热衷于求仙，企图从仙人处得到长生不死之药，费了无限的人力和钱财，仍然一无所得，反被方士讪谤。愤恨之余，迁怒于域外文化而有焚书坑儒的暴行产生。他所焚的书固为儒家经典，恐包涵域外文化知识之书，更居其大部分。李斯等劝始皇焚书时本说：“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诗书儒家经典，百家语即诸子百家，当时最富于域外文化色彩的书籍了。始皇所坑之儒，照《史记·儒林列传》说乃系“术士”其实即是“方士”。《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为始皇求仙药而不得惧诛亡去者以侯生、卢生为首。“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巨万计，终不得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我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谣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据胡适先生说：“细看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故我想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学中绝的真原因”（《中国哲学史大纲》）

秦以法家学说治国，始皇或者并不爱儒士，但并未将他们赶尽杀绝。这里又有郑樵的一番话为证。樵云：“陆贾，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故对。是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之后，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计议不合者耳。”（《文献通考》）

方士固可作方技之士解，但“方”字古时实指异于中国之邦国，如“人方”、“鬼方”、“徐方”……即域外诸国。“方”后变为“番”，又变为“胡”，又变为“洋”。始皇所坑方士当然不是战国中叶来华之域外学者，他们有的回国去了——老子骑牛出函谷关，也许是回其所从来之国吧——有的老死于

中国了，其所传授之徒子徒孙，亦名方士，意指研究域外学术之人。

始皇说方士们“为谣言以惑乱黔首”，毁谤始皇的不德，固为其罪状，恐怕他们还要将战国时域外传来的“禅让”说搬出来企图撼摇秦的政权。禅让之说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尧舜官天下故称圣王，禹德衰，不传贤而传子，这些学理为盼望万世一系的始皇所最畏恶者，自然要设法制止。

域外文化经秦始皇的大力摧残，为之一蹶不振。其后又有刘项六七年的大战，流血遍野，肝脑涂地，文化事业，谁还讲求？至孝景时尚未除挟书之禁；中国人几乎全体成为文盲了，更有什么文化可言？及武帝即位，雅好楚辞，暮年又好神仙，屡次东巡，封禅泰山，遣方士入海求仙药，齐燕方士又趋活跃。武帝的叔父刘安与门客集体创作一部《淮南鸿烈》更集域外文化之大成。惜数典已忘其祖，竟不知这些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了。

第二个原因比较简单，是我国人把域外文化当作中国的固有文化，遂不知注意。佛教文化是汉晋时从印度传来的，明清及近代西洋文化是欧美各国传入的，中国人知道很清楚。至于域外文化第一次传入我国，已在夏商以前，时代久远，已被吸收于中国文化体系之中，已如前述。及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又复传来，与第一度传入者，面目虽稍异，精神则完全相同。中国人以为自家宝物，又归故土，虽觉博大精深，远胜于前，非常兴奋，却引不起像对于佛教文化及西洋文化一般之新奇的感受和震惊的心理。像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言九重天之说，《明史·天文志》云：“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利器，前此未尝有也。”但对于西洋人九重天之说，则又云：“楚辞言‘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浑天家言天包地如卵里黄，则天有九重，地为浑圆，古人已言之矣。

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故表出之。”这就是说九重天之说，中国古已有之，西洋历算之学比我国精深，所以言诸天层次及其相距之远近，比我国为详而已。既如此，则九重天之说又有什么稀奇呢？

其实中国古时的九重天，七曜，皆来自西亚，西洋亦受之于西亚再传弟子之希腊，其相同之点是无怪的。

第三个原因，或者中国古人也像印度人一样，缺乏历史观念；或者基于民族自尊心理，把外国学者一律华化。他们原来的国籍，原来的姓名，及其远道来华的事由，一概加以有心的修改和故意的抹煞。只有他们的学说是无法改头换面的，所以邹衍的“大九州”，《五德终始》及《庄子·天下》篇所介绍的战国诸子学说，尤其公孙龙的坚白同异之辩，及惠施的卵有毛、鸡三足、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的二十几条原则，其中“轮不地”、“飞鸟之影未尝动”与希腊诡辩派的理论完全相类，即其明证。

再者域外学者姓名籍贯之改变，或者是他们所自为而非中国之有意改窜。人类有“入乡随乡”的天性，域外学者入了中国，一定要与中国朋友或弟子相商，替自己取个中国名字，改穿中国衣服，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饮食起居，完全中国化。这在明清及近代西洋传教士还是如此，更何况战国时代？久而久之，中国人忘记他们是域外来的，他们自己也忘其为域外人了。

不过若非秦始皇之大力摧残及汉初百年文化之破产，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大量传入之盛况，中国人不致忘得这么干净。现在我再把域外文化两度入华的“来踪”“去迹”再作总括的交代。第一度何时传入，不可考，时间姑定为夏商前，传入第一站系在齐境。接受之者为原在齐境之鸪爽氏，或者所

谓鸠爽氏等即是移民。他们气魄不小，文化程度也高，他们在齐境建立了一个雏型西亚国家，但观其七曜诸神（即八神）奉祀地域散布之广，几及山东半岛的全境，泰山俨然成为西亚“世界大山”的翻版，即可知道。这类民族历久势微，被华族消灭，接收了他们的文化。因为是从异族手中接收过来的，转了一个大弯，所以“来踪”便弄模糊了。“去迹”呢？没有去，混入中国文化，浑然成为一体了。

第二度域外文化传入时代是在战国中叶，“来踪”极其明显。不过以前尚未为人知，今借助于我的楚辞研究，隐蔽之幕始大揭。“去迹”呢？也没有去，经秦始皇及汉初百年之衰落，又以汉武帝求仙运动而复行活跃。不过自武帝罢黜百家专尊孔子后，中国成了儒家的天下，诸子百家之说，成为偏统，罕有注意者。汉纬书家将域外文化当作儒家经书之纬，谓一经一纬，始能织成布帛，惜妖言怪语究竟太多，及变为推背图，烧饼歌一类预言，更无齿及之价值。经纬书家之努力，域外文化之点滴，虽赖其书而保存，却非域外文化原来的精神了。

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以齐境为第一站，也可说以齐境为根据地。这个文化在此区域，曾轰轰烈烈，着实热闹了一番。第二度来华，最先登陆处也是齐国，稷下谈士中的邹衍，不是这批外来学者的领袖吗？

我以前假设域外来华有三条路线，第一条即自印度洋沿海东行，再沿海北上，直到山东之罟、登、莱而登陆，现在我想这一条路线是最重要的，为了两度来华文化均从此道而来。

山东半岛负担两次沟通中外文化的重任，在地理的光荣上，诚莫与京了！

选自《屈赋论丛》

## 照一般的研究，基督教之入中华，始于唐代景教（Nestorian），我则主张更

应提早若干世纪，直到战国中叶。因为我曾在屈原《天问》里发现《旧约·创世记》的全文，虽然写得极其简单，而重要节目，无不具备。开封一赐乐业教重建清真寺三道碑文，其中有一道言其教于周时即入中国，学者皆以为妄，我则独信为真，假如该教于周时传入，屈原又如何能写出《天问》那段文章？稍晚，我撰写这篇论文，发现我国古时的上帝，也即是六经里的上帝，性质与以色列的上帝，可说完全相同，我又进一步主张商周以前，古教已传来了，我于是将希伯来文化之传入，分为两个时期：（甲）第一时期

谓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必须承认世界民族也同出一源，所谓人类来源如何，据旧经创世记之说，当然简便不过，但现代人均认不合科学原理，或神话色彩太浓，不肯予以重视。且人种一元论，据人类学的说法，又非常复杂。至今尚无定论。本人既非神学家，亦非圣经学家，更非人类学家，对此实一词莫赞。惟对于一派历史学者的主张，颇乐于接受。因为有一派历史权威者根据许多证据，推测世界人类策源于地中海一带。距今五万年前（或谓为三万年或万余年前），地质上起了绝大变动，洪水泛滥，人类的故乡，完

全陆沉，成为今日地中海。子遗的民众，带着这个恐怖的记忆，四散逃生，人类所到之处，洪水故事也就随之传播。若此说不谬，则我们将创世纪的尺度略略放宽来看，则创世纪还是可以成立。

关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之说，倡导者亦颇有人，本人研究古史的结果，极其赞同：盖世界文化源于小亚细亚，其后乃逐渐传布于地中海一带、希腊、印度、中国及其他各地。初传播时，各地文化尚保持其原来色彩。传之愈久，则走样愈甚，形成各种的型式。所以旧经巴别塔的故事，虽似幼稚可笑，但我们看时，若将其尺度放宽，则亦不能不承认它有相当的道理。

据开封一赐乐业（四字为伊撒尔即以色列的对音）碑，言该教在周时，已入中土。此说从前无人肯信，本人则已于古籍中发现证据，可以证实此言。现在更主张远在周代之前，中国人已接受了希伯来的上帝。盖中国自古以来为一神教，所崇奉者为天帝。“天”与“帝”二字散见六经，甲骨文中亦不可胜数。近代学者考证此二字与小亚细亚文化大有渊源。巴比伦古象形文字中有一个个字，其音为E - d i m，义为天。又有一个米字其音为D i n - g i r，或D i - m m e r或D i m e r，其义为天帝或人王。

中国甲骨文里的天字为癩，金文则作癩，说文作癩。其字体的构成，均以个字为基础。

至于帝字：

甲骨文作癩、癩、癩

金文作癩、𠄎

皆以米为基础，其字体形状与巴比伦的帝字也相类。天与帝二字双声。中国古音，天读为T i m - d i n，帝读为T i，两字意义亦互通（以上见刘复《帝与天》，魏建功《读帝与天》另有胡适先生的论文，不赘）。

笔者于战国时代古籍中又发现“狄”字，为天神帝字之另一音译，如仪狄，金狄，详见拙著《山鬼与酒神》篇。

在甲骨文里也还有几种称呼，称“帝”为最普通，有时称为“上”，常与“下”相对而言。如：贞勿佳王，正吉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又。

癸丑卜，吉受贞勿佳王正吉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又。胡厚宣先生云：以《天问》：“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泰誓》下：“上帝弗顺，祝降时丧。”证此，知上下之上，必为上帝，而下者或指地祇百神而言。

有时则称“上子”，如：贞上子不我其受。

贞上子受我又。

胡厚宣先生云：以他辞屡称“帝受我又”，“帝不我其受又”例之，“上子”亦当即上帝也（以上引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

又称“上天子”，见金文桓子孟姜壶。

今日出土的甲骨文，最早尚未过殷高宗武丁时代（约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但我们可以推论武丁以前的各朝，也许都是崇奉上帝的。

周民族崛起西方，与夏商民族不同，但也是个崇奉上帝的民族。由周代传下来可靠铜器铭文提及上帝者则有下列各铭：

大克鼎 克双甘（友）于皇天。

毛公鼎 丕显文武，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余

卩王义楚端 用享于皇天。

宗周钟 我佳司配皇天王，对于宣周实鼎。

师旬殷 佳皇帝亡\*！。临保我有周。

宗周钟 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

至于六经，则《虞书·舜典》：“肆类于上帝，\*于六经。”《益稷》：“惟动丕应\*#志，以昭受上帝。”《尚书·汤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周书·大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诗·小雅·正月》：“有皇上帝，伊谁云憎。”《菀柳》：“上帝甚蹈，无自昵焉。”《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亦简称“皇帝”，《吕刑》：“皇帝清问下民。”

亦称“皇天”，《大禹谟》：“皇天眷命。”《太甲中》：“皇天眷佑有商。”亦简称为“天”，《皋陶谟》：“天叙有典……天讨有罪。”《益稷》：“天其申命用休。”

或者有人要问：甲骨文里的天、帝二字既与古巴比伦文字相类，安知中国的上帝非来自西亚吗？这则须将上帝的性质和最高神道的性质，比较一下，才可明白究竟是不是。但西亚国家不止巴比伦一个，其文化皆彼此渍染，大同小异。西亚较早者为苏末，巴比伦、亚述之文化都沿袭苏末。今但泛言西亚。今日西亚文献之可徵者最高神道称为“倍儿”(Bel)，但他们倍儿的地位，并不固定。某一时代，因了政治关系。或由一时风尚，一个大神便可跃登倍儿的宝座。那个被挤出去的失势倍儿，则成为“老倍儿”(Older Bel)。西亚的倍儿有姓名可稽者：有暴风雨神之恩利尔(Enlil)；有本为巴比伦城的主神，因汉漠拉比(Hammurabi)自西方入主，定都于巴比伦，遂身价骤增，一跃而成倍儿之马杜克(Marduk)。还有几个水神及太阳神，由于民众崇奉太过，均先后成为倍儿。中国只听见尧舜禅让，未闻上帝禅让，只听说汤武革命，未闻上帝革命，此其不同之点一。马杜克有父有母(相传其父为智慧之神，他遗传乃父之智慧，故能压倒一切，而为万神之主)，且有高曾祖母。他的高曾祖母即生于深渊的孽龙蒂亚华滋(Tiawath)，她产生那些天神，见其势力日盛，又生嫉妒之念，兴兵想将他们消灭。马杜克由众天神拥为领袖，与蒂亚华滋作战，亲发雷矢，将其击毙，剖其尸体以为天地日月，山川万物。

中国上帝有这种悖伦乖理的行为吗？此其不同之点二。由此可证中国上帝与西亚的倍儿实非一物。

不但巴比伦而已，中国上帝与任何民族的最高神道都无相似之处。苏末是比巴比伦更古的民族，其最高神为哀亚(Ea)，乃深渊与水之神。埃及最高神道为拉(Rah)，乃太阳之全体，亦即埃及国王之父。亚述神称为阿努，或称阿那(Ana)，为全神之父，万民之君，管理天地万物，其实不过由伊勒克城的城神演变而成。希腊天帝为宙士(Zeus)，不惟有父母，祖父母，且有兄弟姊妹。宙士本身更有妻室儿女。希腊群神欢喜闹恋爱，宙士也不能例外，不论天神地魄和人间女郎，只须具有姿色，他便要垂青。宙士篡父得位，善用雷矢，与巴比伦马杜克仿佛，或系同出一源。罗马周比特(Jupiter)，完全是希腊宙士的化身，不必多论。印度古婆罗门教崇拜偏入天韦纽(Vishnu)，大自在天湿婆(Siva)，及大梵天(Brama)，三者地位平等，法力相同，谁也管辖不了谁，故印度没有一尊之神。以太阳神变为宇宙主宰尚为宗教观念的进化。比较原始的民族则一直将几种天体当作崇拜的对象。如南美的墨西哥、秘鲁皆崇奉太阳为唯一至尊之神，不惜杀人以祭。波斯、埃及文化虽高，而波斯人信米突拉(Mithra)，埃及人信拉(Rah)，皆为太阳神。中非洲土人及南美洲土

人则崇拜月神。亦有拜星者，特限于某一行业，且亦并非视为宇宙主宰。又有拜火者，则视火为尊神。

至于各地野蛮民族崇拜鳄鱼、河鱼、蛇、狐、岩石、树木等，则更自鄙以下了。

中国上帝与希伯来的上帝一比，相类之点非常之多。希伯来的上帝自来便有，如《出谷纪》三章十四节：上帝对梅瑟说：“我是自有者”，《启示录》一章八节：“上帝乃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若望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与天主偕，道即天主，自始与偕。”无父母生养之说。中国上帝亦不知其由何而来，玉皇大帝有西王母为其母（玉皇与王母的关系，始终无定准），乃道家的说法，与儒家的昊天上帝无关。中国上帝并无妃匹，更不像希腊宙士有那么多多的罗曼史，历代虽有许多天后、天妃的祀典，那是另一回事。

希伯来的上帝也纯洁非常。

希伯来的上帝无形无像（《创世纪》所记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指灵魂方面而言），他严禁属下的人民替他造像，不啻三令五申，列为重要戒条（见《出谷纪》、《肋未纪》。《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鬼神之为德盛矣哉，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道家所祀的玉皇上帝尚有冕旒袞裳之帝王型塑像，而历代帝王祀天之天坛则虚无一物。任何民族崇拜一神，必喜其较为具体，故创造偶像实亦出于人类天性的要求，中国人并不是不会造偶像的，为什么天坛独无偶像呢？这一种伟大的传统压力由何而来呢？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回教产生于小亚细亚，她的“阿拉”也渊源于希伯来的上帝，所以清真寺也没有阿拉的塑像或画像。

希伯来的上帝以人民为其子，《申命纪》第一章三十节：“你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见了上主，你的天主，抚养你如同一个人抚养自己的儿子。”第八章五节：“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就同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三十二章第五节：“他是忠诚无妄的天主，公平而正直，那不堪称做他儿女的，向他行恶，侮辱了他。”上帝为民众立君，使之代为民众父母，君主也是上帝之子。《撒慕尔纪》下第七章第八节，上帝对达味说：“我从牧场上，由牧羊的事业拣选你当我民伊撒尔的领袖”；十四节：“我要作他父亲，他要作我的儿子：若是他犯了罪，我将藉着人的鞭策和人的打击来惩戒他。”《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第九节，达味告其子撒落满以上帝之语云：“他要作我的子，我要作他的父，他作伊撒尔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中国亦谓人民虽为母亲的儿子，实则是天的儿子（《癸梁·庄公三年传》）。中国帝王称为天子，但对人民方面言则为父母。《周书·泰誓》上：“癸聪明作元后，元后伴人民父母”；《洪范》：“天作民父母，以为天下主。”中国也有牧人之喻，虽指官吏言，也可指天子，因为他们同是民众的领袖。《吕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谁作天牧。”天子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故《礼记·表记》：“惟天子受命于天。”

希伯来的上帝是仁慈的，故《圣经》屡言其有“丰盛的仁慈”、“无限的仁慈”。《周书·酒诰》：“天非虐，惜民自速辜”；《汤诰》：“上天孚佑下民”；《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天之爱民甚矣。”

希伯来的上帝也是正义的，人类犯罪太过，他就要严行惩罚，不予宽贷，有时降天灾，有时降人祸，甚至不惜毁灭整个城市，整个大地。这事中国经籍亦数见不鲜。对于个人者，则如《左传·定公六年》传：“天将多阳

虎之罪以毙之”；《昭公十一年》传：“蔡侯获罪于天，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对于整个国族者，则如《君爽》：“天降丧于殷”；《左传·隐公十一年》传：“天而既厌周德矣。”又“天祸许国。”《成公十三年》传：“天祸晋国。”《襄公二九年》传：“天祸郑久矣。”

希伯来信奉上帝者死后灵魂都要升天，其有特殊功德者，则坐上主的左右。《圣咏》第一百零十首达味作歌预言耶稣云：“上主对吾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人，屈作你的脚凳。”盖犹太习俗，以右边为尊。《玛窦福音》二十章二十节：“慈伯德二子之母率子至耶稣前，跪求耶稣赏二子入天国，一坐耶稣右，一坐耶稣左。”《玛窦玛尔谷福音》：耶稣许十二宗徒升天以后，坐其左右，审判伊撒尔十二支派。《易·谦卦》：“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书·召诰》：“兹殷多哲王在天”；《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希伯来上帝显现时，常有大光，屡见《出谷纪》。上帝脸光之强，血肉凡躯，见之必死，《圣咏》第七、第八十、第八十九、第一百十九篇均有道及。梅瑟和上帝接触频繁，脸上也传染了他的光，与伊撒尔民众见面时，怕他们受不住，拿帕子将脸蒙上了。耶稣变容时脸面明亮如日，又对门徒言义人在天国，要发光如太阳。耶稣亦被称为“德义的太阳”。中国古时称上帝为皇上帝，“皇”字乃形容词，言上帝之光辉奕赫。尤奇者，中国古时也说上帝之光有如太阳，顾实先生引古铜器皇颂敦、庞姑敦、师和文敦、陈因资敦、齐子仲姜、王孙钟等说及“皇”字写法有许多款式，皆有从日从光之义（刻字太难，从略。见顾实《释王皇\*》）。

希伯来上帝所居，光明洞澈如水晶，如琉璃海，并有火搀杂，见若望《启示录》。中国古时称上帝为皇天上帝，或昊天上帝。《尔雅·释天》“夏为昊天”，注“言元气皓吁”，疏：“昊者元气博大之貌。”其实昊字从日从天，言其光明赫烈。夏季日光最强，故有“夏为昊天”之语，若元气博大，则四时之天皆然，又何必特指夏月？《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浩浩即博大，复则不词。前人对古书注疏，有许多今日皆须重改，昊字不过其一例罢了。

希伯来的上帝虽统率着无数天神，但上帝的地位高于一切，故别的民族所奉为多神教，而希伯来则为一神教。中国古人虽亦祭祀日、月、星、云、山川、百畹，但都不足与上帝比并。祀天之典称为“郊祀”，最为隆重严肃。《礼记·祭义》：“郊之祭也，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敬之至也；”《郊特牲》：“祀帝于郊，敬之至也。”我们呼吁、祈求、发誓、往往不向他神，而以上帝为唯一对象，所以中国也可算是一神教。不过后来民族混合日多，祭祀亦日益庞杂，一神的意义，渐渐模糊起来，所以人家称我们为多神教的民族了。

希伯来上帝的祭祀以牛为主，牛宰杀后，必用火焚烧，称为燔祭。中国祭天也以牛为主，故牛称为“特性”，在最古的时候当亦燔炙，以后则仅陈于高俎而已。但中国祭天有庭燎，环于天坛之外，也许是燔祭的蜕变。希伯来上帝歆燔祭之馨香，称为“馨香的火祭”，义人德行上愜天心，亦常以馨香为喻，《圣咏》屡不一见。中国古代也以德行比为馨香。

《书·君陈》：“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酒诰》：“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德行的反面为罪恶，馨香的反面为腥臭，是以《酒诰》斥骂罪人又有“腥闻于天”之语，《吕刑》亦云“上

帝临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

以上所引希伯来与中国上帝雷同之点，乃其荦荦大者，其他细情末节，容将来有机会再谈。

《易经》在六经中称为最古，卜爻传为文王作，十翼传为孔子作。但宋以来对十翼时代便已怀疑，卦爻时代亦颇有争论，我以为十翼当然是战国时代儒家做的，卦爻虽非出文王之手，但大部分材料是比较古的。现在我在《易》卦爻辞中发现许多与《梅瑟五书》有关联的话，不知是第一时期传入中国呢？还是第二时期？不过因为我相信卦爻较古，暂且将其放在这里吧。

《易经·复》卦：“七日来复”是指圣日；《无妄》卦“不耕获，不菑癯”，指圣年，笔者已有论列。但七日来复，或由小亚细亚一带七曜的祀典而来，不限希伯来民族，惟圣年则似乎是希伯来风俗。现在再看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这好像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缩写，指造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事。“六位时成”，旧注指为乾卦之六位，但照我看则似指上帝以六个阶段的时间将宇宙造成功。“位”有位置、地位之义，也含有阶段的意思。照科学研究，宇宙进化不知已历几万亿年，《创世纪》说上帝以六天功夫造成宇宙，与科学的事实相违背，攻击宗教者，每以此为口实。但照《圣经》学者的意见，则说“六天”原系“六时”，即六个时期，每一时期可伸长为数万万。想不到在中国古籍里倒有比较合理的译法。“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则似指上帝创造人类为庶物之首长。

《大过》卦：“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则指亚巴郎纳婢哈夏尔为妾，于八十六高龄生一子：“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则指亚巴郎寿至百龄，妻撒辣寿至九十，上帝许以生子，撒辣暗笑道：“我已年老，我丈夫也老了，哪能再有这样喜事？”但上帝居然教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创世纪》第十六、第十七诸章）。

《晋》卦：“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似指雅各伯用剥皮树枝诱羊配合，蕃殖羊群事。不过传到中国，羊变为马而已。《睽》卦：“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则似指雅各伯妻彼肋哈与辣黑耳因争丈夫之宠，彼此不睦事（同书三十、三十一诸章）。

《困》卦：“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指达味遭了撒乌耳王的嫉妒，时刻有被杀之危，奔窜入于山林，转徙旷野，有时亦栖身于幽谷。居山林时谅所坐无非木株，臀部为痛，故有“困于株木”之语。“三岁不覿”易卦常见，此处则似指达味逃山中，三年未见撒乌耳之面，“三”乃“语之虚数”，可增数年，亦可减数年，旧经言达味逃匿林野，虽无三年的明文，似数年之久是有的。“困于石”是指达味逃于玛红岩石间，撒乌耳率兵追逐，几乎给他追上，以闻边警而返师，后来撒乌耳听见达味在恒革狄旷野，又率兵三千来追，达味藏身于“野山羊岩石”的洞中，撒乌耳也进了那洞，若非洞中光线黑暗，则必被他发见了（《撒慕尔记》上廿三、廿四两章）。

“据于蒺藜”，旧经也无明文，不过古代犹太旷野和深山蒺藜特盛，我可以在旧经里寻出一大串例子来。达味既窜身山野，则据蒺藜是很自然的事。“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则指达味娶纳巴耳的寡妇为妻，居于漆刻拉格。他自培肋协特被谗回来，其地已先遭土匪侵袭，仅睹焚余之空城，妻子都被掳去，不能见面，乃与其部下放声大哭，直至声嘶力竭而后罢（同书廿九、

三十两章)。

为什么《易经》与《圣经》关系特别密切？理由是不易说明的。也许希伯来民族的史书归祭司掌管，中国古代的史官也杂于巫祝之间，为其性质相同，所以当然将传来的旧经文句混到卜筮上去了。这些零碎文句在《易经》里是毫无意义，但若和《旧约》合观，却可以看出意义来，若说两者毫无关系，是很难相信的。不过这中间或者还有别的原因，现在既未找出，只有姑置不论。

#### (乙) 第二时期

前文曾言根据各种证据，可信开封一赐乐业碑言该教于周时已传入中土确系事实，现在请将证据提出：第一证之于文学：

笔者于数年前研究战国时代大文学家屈原的作品，于无意间发现一端绝大事实，这事实便是战国时代，约当前三世纪顷，西亚、希腊、波斯、印度文化大规模地传入我国，并有许多学者和宗教家莅临中华，著书授徒，鼓吹学说，所以公元前三世纪顷，诸子百家，争鸣竞胜，思想顿趋活跃，造成了光明灿烂，盛极一时的战国文化。当时传入者，不但是那些天文、地理、历法、算数、医药、兵法及各种方术，即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也同时介绍进来。希伯来古教本已入了中国，这个时期并有传教士挟教义同来，我尝主张墨子便是教中大师，若然，则战国时犹太教传播之广，已和作为道家别派的杨朱平分中国思想界天下了。

笔者在屈原《天问》里曾发现《创世纪》的一部分，自亚当、夏娃、生命树、守生命树之天神、魔蛇，到洪水故事、挪亚方舟、巴别塔及亚当子孙传衍之广，无不应有尽有。根据《山海经》、《淮南子》诸书，我们尚可就残缺竹简，补足伊甸乐园之四圣河及智慧果树。

详见拙作《天问里的三个神话》第一部分。

又在《天问》和《离骚》里提出昆仑问题，著有《昆仑之谜》一书，凡七万余言，说明今日位置于后藏、新疆交界处之昆仑山脉，不过汉以后人所假定；《山海经》、《淮南子》及古籍所言昆仑，则为小亚细亚阿梅尼亚高原之阿拉拉特 (Ararat)，此山即《创世纪》伊甸乐园所在地。昆仑四水即《创世纪》四圣河。又红海、星海、阿拉伯海之名均早于《山海经》。

《天问》尚有“中央共牧”、“蜂蛾微命”二句，古今无人能解，但在旧经可以寻出它的注脚。“康回冯怒”，言共工首触不周，指天柱，“八柱何当？”所言为地柱，旧经亦有此说。《天问》全篇体裁，似乎受《约伯传》三十八到四十二章的影响。据思高圣经学会《智慧书·约伯传》引言里说，《约伯传》的产生时代约元前六世纪中叶，屈原乃纪元前三世纪的人，受其影响是可能的。同受《约伯传》影响者，尚有印度古婆罗门教诗人之一篇赞颂。

第二证之于六经：

自战国外来学术和宗教传入中国，取得知识界普遍的信仰。中国固有文化界不能不起恐慌，于是一面补苴旧说，一面吸收新知，正式建立学派，以图对抗，这就是“儒家学派”；听有儒家，也就是战国时代“中国本位文化论者”。

当时儒家吸收外来文化，具有很高的抉择眼光：他们将各种方术让给诸子；将荒唐悠谬的神话让给文学；将不合人类良知的学说及半神话半历史的伪史让给百家，(儒家对于上述三者，当然也未能免俗，采取了不少部分。

到了汉代的讖纬之学大盛，外来文化分子，又发生了很大作用，不过那时代中国与外界交通已告断绝，讖纬家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强以己意比附，变成一种固陋可笑的迷信了。)只有那最纯正的，最有价值的，对于人类生活有益的，他们才给自己留下。试问当时传入中土之学说，除了希伯来教和一部分希腊思想，哪个学派能全具这些优点呢？况且三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可说便是希伯来的文化，现在这种文化再度来华，我们虽不知道它们原是一脉相传，但我们对于这种文化，总觉得十分面善，天然会同它针芥相投，水乳交融，所以我们便于不知不觉间，将希伯来的思想大量吸收起来了。

今日儒家奉为宝典的六经，除了《诗经》现在还没有露出什么疑点以外，其余诸经，只有一部分是古代传下来的真实文献，大部分则为公元前第三世纪到公元前第二世纪的一百余年中间，儒家补造起来的。这个事实，已为今日一般学术界所公认，而笔者研究古史的结果，主张尤为热烈。

儒家所吸收希伯来的思想，本来很多，现在只能简单地举出几条，做个例子来看看。实际上这几条也是儒家学说的骨子，原很重要。

(一) 贵人主义 旧经创世纪，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以后，最后始造人，系照他自己形象造的。造就以后将其安置于伊甸乐园，使为万物的主宰，地球的主人公。《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天主祝福挪亚和他的儿子，向他们说：‘你们要繁殖增多，充满大地。地上所有的走兽，空中所有的飞鸟，地上一切爬行昆虫和水中所有的鱼族，都要对你们表示惊恐畏惧，这一切都交于你们手中。凡活动有生命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如同菜蔬一样，我都已赐予你们。’”《周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圣治》篇：“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祭义》：“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惟人为大。”古人又说人配天地而为三才。《中庸》亦言所谓圣人者以其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俗语也有“人命关天”之说。中国人把人看得太重了，遂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的说法，虽然不见得真正有人做到，但比起近代几个国家把人当做工具，为完成某项政治目标，不惜消灭几百万几千万条人命，究竟强得多了。

(二) 重民主义 五四运动后，儒家声望一落千丈，盖现代为民主时代，而儒家则拥护统治阶级，讲究君权主义，当然不合时代潮流。但儒家真正的精髓实则极其民主。他们把人民看得非常重要。这或者一方面是由贵人主义发展而来；一方面也由人民乃上帝所生育保养，上帝视万民为其子女，不容君主虐待摧残之故。

纪元前五世纪左右，希腊有个哲学家Xenophontes曾说过两句话道：“凡老百姓之所要的，乃是天帝宙士之所要的。”三世纪时希伯来有一句名言云：“人民的意志，即是上主的意志。”(Vox Populi Vox Dei)《周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上“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与希腊及希伯来那两句话，竟俨然如出一口。《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万民，立个领袖，指导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崇拜上帝，所以古代民众领袖乃是先知，也即是司祭。自梅瑟到厄书亚，撒慕尔，皆然。《德训篇》第十章第五节：“民众的福利在上主的手中，他将自己的尊荣赐给经师。”经师即研究《圣经》者，在古代有治理人民之权。《泰誓》上亦云：“天佑上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泰誓》中：“惟

天惠民，惟辟奉天。”

君主肩负治理万民之责，故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德训篇》第十章第一节：“智慧的长官，善于治理自己的百姓，贤明的政治，必然稳固。”第三节：“不明智的君主。使自己的人民丧亡；因首领的明智，城市的居民，必然增多。”中国所求于君主的，也是圣明。故君主为“圣主”、为“明王。”《仲虺之诰》：“惟天生聪明时又……天乃锡王勇智”；《说命》上：“知之曰明哲，哲明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泰誓》“瘳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民主”、“共和”原是中国古书里的话，古时称君王为“民主”。《周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咸有一德》：“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伊撒尔民族在未成立王朝之前（即公元一千年以前），可以说是一种民主政体，由上主派一位或人民所选举的一位贤明人来治理民众，所以称为“民长”，国家民族有什么大事发生，多是召集民众大会来决定。梅瑟便是上主所派的“民长”（按思高旧约史书有“民长纪”，“民长”二字原文为 *Judges* 有裁判者之意，故福音教，即基督教，译为“士师记”。但当时为民众领袖者所负之责不止裁判，故现在天主教译为“民长”）。

君主原是人民公意所推戴，所以他必须诚心诚意替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的愿望，实现人民的意志。故《智慧书》吩咐为君主者道：“因为你们的威权，是由上主赐予的，高位是来自至上者，他要寻问你们的工作，查究你们的心志。因为你们是他国中的公仆。”《盘庚》中君主也以极谦逊的口吻说道：“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这不是仆人的身份是什么呢？

若君主不肯尽保护民众的神圣职责，则上主便要降罚他。《智慧书》又云：“你们若不以公义审判，不守正义的法律，不按上主的意旨行事，他必严厉地和迅速地临到你们面前，因为对身居高位者，将有至严的审判。”又《列王记》所载此类语亦不少。《大禹谟》：“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万民既为上主儿女，故人民疾苦最为上天之所关怀。《周书·召诰》：“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大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天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旧经里上主怜念民众疾苦的话，不可胜数。《厄则基书》里更有借先知口所说一大段话，真说得慷慨悱恻，热情之至，读之而不感动者，其人必无灵性。上主先责备那些负牧民之责的君王道：“牧人应当牧养羊群，你们却只知牧养自己。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丧失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厉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食物。我的羊在山间，在各高冈荒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我必亲自去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它们来——也必在伊撒尔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它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它们——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它们得以躺卧。丧失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三十四章，一节至十六节）。

讲君权主义者，说人民为君主而生，民权主义者则相反。《左传·哀公十四年》传：“天生民而立之君”；《文公十三年》传：“天生民而树之君。”至战国的孟子竟打出旗帜鲜明的民权主义。他议论最激烈者，乃“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几句话引起后代真正民贼明太祖的反感，孟子曾被赶出孔庙，撤除“亚圣”的封号。假如他的骸骨尚存，说不定还要获得个开棺戮尸的处分呢。

所以现代知识分子痛骂儒家学说是封建，是统治者的护身符，真是黑天冤枉。古代学派像儒家这样讲民权主义的，恐没有第二个。他们在六经里除“天”以外，“民”喊得最多，最亲热，很叫人感出他们诚意可爱。不过中国古代实系封建社会，阶级森严，《左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国君死社稷，不死人民；子产作丘赋，人民负担不起而怨谤。人家劝他缓和点，他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人民的愿望，管它做甚？可证。儒家重民思想实受希伯来影响，像孟子的“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和“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便窃自犹太学者墨子之说，更是铁般证据。

（三）孝道 希伯来民族乃族长制，中国则为宗法社会，讲究孝道乃事实的要求。梅瑟在西乃山接受天主十诫，第四诫便是叫人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必以赐一生亨通，且享大年于世。”《礼记·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欤？……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按孔子（？）在这几章发挥他对孝道的见解，第一章以舜为例，第二章文王，第三章武王和周公，所以这个“大德”实承大孝而言。我们知道为孝子者，不一定能享福，更不一定能长寿，然则《中庸》何以竟有这样的说法呢？这话之受第四诫影响的痕迹不是十分明显吗？更令人纳罕的是第四诫虽皆见于《出谷纪》和《申命纪》，但前者仅有“赐以大年”，后者乃兼有“赐以一生亨通”之语，《中庸》舜大孝章又有几句诗道：“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按《申命纪》犹太经师称之为 *Mishne*，谓为“重申前命”，希腊译为 *Deute Ronomium*，意义相同，盖上主对伊撒尔民众所颁法律，均载《出谷纪》，至此不过将旧法律扼要重提一次而已（见思高圣经学会《梅瑟五书·申命纪》引言）。诗中“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二句将袭出谷、申命两纪的罪案，竟不打自招了，不是很有趣的事吗。

《孝经》十八篇相传乃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而作，实则出自战国儒家之手，或更晚。《孝经》主张孝道与天道相通，故《三才章》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之。”《圣治章》：“子曰：人之行，莫大如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感应篇》：“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按旧经所记，为子孙者绝对服从族长，孝养亦极周到。像《创世纪》所载约瑟对于他父亲雅各伯之孝，还不足使人感动吗？新经则耶稣亦常教人孝敬父母，见《玛窦福音》十五章、《马尔谷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并斥责那些将财物作为献天主之仪而藉口不养父母的法利赛人。耶稣自己对圣母玛利亚也极尽孝道。

宗徒保禄也极力劝人孝敬父母，大有“百行孝为先”之意。《致伊法所人书》第五章：“为子女者其仰体主心，孝顺父母”。《致哥罗森人书》第四章：“为子者应孝顺父母，一切惟命，此事最能获主欢心。”又云：“凡为寡妇之子孙者，在家中尤应践履孝道，用以报亲恩”。保禄时代当西汉末期，我引其言，似犯时代错误之病，然保禄语当亦古来传下者，不然，则是一种传统思想，由他具体化而已。

中国以不孝为大恶，惩罚亦极重。《孝经·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属

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旧经天主和伊撒尔人订定法律，亦有欧打父母，咒骂父母者死之条（《出谷纪》二十二章，十五、十七两节）。又言“辱骂父母者处以死刑，盖犯此大恶，咎有应得也”（《肋未纪》二十章九节）。（四）其他思想 希伯来上帝同情卑微者，哀怜受损害者，憎恶强暴者，狡诈及为富不仁者。《约伯传》第五章九至十五节：“他所行的事，伟大叵测，奇妙不可胜数。举扬谦卑者，提拔忧郁的人，使他们得到救援。打消狡猾人的思念，使他们手中的事业不得成功。他用智慧人的计谋捉拿他们，使邪妄人的计谋颠倒。他们白天碰到黑暗，正午摸索，如在深夜。天主搭救沮丧的人，脱离他们口中的锋刃，拯救贫苦的人，脱离蛮横者手。”又屡次申明要打击饱足的人。耶稣山中圣训谓哀悼痛哭、温恭克己为真福，富盈、饱饫者为有祸。

《易·谦》卦：“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汤诰》：“天道福善祸盈。”恶人作恶多端，终于掘阱自陷者，谓之“天夺其魄”或“天祸之。”

《易·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希伯来人有谚云：“父亲吃酸葡萄，则儿子的牙齿也为之酸倒。”言父作恶，则子承受其殃也。虽上主又在《厄则基书》中，谓父子应各负其善恶之责，不至彼此牵累，但亚当犯上主命，其子孙世代代染有原罪，则子孙也承祖父之过，因亚当乃人类代表之故。又上主在《出谷纪》中不是也说：“恼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从父亲直到他三四代子孙。爱慕我的，遵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施以慈爱，直到千代”（二十章六节，卅四章七节）。

上主降灾于人，诚然无法抵当，无法逃避，“但天主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只须人类悔罪，归向天主，他便回心转意，抑住他的义怒，将已伸出的行罚的手缩回了”（《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但人若甘心犯罪，故意冒犯天主，则天主因公义故，不能不惩罚他。《商书·太甲》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也是同样的意思。

天主教最重忏悔，故悔罪列于七圣事之一。悔罪便是教人涤去旧污，做一个新人。故天主常嘱咐人说：“你们要把一切罪过，尽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新灵”（《厄则基书》十八章）。又说：“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同书卅三章廿六节）。《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始终惟一，时乃日新”。《礼记·大学》劈头便说：“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亲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义人若犯罪，则必失去上主的圣宠，恶人若回头，仍可蒙上主收纳。上主常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作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而行，他岂能存活么？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厄则基书》十八章）。中国也讲究德必有恒，《易·恒》卦说：“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孟子亦言：“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第三证以子书：

战国的百家思想大都来自西亚、印度及希腊，其中以墨子宗教色彩为最浓。廿年前有人主张墨子乃印度人，大遭学术界的诟病，笔者虽不信墨子

为印度人，但坚信他决非中国人，在拙著《天问里的创世纪》，曾假设墨子或是犹太教——即天主古教——的大师，现在我的意见竟是更趋坚定了。《汉书·艺文志》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清庙二字始见于《周颂》，诗序谓祀文王，诗一章凡八句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诗中“对越在天”云云，明明说是祭祀上帝之庙，我们哪能因其中有“秉文之德”一语，便神经过敏地说是祀文王吗？前人也知道这话有些说不过去，故郑玄云：“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谓也。”《左传》贾逵注：“肃然清静，谓之清庙。”按希伯来与中国上帝庙中不设偶像，最为清静，所以贾逵的话是对的。汉志说墨子出于清庙之守，便说明他是奉祀上帝的祭司。班固时代距战国较我们为近，这话一定根据可靠的史料，而后才这样说。

墨子学说的中心思想，乃是“尊天”、“明鬼”、“兼爱”，他有《天志》上中下三篇，我们立身行事皆须依照上主的意志，故曰天志。大概说天之明无所不烛，人若得罪于天，无处可以逃避，颇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之意。这类话《圣经》里面多得不可胜计，不必多所引证。

世上万民皆属上天儿女，当然都有权祭天，以申孝敬。但中国则不知始于何时，祭天之权被君主垄断。《礼记》：“天子无介，祭天牺牲。”《曲礼》下：“天子祭天地……诸侯方祀”；《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明堂位》：“祭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郊特牲》于天子祭天之仪，更有详细的描写。你看连诸侯都没有祭天之分，更何况庶民？所以后代庶民祭天，为干犯大罪，有杀头的危险，但墨子则主张任何人都可以祭天，他说国君受人民供养故爱人民，天受天下人之祭祀，故天爱天下之人。《天志》下：“……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何以知兼爱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无有远灵（孙诒让谓灵为虚之误，虚同墟）。

孤夷之国，不皆刍豢其牛羊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之，必兼而爱之……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天要吃人贡献的东西，希伯来及中国古代都有这项观念，但因这个缘故天才爱人，则未必然，墨子也不过以天主比为国君，就中国人了解的程度而以说教罢了。天主教司铎祭天，教友均可与祭。墨子祭天观念与中国传统抵触，与天主教则相合，谁还能他说所宣传者不是天主古教？

天爱人非常之厚，创造万物以供人类需要，如父母之爱子女，子女对于慈爱他们的父母不知报恩是为不仁不祥，人人不知报答于天，也为不仁不祥。“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为四时春夏秋冬夏，以纪纲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长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利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赋金木鸟兽，从事乎五谷麻丝，以为民衣食之财，自古及今，未尝不有此也，今有人于此，\*%若爱其子，汤力单（殫）务以利之，其子长，而无报乎父，故天下之君子与（举）谓之不仁不祥。今乎天，兼天下而爱之，檄遂万物以利之，若毫之末，非天之所为，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然独无报夫天，而不知其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故而不明大也”（《天志》中）。《圣经》与这段话可以互相发挥之处太多了，抄不胜抄，只有从略。《圣经》说天主为智慧之源，《德训篇》第一章：“一切智慧，皆来自天主，

并且永远就和他同在。”“智慧受造于万物之前，明达的智慧永远就有。”《列王纪》上三章九至十一节亦有提及上主乃智慧之源的话。上主又是圣善之源，正义之源，亦散见于《圣经》。墨子贵义，因为义从天出。“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智者出，孰为贵，孰为智？曰：天为贵，天为智”（《天志》中、《天志》下）。

天既为正义之源，我们为义，天必赏我们，我们为恶，天必罚我们。“天欲义而恶不义，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所欲，天亦为我所欲。我欲福祿而恶祸崇。若我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然则我率天之百姓以从事于祸崇者也”（《天志》中）。墨子所以为宗教家，因为他欢喜讲天的赏罚：“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有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亦有矣。”前者如尧、舜、禹、汤、文、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后者如桀、纣、幽、厉，天弃不保，身为大戮。

所以墨子自言他之有天志，譬如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上以度天下王公之政刑，下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顺天意者善，不顺天意者恶。

或谓天主教不谈鬼，墨子好言鬼，似乎涉于异端。但《墨子·明鬼》篇言鬼有三类：一为天鬼；二为山川鬼神；三为人死而为鬼者。鬼字据《说文》的解释：“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本来不是好东西，但战国时代伪造的经书，对鬼则极推崇，凡鬼神二字联用时，鬼之地位权能和神仲伯，故此知道墨子的天鬼，即等于基督教之天神。

墨子所言神每人面鸟身，此虽古代及小亚细亚及世界各处对神的观念，但在墨子书里则大有无神不鸟之概，这与基督教的天使有翼，岂不逼似？

天主教的天神分为九品，其数目之多，逾于天上星辰，其奇妙大能亦可喜可愕，《墨子·明鬼》本有上中下三篇，现只剩下篇。照下篇专谈人鬼来推测，则上篇专谈天鬼，中篇专谈山川鬼神。惜上中两篇已不可见，不然，若望《启示录》所描写天神的情况，圣多玛斯（Saint Thomas d' Aquin）超性学要论天神的性能，我们在战国时，便可以知其大概了。《墨子·明鬼》第二篇似专论山川诸神。此则多神教民族都有此项观念。希腊山林水泽，甚至一花一木之微，都有精灵的存在。中国周礼祭典之繁，亦与希腊相类。墨子或为习染所移，或因欲投合中国人心理而为此说。其文久佚，今已无法断定。再者天主教每人有一护守天神，一城一国亦有天神掌管，则墨子之说也还是很正当。

论人鬼一篇，墨子发表其灵魂不灭之主张，词极雄辩。盖中国人自来为最现实的民族，身后问题，素不注意，孔子大哲，尚言“未知生，焉知死？”墨子时代，无鬼论尤盛行，墨子之宗教，正为主张灵魂不灭者，对此安能缄默（梁任公先生谓墨子不谈灵魂，大约他没有读《明鬼》篇）？至所引杜伯，庄子仪厉鬼报仇诸例，虽为基督教之所不道，但《撒慕尔纪》犹太国王撒乌耳，令招魂的女巫，招先知撒慕尔之鬼，先知果从地底出现，可见基督教亦未始不言鬼，于古代之墨子又何尤焉？

至于“兼爱”，则基督教乃世界宗教中唯一爱的宗教，新旧两经所发挥者，无非是这一端天经地义的大道理。关于这一端道理，要想引证，墨子的议论固不胜其抄，《圣经》也要抄录一半才可以，这也是做不到，而且不必要的事，所以我希望读者诸公，还是直接去翻《圣经》和《墨子》好了。

墨子是宗教家，于其努力宣传一事见之：他曾使其门人耕柱子于楚，游高石子于卫，游公孙尚过于越，出曹公子于宋，使胜绰事项子牛。门人每挟墨子著作同去，每使时君读之大悦。墨子自己也终身游行，不遑宁处，故有“不暖席，不突黔”的美谈。墨子之苦行精神万可钦佩，他传教时栉甚风，沐甚雨，胼无跋，胫无毛，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俨然是天主教传教士的精神！

墨子也是一位大学者，游行各国时，必装载许多书跟在背后，又自言“曾见百国春秋”，这个“百国春秋”恐连他来华前所见各国史记在内吧？战国时代，七雄兼并，小国存在已寥寥可数，有史记者更不多了。

墨子之为外国学者，更有许多坚强的证据，墨经八篇，向来无人能读，现在始知其中有几何、算术、光学、重学、各种原理。又有名学，印度称为因明学，皆源于希腊之 *Logike*。又施惠、公孙龙坚白同异之辩，实即希腊诡辩家 (*sophist*) 之说。墨门苦获、己齿、邓陵子亦好为此类辩论。墨子虽反战非攻，而善为守御。其守城器械，机巧百出，非有高度科学之基础不能为此。当时科学最发达者，首推希腊，故墨子实为感受希腊文化最深之犹太教大师。

墨子之技巧对手为公输般，他曾为云梯，而墨子能御之。墨子自己造木鸢，飞三日不下。屡见子书（一说是公输般）。明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言：“古代意大利亚国，西齐里亚有巧工德大禄者，造百鸟，能自飞，即微如蝇虫，亦能飞。”按希腊神话有 *Daedalus* 与其子 *Icarus* 造人工翅膀飞出克里底某岛，民间盛传，艾氏所指即此。德大禄是著名巧妙建筑师，传到中国为墨子或公输般。这又是墨子与希腊文化关系密切之铁证。

墨子国籍不明，或言其为宋人，或言其为楚人，鲁人。他屡称鲁阳。或即云《国语》之鲁阳文子，楚平王之孙。墨子称鲁君为“主君”，遂有谓墨子乃文子家臣者，其实伊撒尔人称君皆曰“我主我君” (*My lord the King*)，墨子来华后虽努力华化，有时亦于无心间露出本色，这也是墨子是犹太人一个小小的例子。

以上各证，证明墨子乃犹太教大师，其学说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极大。孟子反对他最烈，孟子受他影响也最深。儒家孔子好言仁，孟子好言义，不知实剽窃墨子学说。墨子书中触处都是义字，“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尚贤》上）又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天欲义而恶不义”（《天志》上）。儒称“仁政”，墨则称“义政”，我们读旧新两经，不是也是到处碰见“义”字吗？“天国是为义人预备的”，“义人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的果子”，“天主审判义人与恶人”，“虽是义人，一天也要跌倒七次。”

孟子最激烈的民权主义，即“诛独夫纣”，此语完全袭自墨子。《墨子·非攻》下云：“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何故也？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以后有一段议论说明诛的意义。墨子称纣为“狂夫”，孟子改为“一夫”；《天志》

上言，“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天必罚之”；孟子改为“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

旧经上主垂念百姓，无微不至，对于寡妇孤儿及一切无依无靠之人，更是再三关切。

《墨子·兼爱》下，“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孟子：“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礼记·王制》也照样抄了一段，谓真正王者之制，对此四穷民，必有常饩。孟子痛骂“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者谓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又说：“善战者服上刑”，明目张胆，偷窃墨子的非攻余论，不知古人为什么竟不肯说破？太儒儒相护了吧！

孟子剽墨太多，连寻常说话有时都不知不觉模仿墨子口气。像“转死沟壑”，“绝长补短”，“挟泰山超北海”均是。最后一语见《墨子·兼爱》中：“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爱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至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想起《申命记》梅瑟对伊撒尔民众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为你并不是难于实行的，或是相差太远，不是在天上，致使你说：谁为我们升天取下来……也不是在海外，致使你说：谁为我们过海去取来……这话却离你很近，就在你嘴里，就在你心中，使你好能遵行”（三十章十一至十四节）。与墨子之语何语气相类之甚也耶？

孟子这样在墨子书中大肆剽窃，还能厚着脸皮骂墨子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是执一的贼道者；是同禽兽一样的东西，太叫人不平了！

老子是自然主义者，但其书有数处似言天主圣王的奥迹：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十六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忽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老子谓道更在造物主之先，故云“道主一”，又云“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这就是自然主义与宗教的不同处，而圣王奥迹自古即有人知，亦由此可以证明。

老子教人谦冲，自下，寡欲，不争，于天道恶盈，强梁者不得其死，不惮再三阐述。又教人自处如婴儿，“能如婴儿乎？”“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与天主教教义都颇相近。老子尚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二语，“天网”二字甚奇，《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厄则基书》十七章二十节，上主常说“我撒出我的网子”，老子语或由此。不过西亚诸神常携网，未可一概论。

荀子学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极为明显，他的贵人主义曾说出一番道理：“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篇第九）。这话是希腊大哲亚里斯多德说的。圣多玛斯发挥亚氏哲学，所以亚氏成为天主教哲学之主流，称为“经院学派”（Scholastics）所谓草木生魂，鸟兽觉魂，人类灵魂这几句话，略研究天主教哲学，都耳熟能详，我不必多说了。

荀子的乐论也是出于亚氏著作，有人曾加讨论，现不引。

随巢子出于墨子之门，其书已佚，后人于古书中辑得数条，《太平御览》有其四语：“夷羊在牧，飞拾满野，天鬼不顾，亦不宾灭”。前人谓其来自伪《周书》：“麋鹿在牧，蜚鸿满野”，我以为非是，当是《出谷纪》中语。梅瑟领伊撒尔民众脱离埃及，逾红海至欣旷野，百姓以缺少饮食，埋怨梅瑟，天降玛纳，又使鹌鹑成群飞来，集于营前，百姓得以捕食（《出谷纪》十六章十三节）。又说“那时上主命风由海外吹来，把鹌鹑吹到营幕上，周围营幕两边都有一日之路长，离地面只有二肘高，民众那一整日，整夜，并第二天起来捕捉鹌鹑，最少也捕了十堆，都摆在营幕四周。肉还在牙齿中，尚未咽下，上主就对民众发了忿怒，用严灾打击了民众。”盖鹌鹑产于非州中部与厄拉特海湾一带，春季随风飞至西乃半岛巴肋斯坦、叙利亚等地，飞甚低，易为人逮捕（思高学会《梅瑟五书》六 九页）。随巢子“飞拾满野”，言鹌鹑飞来甚多，俯拾即是。“夷羊在牧”指伊撒尔民众乃上主之羊，“夷”字与老子的“视而不见曰夷”不知是否有关？若有关，则或是“雅和华”的异译。

“天鬼不顾”，言上主恶伊民之贪饕降瘟疫而打击之。鬼在战国时地位提高与神并列，墨子有《天鬼》篇，鬼字无非指精灵体，已见前文。“亦不宾灭”则似言上主虽屡次向伊民发怒，施行惩罚。究竟随即宽赦，未将他们消灭。

#### 第四证之史传：

《汉书》言文帝试验方士新垣平的法术，他能使已落下去的太阳，再升到天中。应劭《风俗通》，成帝曾以文帝时“日再中”之说问刘向云云。汉纬书《易辨终备》云：“日再中，乌连嬉。”按《淮南》载鲁阳公与韩战，日将暮，挥戈，日返三舍。又言虞公与夏战，公以剑指日，日退不落，此事实出旧经《若苏厄书》。若苏厄代先知梅瑟为伊撒尔民众的领袖，与阿摩黎五王作战，曾祈祷上主说：“太阳呵！你要停在基贝红，月亮呵！你要停在阿雅隆谷”；“太阳果然停了，月亮也停止了，直到百姓向敌人报复了自己的仇恨。”又《列王纪下》八章九节，又《赛亚书》三十八章，均有“日退十度”之说。鲁阳戈明明出自《若苏厄书》，不可否认。墨子屡与鲁阳文君谈话，称文君为“主君”，然则鲁阳文君便是若苏厄吗？不然，若苏厄率希伯来人入迦南建犹太国事在纪元前十二世纪顷，墨子则纪元前三世纪时人，时代相去悬绝，他们安得而为君臣？或者墨子在其本国时，属于若苏厄支派（按若苏厄属于厄弗辣因支派，见《户籍纪》），故在书中假设其人尚在，与之问答。《淮南》又将挥戈事牵入自己书中，无心间，使墨子之为犹太人，得到一个最有力量之证据。旧经屡有战长人的故事。撒乌耳王与培肋协特人交战，培方出一长人，身高六肘又一指距。所持铜矛粗如织机之梁，重六百协刻耳，无人敢于迎敌。达味竟掷石杀之（《撒慕耳纪》上十七章）达味又曾与辣法长人后裔四人战，达味与其侄约纳堂将他们一一杀死（《撒慕尔纪》下廿一章）。旧经尚有数处关于长人的记载。这类战长人的故事，叙述得太热闹了，中国人听得心痒，也要来模仿一下才觉痛快。所以《左传》、《瘤梁》都有战长狄的节目。《左传·文公十一年》传，鲁人与长狄战，败于咸，获长狄侨如，富文终甥，桩其喉，以戈杀之。晋之灭佚，获侨如之弟焚如，齐人获其弟荣如，卫人获其季弟简如。又言宋人曾与长狄战，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杜预注：缘斯乃侨如等之先。这侨如弟兄四个与旧经所载辣法后裔四人能说是偶合吗？《瘤梁传·文公十一年》传云：“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传曰：长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

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旧经达味第一次打倒的长人高六肘有零，一肘合英尺十八时，则其长仅及丈余。这类长人今日仍常见。至《瘤梁》所记那类巨人，事实上决不会有，仅能见之于神话。希腊神话恰巧有一个巨人名 Tityus，因获罪天帝，被缚于地狱，每日有巨鹫啄食其肝，食已还生，受苦无尽。此巨人身体之长，可横九亩。(Nine Acres)司马法六尺为步，百步为亩。一亩六百尺，九亩五千四百尺，合五百余丈。古亩或比今亩小，也不能小到哪里去，那么这个长狄不太长大吗？《瘤梁》想把长狄的故事，缘饰得好听一点，搀入了一段战国流行的希腊神话，谁知竟因此露出抄袭外来传说的马脚，真所谓弄巧反拙，令人失笑！

希伯来民族“逃城”之制，梅瑟率领民众到迦南地建筑城堡，上主令其另筑六城，称为避难城，凡误杀人者皆可逃避其中。见《户籍纪》三十五章，《申命纪》十九章，《若苏厄书》二十章。《史记·孟尝君传》传后论云：“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按古称“万户侯”最大封邑不过万户，实际上恐怕还不见得有这么多的户口，盖当时齐国最为富庶，其首都临淄不过七万户，每户平均有三男丁，男丁为二十一万，合女口大约有四五十万，现在托庇于孟尝君的奸人，竟有六万家，每家平均男女各三，便有卅六万人，每家平均四口，也有二十四万，连薛中原有住户，试问该有多少人口？区区一邑，如何养得起这么多的人民？所以这“奸人六万家”定然是受了旧经“六座逃城”的影响，胡乱传说的。司马迁头脑素来明晰，不易受欺，这回也上了战国流传下来说谎风气的大当了。

晋文公重耳未得国时，流亡在外十九年。所适各国，有的厚待，有的加以白眼，他到曹国，曹共公闻其骈肩，趁他在洗澡的当儿，薄而观之。这举动未免太无礼，将来重耳得志，是一定要报复的。曹国一个大夫僖负羁有妻极贤慧，对丈夫说道：“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公子必返其国，返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贰焉。”乃馈盘餐瘳璧其中。公子受餐反璧。这段记载和《撒慕尔纪》上达味事很相象。达味避撒乌耳的迫害，逃到玛红旷野。其地有富人纳巴耳，性情暴戾，达味为他保护羊群，向他求点食物，他却拿粗暴的话来拒绝。其妻阿彼戛依耳，聪明美丽，私为斡旋，私下取二百块面包，两皮囊酒，五只宰好的羊，五色阿炒过的麦子，一百嘟噜干葡萄，二百无花果糕饼，放在几匹驴上，献给达味。更向达味委婉说了一番言语，替她丈夫赔礼。达味本立誓要杀其夫一家，见这女人能识大体，说话动听，化怒为喜。后其夫死，竟娶以为妻（第二十五章）。

重耳出亡时，晋惠公使寺人披刺之，斩其衣袂，重耳做了晋君，寺人披求见，公叫人责备他，叫他走。说道：“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袂犹在，女其行乎！”这未免令人听想起达味故事了。接达味藏身野山羊岩石洞中，撒乌耳也进了那洞。达味暗暗起身，割了他外擎上的衣边，跟他出洞，扬声喊他，说在洞中本可杀你，但我仅割你外擎的衣边，可证我不愿杀你，你何以苦苦不肯放过我云云（第二十四章）。本来曹大夫夫妻巨眼识英雄，预烧冷灶；寺人披行刺斩袂，皆不能保其必无，但两件

事连在一起，与达味故事太逼近，我们有理由猜想它是由《撒慕尔纪》偷了点材料润色而成的。

《民长纪》第二章伊撒尔人民受摩阿布王赫革隆征服凡十八年。伊民呼吁上主，上主给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就是彼讷雅明人革辣的儿子厄胡得。此人乃系用左手的人，预备一只利刃，长一肘，插于右腿衣服底下，假送礼为名，至王前抽刀刺入他的肚里，连刀柄也插进去了，直透后背。中国春秋时，有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事。前者屡见《史记》，是真的史实，但《史记·吴太伯世家》、《刺客列传·专诸传》，仅言专诸置匕首鱼炙中，献鱼时，引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而已，到了后汉时赵煜所撰的《吴越春秋》，则有很精细的描写，言王僚赴公子光之宴，防有不测，“被棠铁之甲三重……侍皆操戟交轂……专诸置鱼肠剑炙鱼中进之，既至王僚前，专诸擘炙鱼，困推匕首，立戟交轂，倚专诸胸，胸断臆天，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贯甲达背。”这“贯甲达背”四字，与厄胡得刺赫革隆王故事，不能说没有关系。不止此也，《吴越春秋》又有要离刺王僚儿子庆忌事，更写得如小说，如戏剧，极如火如荼之观。要离想刺庆忌，恐其不信，难得近身，乃诈为负罪，请吴王断其右手，他后刺庆忌，用的便是左手。《吴越春秋》将旧经厄胡得的故事衍而为二，彰彰明甚。

此外则宋王登台窥见韩凭妻美而强取之，与《撒慕尔纪》第十章达味在其宫殿平台上，窥见乌黎雅妻巴特协巴黑，召而幸之相似。天皇兄弟十二人，或谓即指伊撒尔十二支派，照我看中国天、地、人三皇，起甚晚，当在秦汉之际。三皇均神话中人，天皇当与希腊天帝宙士有点关系，因为奥林匹斯大神共十有二位，秦始皇所铸金狄十二，非来自希腊神话，则来自印度（因印度受希腊影响，婆罗门教有一个时期她的大神也有十二位）。但希腊十二大神虽有几个是宙士弟兄，有几个则系宙士子女，中国伪史谓天皇十二人，皆为弟兄，当是一半受希腊神话影响，一半受天主古教《圣经》的影响。此外还有几端小事。孟子：“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然，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耶稣亦云：“目为身之灯，目正则清明在躬，目不正，则身陷晦冥，是故心光者晦，则晦之为晦，又将如何”汉武帝时，董宣为洛阳令，杀湖阳公主苍头，帝使小黄门挟持宣，令拜谢公主，宣两手据地，不肯俯。帝敕曰：“强项令出！”杨奇立朝刚直，灵帝曰：“卿强项，真杨震之子也。”并见《后汉书》。《出谷纪》三十二章九节、三十三章五节、三十四章八节，梅瑟因伊撒尔民众不听上主教训，屡称他们为“硬着头项的百姓。”汉时“强项”之语，不知系来自旧经否？至耶稣降生汉平帝元始元年，时代原在孟子后，但耶稣的话，安知非根据古代希伯来习惯的说法而说的呢？若是，则与孟子的话相同，不足为异了。

中国尚有许多风俗习惯与古希伯来民族相类，现在且引几条看看：

耶稣钉死十字架，代万民赎罪，故赎罪之说实为基督教中心思想。不过赎罪的观念，实亦承之古代。天主嘱咐梅瑟以牛、羊、斑鸠、雏鸽等为赎罪之祭，《肋未纪》接连几章讲论此事。古代各民族每当天灾流行，常有义人挺身而出，自作牺牲，以求担万民罪恶，平息神灵愤怒，《商书·汤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周书·泰誓》中：“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相传成汤时天下大旱七年，汤斋戒沐浴，剪发断爪，身卧高俎，充作牺牲以祭上帝，天果大雨。此事开始见于《墨子》，其后《吕氏春秋》，《尸子》亦载之。

古人相信生命存于血液之中，故订立和约，双方必以血洒在身上。《出

谷纪》二十四章，梅瑟与民众立约，先献牛犊于上主，作为和平的牺牲，他取一半血，盛在盆中，另以一半洒在祭坛上，随后取过约书来，念给百姓听。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看哪，这是结约的血，是上帝按一切的话，与你们所立的约。”耶稣基督于晚餐中建立圣体的时候，将酒倾在杯里，递给门徒们喝，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也是用这形式。

中国古时订立盟约，则必杀牛取血，各涂口旁，称为“歃血。”

希伯来民族做补赎，表示极大哀痛；亲戚死亡，必撕裂衣服，身披麻布，散灰尘于发中。《尼希米纪》第九章第一节：“这月二十四日，伊撒尔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这是做补赎之例。《以斯德传》第四章，书珊王将把犹太人尽行屠戮，犹太领袖末底改知道消息，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哀痛号哭……犹太人民亦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号，穿麻衣躺在灰中者甚多，为表示大哀痛之例。

《创世纪》卅七章卅三节，雅各伯闻其子约瑟被野兽吃掉，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多日，这是纪念死亡之例。中国古人死了父母及至亲，也服麻布之衣，有种种制度，见《仪礼·丧服》。这风俗至今尚未大改。但中国人仅以麻布为丧服，像犹太人一样表示悲伤，则没有听说过。谁知古书里居然也有一例：《左传·僖公十五年》传，秦穆公与晋战，败晋，俘晋惠公，“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莹、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婢子朝以死；惟君裁之。”按穆姬乃秦穆公夫人，为晋献公女，太子申生之姊，亦即晋惠公之姊，但非同母。她此举当然是为了要袒护母家，并顾全祖国之面子，不过她在这时戴孝，实在可怪，所以古来注家聚讼甚多。但勘之旧约《圣经》，乃知实以志哀痛并屈辱。免服恐即是“撕裂衣服”之谓。

中国人最讲宗族主义，不惟生时不肯轻易离开乡井，死了以后，无论道路怎样远，也必设法将骸骨舁回同祖宗葬在一起，此风亦至今犹然，《礼记·檀弓上》：“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希伯来民族亦有此俗，《创世纪》载雅各伯到埃及，客死其地，临死时，要求其子约瑟立誓，必以遗骸归葬。约瑟临死时，也要求其子辈立誓，以自己遗骸归葬。又旧经记述一个人死亡，便说：“回到他列祖那里去了。”

希伯来民族立嫡以长、十一而税、重日朔、以右为尊、击掌为保（《箴言》十七章十八节，二十二章二十六节，六章一节）、呼天唤地以作证（《申命纪》三十章十九节，卅一章二十八节，卅二章一节），中国也如此。

其他风俗民情相似者尚多，只有将来有机会再行探究。

我知道读者读至此，或者要说，希伯来上帝既于远古时传入中国，战国时代中国儒家又曾大量吸收希伯来的思想，风俗民情又有这么多的相象处，则中国人也许是伊撒尔十二支派之一吧？关于这，我可以回答说：若以人类同出一源而论：原可作此主张，但若从民族学立论，则万万不能这样乱说了。因为人类历史悠长，演变亦极多，各民族都有其自己发展的历史，中国人属于蒙古族（Mongolic），而希伯来人属于闪族（Semitic），有种种不同的特征，若强令中国人认希伯来人为祖，不但中国人不愿，也要教民族学者及历史学家笑倒了。宗教信仰及学术思想可以由甲地传至乙地，甲民族传给乙民族，风俗人情之培成则不是朝夕之功；纵可传来中

国，短时期决不能普遍，更不能生根。上述中国与希伯来风俗人情之相同者，我不主张它是传入的缘故，只相信这些风俗人情渊源于世界人类单文化摇篮的小亚细亚，它们与中国民族同来远东这块大陆，年代悠邈，已不可诘究了。

我质道读者或者又要说道：人类肤色虽有差异，感情思想则无甚悬殊，有了相同的思想感情，则必产生同样的学术文化，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俗亦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与希伯来思想之雷同，安知不是彼此暗合，一定要说传来，抑又何必？这则不知人类思想暗合固有，但仅能偶然符合一二端，像本文所举大小证据如是之繁多，实非说传来不可。况以生物学而论，两地气候土壤即完全相同，草木禽兽的种子，也不能自然发生，非传衍不能有，草木禽兽且然，更何况博大精深如宗教信仰和学术思想者呢？再者，根据本人对屈原作品之研究，战国时代两河流域，希腊、印度，学术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固不止希伯来一地，将来拙著《屈赋新探》若有成功希望，则中国秦以前学术文化史均将改观，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也可以连带解决了。

这篇论文所想证明者：中国各种学派只有儒家与希伯来古教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以前原有儒教之称，与释、道合称三教。近代中国人对宗教(The Religion)的意义比以前明了，见儒教没有崇拜的对象，没有祭司，没有宗教仪式，遂宣告儒家不足称为宗教，仅能称为学派，孔子不过是一位教育家，等于希腊的苏格拉底。汉代讖纬家及清代康有为，硬想将儒家学派宗教化，硬尊孔子为教主，实是一件非常可笑之事，所以他们的企图不能成功。但笔者本人则敢倡言儒教实亦算得宗教，她的神便是商代甲骨文及六经的上帝。孔子虽非教主，也非祭司，但中国原有清庙之守，也有祀天的仪式，即所谓“郊祀”者是。

儒教不但可称为宗教，而且在中国一向居于国教地位，请看历代帝王谁不称为天之子吗？创业垂统，谁不自夸为膺受天之命吗？天坛之尊，不是高于一切神庙吗？天子所斋戒沐浴，恪恭寅畏而祭祀的，不是甲骨文及六经的上帝吗？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儒教——与天主古教关系非常密切，这话不算没有根据之谈吧。

#### 自跋

民国卅八年我自大陆至香港。服务于真理学会，写了这本小册子，原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古教》，今将此文收入论丛，题目改为《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因旧题“中国传统文化”六字殊嫌空洞，“天主古教”四字也欠妥。天主古教始于明代，从前可没有，如何可以滥用。今如以之为子题，免得此文失其来处。全文也稍有增删之处，大体则仍其旧。

原文主张中国古时代的上帝系由希伯来传来，但这个问题，极其重大，正如原书雷永明神父序文中说“必须查考历史，穷究民族学，检讨宗教比较学，语言学等等，然后方可得一完善牢固的结论，迫人中心信服。”我也承认此书写于参考资料缺乏的客中，在我屈赋研究各类论文中，此文最为肤浅、疏略，不过自己此时再读，觉得也有若干可取之处。这有两点，其一，我觉得中国古时的上帝不知所从来，无父母亲属，也无声无臭，无形无像，与希伯来人所崇奉的耶和華确有相似处。中国古人虽也崇祀百神，上帝则至尊无二，说中国人所信仰的原是一神教，似不为过份。其二、谓墨子为犹太教大师——本身不必为犹太人——基督教经典充满“义”字被儒家拾掇了去，从此仁义并举，乃系事实。墨家主要学说是“天志”、“兼爱”、“非攻”、“明鬼”，

尊天于万有之上，天是爱人的，是以要兼爱，兼爱就要弭兵非战。“明鬼”是证明灵魂不灭，这是大节目无不与希伯来教义相合。至于“主君”之称呼，日再中，战长狄，薛下奸人六万家等等那都是小小者耳。战国时代域外文化既大量涌进中国，希伯来文化也一并进来。不足为异。代表西亚、希腊、印度学说的学者莅临远东这片乐土，授徒讲学，犹太教大师如墨子等东来传教，也是不足为异的。

在我《屈赋新探》里，每谈域外文化必是西亚；希腊、印度，也提多次，却无专文介绍，只有希伯来文化我撰了一个专篇，为了这个文化确有其特异处。

此文对希伯来的人名、地名、书名，及其名称说法，均依据天主教翻译习惯，如“大卫”之为“达味”，“摩西”之为“梅瑟”，“以色列”之为“伊撒尔”皆是。因民国卅八年我在香港天主教真理学会工作，所读书皆为天主教所译之故。太不普通，今亦懒于更改，请读者原谅。

六五年八月跋于古都春晖山馆选自 《屈赋论丛》

## 七 我国古代移民通商沟通文化之伟绩

一般人批评我们中华民族时，总爱说我们的文化是农业文化。农民和土地天然有拆不开的关系，所以我们民族欢喜株守故土，缺乏进取的精神和冒险的勇气，所谓“安土重迁”竟成了我们民族性的铁板注脚。因此，我们民族性也天然爱保守，喜因袭，陷在“传统”的窠臼里，不以摆脱；永远落在时代潮流的背后，不能适应环境，以求生存。

不过，我们中华文化诚然是农业的，我们的民族性却未必完全是农业的。据我个人的观察，我们民族其实是极喜向外开拓，关于移殖，善于适应新的环境，尤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加以消化熔铸，造成自己的文化体系。我们其实是一种最富于进取精神和冒险勇气的人种之一，而且也是聪明睿智的人种之一。远在洪荒时代，亚洲的黄种人便曾举行大规模的移民，向蛮荒僻远之地，寻求新世界，建设他们的新家园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曾发现我国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陶器的形式花纹，与意大利西西岛及希腊北部启罗尼亚，波兰的格雷西亚，俄国西南几富城附近脱里波留，俄属土耳其斯坦等地所发现极为类似，断定同出一源。又我国河北北边石像与里海西岸旱地所掘出者亦同一作风，这均在新石器末期。可见极早的时代，我国与欧洲西亚均有交通。立国西域的大夏，据已故历史家吴其昌氏考证说便是我国历史上的夏朝，商民族崛起，夏战败，只有率族西迁，另建王国。盖《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均言“天子闻大夏、大宛、安息之属，土著颇与中国同俗。”所谓“土著”，便是他们建立城郭。不像匈奴民族逐水草而迁徙。“颇与中国同俗”，是说他们的风俗民情大概有一点像中国。故吴先生谓大夏之先当是中国人。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自称“殷人”。今日人种学者谓其人面貌与中国酷肖，有许多言语与中国同源，疑是一部分殷商民族于白令海峡尚未断时迁徙而往的。不过这一部分商民族或系文化本低的边疆人，到了美洲

极北又因天候过于酷烈，原来带去的那点文化，亦渐灭无余，变成完全的野蛮人了。一般人均认哥伦布为发现美洲第一人。但今日竟发现哥氏之前中国人到达美洲的痕迹。近亦有人在美洲掘出地下木质神像有类我国南极寿星，计其年代实在千数百年前。根据谁最先发现一新土地，则该土地即属此人，则美洲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人的。近代俄人考古发掘古代西提亚国王陵墓，见其陵墓外观，广阔高峻，极像中国帝王之陵；内部衣服、弓矢、刀剑之形式装饰，多与中国蒙古相仿佛。西提亚古时与我国本有文化上交通，文化彼此沾染，不足为异。而有些史地学者则说，这个黑海边的伟大帝国也许是我们北部中国人移民过去建立的。波斯亦曾渍染中国文化，文物制度、语言、艺术，极富中华色彩，此又众所共知之事。

至于我中华民族以武力征服四夷之事迹，见于正式史书者，如黄帝时代，“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史记·五帝本纪》）。唐尧时代威力东至阳谷，南至南交，西至昧谷，北至幽都，（《尚书·尧典》）。虞舜时万国慕义，重译而来朝贡：“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服”（《大戴礼记·少誉篇》）这些史料当然不能凭信，但秦始皇、汉武帝派遣方士寻觅神山和不死药，规模都很弘大。始皇曾派韩终、侯生、石生、徐市等入海，仅徐市便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各种量精，衣服器用，称是。有人说徐市既徐福，今日本有徐福墓，有人说徐福作了日本第一个天皇，这些话不但日本人不肯承认，我国人亦未必以为然。武帝曾大发楼船，令方士数千人求蓬莱神人。他为通西域，发使抵安息、奄蔡、犁轩、条支、身毒诸国。一年中，使者多则十余，少则五六辈，每个使者手下都带了许多人。这些使者并不见得像秦始皇所遣方士，一去不返，反带回许多域外风光，在沟通中外文化上都尽了很大的气力。一直到三国时代，吴孙权尚曾命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觅所谓稟州、夷州，虽没有什么结果，但史家都说鞍州便是今日的台湾。其后孙权又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通海外诸国，事皆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之求鞍州、夷州，目的在于扩充版图，增益人口；也有点求神山及不死药的副作用存于其间，因为孙权晚年是颇讲究神仙丹药之事的。至于明成祖命郑和七次放洋，直至非洲好望角，中国声威遍于海外。“三保太监下西洋”至今尚艳称于我民众之口。这算秦汉吴孙以来最后一次了。至不藉政府武力为后盾，中国人自己到海外寻觅根据地者如郑昭之称王暹罗，罗芳伯之建国坤甸，张杰诸之开拓鸡笼，都是近代史上脍炙人口的史实。

我国以武力举行移民殖民交通异国之外，还有一种方式，便是通商。这无非出于民间私人的行动，规模既小，经历时间也甚绵长，但以沟通中外文化的效果而论，反比政治力量为巨伟。因为移民仅能将我们文化带往别处，而通商则能将别处的带回本国。我们都知道商人贩贱卖贵，追求赢利，万水千山，无远不届；走私的时候，漏税偷关，又是无孔不钻，他们的足迹决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阻止得住的。他们是货物的贩运者，同时也就成了文化的交互运输者，好像蜜蜂采取花中甜汁作为自己食粮，足上所沾花粉，传播于别的花上，却于无意之间替植物尽了雌雄花蕊交配的义务。古代立国地中海边的腓基尼民族专以航海经商为事，商船往来各国，成为古代民族相互间的介绍人。他自己虽未曾创造何等文化，然能取此族文化传之他族，成为文化的

媒介者，地中海一带国家文明进步，实受腓人之惠；即欧洲古代蛮族之开化，腓人亦与有功。至其采取埃及象形与草书文字创造字母，一变为希腊文，再变为罗马拉丁文，成为今日泰西文字之祖，对文化贡献尤大。我中华民族虽居广衍丰饶的大陆，与腓人立国海边，舍经商无以自存者大异，而在商业上的成就却也不下于他们。《史记·大宛传》及《汉书·张骞传》言骞在大夏见蜀中的邛竹杖及蜀布，问他们怎样得来？他们回答说市自身毒。王恢遣唐蒙为使宣抚南越时，蒙于南越王酒席上发现了蜀郡的枸酱，问起才知道是蜀商由柯江贩到夜郎国，又由夜郎国贩到南粤的番禺的。武帝遂使唐蒙发巴蜀民工数万人凿山修道，以通西南夷，数年而工不成，乃罢。后又遣了许多使臣，从冉、馱、邛、樊与荏道，分向西南，探求身毒。使者们西出一二千里，皆为高山急湍所阻，不能前进。南则经夜郎、靡末、滇国及昆明迤西，困居滇国四年，亦复折返，竟不能达到身毒。身毒便是今日印度，在汉之西南，相去极远，中间又阻隔着许多崇山峻岭，所以使者们走不过去。但政府费了偌大气力所不能通者，商人居然能通之，并且通得神不知，鬼不觉。若不是张骞、唐蒙说破，我国史家还不知道有这件事呢？

但我国商人所造成最大的功绩则为贩运蚕丝。丝为我国特产，极早时代便知育蚕抽丝，作为衣服，并且输出外国，今日欧洲考古学者如斯文赫定、斯坦因、贝尔格曼、科兹洛夫在克里米半岛的古希腊殖民地遗迹中及楼兰、波斯、北蒙古、额济纳河等地均发现丝的残迹，断定公元前五世纪时，中国之缁或已越帕尔米高原而至印度、波斯。及亚历山大大王东征以后，又经叙利亚人手输入欧洲、罗马人秉性浮华，尤爱中国之丝。中国之丝遂亦源源运往，大量倾销，其后竟引起罗马之通货膨胀，酿成大乱。西洋史家谓此赫赫有名一代大帝国之覆亡，由中国丝所引起之经济破产，实为其原因之一（皆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以商业而灭亡西方一大帝国，我国商人所造成的不但是伟绩，而且是奇迹了！

笔者个人颇喜究心于中国文化来源问题，近代有些史家每言中国民族来自葱岭，最近逝世的吴稚晖先生亦曾言西北为文明摇篮，东西祖宗，皆在里海以东，走廊以西，各向东西散布，致有今日东西文明之世界（见最近《畅流》杂志稚老谈西北问题遗札）。在稚老遗札发表以前，法国人拉克伯里于公元一八九四发表《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其说初出，世界靡然景从，我国学术界亦起了甚大波动。蒋观云有《中国人种考》，刘师培有《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有《立国篇》，章太炎有《种姓篇》，丁谦有《中国人种从来考》，皆为拉氏之说张目，而刘师培主之尤力，其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屡言不一，见刘氏遗著。但拉氏之说颇为牵强矫诬，难于成立，所以欧西学者如斯坦因、罗斯、贾儿斯皆著文痛斥，其后为拉氏之说者亦皆卷舌吞声，不敢再有所言。笔者以为中国民族是否来自两河流域，这是人种学、言语学上的各种问题，兹事体大，未便轻率讨论，但中国文化源于两河，或直接间接受其莫大影响，则确甚明显。譬如天文学上的黄道十二宫，日月五星的七政，世界各国皆受之两河；我们在很早的时候也有了一份了。昆仑与四河源于西亚世界大山的神话，传衍欧亚，我国在极早时代即有关于这个神山的传说。又“世界由混沌开辟”、“天地上下皆水”、“地上水与天上银河相通”、“大瀛海环绕大地”、“地分九州”、“大地之中心称为脐”、“国家首都或重要圣地居脐上”、“天地各有九重”、“人死则魂归死神所居之山”、“地府出入口如陷阱”、“神鬼之形皆如鸟类”、“亡魂须享血食”、“阴阳

河”、“死者含钱买渡”、“指河为誓”，凡此种种，不可胜述。更有“洪水故事”、“十日故事”、“神魔大战故事”、“开辟以来分为十纪”之说；及“阴阳”“五行”所推衍出来的高深哲理。希腊印度各文明古国，或接受，或否，或接受以后，将其形式大加改变，难以认出原来面目，而我国则吸收得甚为完全，至今尚可和盘托出与两河流域文化互相印证。两河流域以时代久远，变乱频仍，所有文献尽湮地底，或归于渐灭，仅希腊古籍中保存少许，今日欧美考古家殷勤发掘，所得究竟不多。且以古籍文字每多残缺，意义又复渺茫，难于探索，所以他们对于两河文化的研究，成功实不能谓为彪炳。倘他们知道两河古文化全盘储藏我中华宝库中，将今日所得地下资料更证以我国文献，定有意外惊人收获，而两河古文明的全貌定可早日复现于世间。再者“中国”一词，本源西亚，印度、波斯、天方、希腊，于极盛时也会至夸其国居大地中心，俨有“中国”之义，惜昙花一现，即归寂灭，而我们数千年来对外即用此二字为国号，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更正式定为国名，实为古今万国稀有之例，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无上的光荣。

我国与西亚距离如此辽远，而文化上竟能如此相通。想必都由于移民及商业上往来之力，否则这个哑谜怎样解释呢？

英国诗人吉柏龄作了一首诗，大意说：东方自东方，西方自西方，二者永不见面，以后则将并为一家人云云。吉氏此诗原涵有世界主义，但他认东西文明原来各成系统，却是大错特错，一般浅薄读者则偏偏牢记此诗前三句，对东方文明每生误解，由误解而生轻视，后患遂不胜言。有些学养甚佳的人，虽然钦佩中国文化，认为东方代表。但他们潜意识中总觉得他们文化源于希腊，比较高尚优越，亚洲文化则总不免简陋野蛮，他们中有一学者倡“我人皆希腊人”之说，极以作希腊文化子孙自傲。他们也承认希腊文化曾受两河影响；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中国与两河文化之接触，更比希腊为早。我们同出一个大家庭，而我们中国实为文化的老大哥，希腊只能算小弟弟。我们是长房的子孙，欧美人只能算二房三房的苗裔，他们凭什么敢瞧我们不起？

窃尝谓国际间彼此的歧视，由于血统之异者尚少，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者实多。但若知道世界文化本来同出一源（此处所谓世界暂以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古国如中国、印度、埃及、希腊为限），则世界人种虽有肤色之异，其实都是兄弟手足。以前不知道，是以不免彼此轻视、仇恨、而至于互相斫杀；现在知道了，则应当互相拥抱，喜极而泣。大家真像一家人般，守望相助，有无相通，和和气气过日子，共为增进人类幸福与世界文明之进步而努力。

如此，则笔者“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主张，对于增进各民族相互了解，或者有其涓埃之助吧。

我国文化来源久远，已如本文所述，这些文化分子虽因时过境迁，大部分不适用于今日，但源远流长，为今日世界各国所罕有。仅凭这一点也值得吾人自傲，何况它又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则我们更当加以珍视了。况笔者前文因曾说：中华民族乃是聪明睿智的人种，吸收外来文化以后，每能陶熔之，变化之，造成自己文明体系。自商周以来，我国文物已灿然大备，历代圣贤豪杰，智士哲人，又以其劳力和心血，一点一滴，抟造出一种笃实光辉，庄严伟大的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中华立国的基石，也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所以“抢救中国文化”实为我们当前最迫切的课题。

现代我国侨胞散布地球每一角落，盛况远胜于过去移民经商时代。目前沟通中外文化之责固无待于侨胞，但保护文化的大任，却又落在侨胞肩上。

我们体念先民奋斗之艰难，中华文化创造之不易，必须群策群力，一德一心，使我们宝贵的文化永久延续于世界。当此民国四十三年新年来临，仅揭兹旨，以与台湾八百万军民及海外二千万侨胞共勉。民国四十三年为南洋某报作自跋

此稿系谢幼伟教授主印尼某报笔政时来函索写，嘱对侨胞宣扬祖国文化事多作表彰，以励侨志而收侨心。此文对沟通中外文化事与笔者向来持论稍有不同，然中国移民通商，虽未能沟通文化主流，琐屑之功亦不可没，所谓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也。收之本编，作为我屈赋研究补遗之一章。

民国六十五年于古都

选自《屈赋论丛》

## 八 中外神话互相发明例证数则

笔者研究屈原作品有年，发现屈赋等于一座宝矿，其中蕴藏之丰富，不但可以将我国那些杂碎的、僵化的、无意义的文化分子贯穿起来，使之变成一个秩序整然的有机体，还可以补外国宗教神话及其他文化分子之缺。所以我曾大胆宣言：若能将屈赋这个宝藏发掘出来，不但中国宗教神话应该改写，便是外国的宗教神话也有一部分应该改写。当胡适之先生尚在世时，我曾写信将这话约略告诉他，把老先生吓坏了，怀疑我得了神经病。赶紧写了封长信来，劝我研究学问，万不可钻牛角尖，凡人钻牛角尖过久，头脑多少会变成不正常，他读了我的信，甚为我担心云云。胡老师爱护后辈之心，果然可感，可是他对于我的屈赋研究却不耐烦读，既不读，当然不能了解。

老先生临去世前一个月，读《大藏经》每将地府梵文泥犁(Niraya)译为泰山，触发了他的好奇心，便著手来查泰山典故，才知道我国古时地府系在泰山，人死以后，灵魂必赴泰山受鞠，即归泰山统治。胡先生研究的路线和我民国四十二年发表于《文艺创作》上《论九歌大司命》完全相同。他仅研究到泰山与冥府的关系而止，其他尚未涉及，而人已逝世。我则早知道泰山府君即泰山司命，即是桓子孟姜壶和屈原《九歌》的大司命，也即是《史记·封禅书》齐地八神祠于梁父的地主，我又知道泰山居大地脐上，上对天脐，姜太公所封之齐，原来便是这个不登大雅堂的脐(英国人谈人体至脐上下六寸止，否则有失绅士气度)，我还知道西亚死神与生神均曾莅临我国，《遁甲开山图》：“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知死”亢父亦在齐国境内，其神即《九歌》少司命。但那时生神尚未列入齐地八神之列。

为了这些缘故，我始胆敢宣称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支。

所谓屈赋研究可补世界宗教神话及其他文化因素之缺，真是太多了，要叙也不能于仓卒间一概叙出，现在只能随便举出几条，给大家看个例子。

《九歌·山鬼》的歌主，旧谓山中木石精怪如“夔”、“泉羊”、“罔两”，容貌是奇丑的，近代楚辞学者又指为巫女神女，其实这位歌主含睇宜笑，是

个美少年，披萝带荔，乘豹从狸，则与希腊酒神狄倭仪苏士（Dionysus）有非常相似处。那个酒神原是年轻美貌的神道，他头戴葡萄枝叶编成的冠冕，身上及其武器车乘等也缠满了长春藤及葡萄藤。

长春藤即是薛荔，至于葡萄则西汉张骞通西域始入中国，屈原无法描写，只好以同属藤科植物“女萝”代。豹子与山猫乃酒神爱兽。希腊神话从来未言酒神豹子作何颜色，山鬼乘车之豹竟为“赤豹”，我们知道豹色黄如虎，亦有纯黑者，却未闻有赤色之豹，然则这赤豹定是神话之豹而非实际之豹了。屈原说话句句有根据，从来不作凿空之谈，他这赤豹当亦是域外转来的，这不是可以补希腊酒神故事的缺典吗？

战神无头，策源甚古。印度锡克族奉一无头骑马神，云崇敬之则胜敌。此神在全印则为迦尼隆（Ganesa）大自在天子，谓在婴儿时受土星神一瞥而失其首，取象首续之而复生，长而为其父天军统帅，性质类战神，常现无头婴孩（Headless Child）之相。其母婆婆谛亦为著名凶恶之女战神，与巨魔战，首亦被砍去，亦常现无头女人相。

《山海经》与帝争位的刑天，其头被斩，被葬于常阳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盾及干而舞，也是一位战神。中国战神名为兵主，这兵主便是蚩尤，黄帝擒斩他以后，葬其首于东平寿乡县阚乡城中，肩髀（即身躯）则葬山阳郡钜野县重聚，所谓“身首异处”而葬。我们知道寿乡即寿张，在今山东东平县治，钜野属今河北平乡县治，相处数百里，这样身首远远地分开埋葬，是令人疑议不解的。那么，蚩尤也是无头。何况蚩尤又号炎帝、赤帝，在天属荧惑之神，荧惑便是火星。火星之神，全世界皆称为战神之星。

今日发掘出商代帝王陵墓，每有大批无头人，其头别葬，前者称“无头葬”后者称“人头葬”考古学家皆莫知其所以然。笔者则谓无头葬者因战神无头，故将侍卫武士头亦斩去作成战神部下，则用以保护王陵，威力可增数倍之故。又古代武将棺之被发现者，棺中人往往无头。中国人顶讲究“全尸”，纵其头被敌人砍去亦必以木雕一人首续之，今之无头当亦是模仿战神形状，孟子所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可见古代战士时时以失首为荣。失首何荣？也不过是模仿战神罢了。

西亚有一浮雕今藏大英博物馆，刻亚述名王 Ashur-Natsirpal 率领军队攻击一敌垒，空中有无头人三，王举手向之，若祈祷状。外国神话学者及艺术家对此亦莫能解释，谓为战场尸体，为了古人不懂透视学，遂刻得远近不分，高下失置。但这三个无头人均飘浮于树顶，可知决不是战场尸体。又有一石刻，刻此王凯旋国门之像，空中亦有无头人二，中间一带翅大神，居光圈中，引满而射，这是亚述国家神亚素尔（Ahssur）。国门非战场，凯旋非战争之时，何以仍有无头人出现呢？这又是不能解说的事。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无头战神，问题岂不是迎刃而解吗？可是西洋学者至今尚不知。今日西洋天文图均由古代传下，猎人星座（Orion）有虚线与大犬、小犬、天狼、弧矢各星座相连，表示它们中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知道天体广大无垠，恒星与恒星之间距离每以数十、数百、数兆光年计算，它们间有什么关系可说？但若知猎人星系西亚大神旦缪子（Tammug）的星座，旦缪子即《九歌》少司命，是由死神变为生神者。他是大司命子。传到我国，变为泰山诸郎。在古代传统中，泰山诸郎无不好猎，其猎必用弹弓。中国二郎神，人不知其为何神，误为李冰仲子及杨煜、赵昱等，据笔者考证，二郎也是泰山诸郎之一。《西游记》言其姓杨，《封神传》

称之为杨戩，常携猎犬，挟弹弓，终日驰猎。天文图上的猎人星与大小犬、弧矢之相联，西洋天文学家及神话学家均不能言其故，以为此亦不过传统如是而已。借助于中国民间神话乃涣然冰释。

西洋神话学家每言土星神克洛诺士 (Cronus) 乘飞龙车，右手携大镰刀，左手携麦草一束，为“时间之神”(God of Time)。后来变为文学里的“时间老人”，飞龙车是不给他乘坐了，携镰刀及草如故。你若询问西洋神话学家：土星为什么要乘飞龙车及携镰刀麦草呢？我敢说他们会一个个瞠目结舌，不知所答，只说传统说法是这样的罢了。现在我们知道西亚每一行星神即七曜或九曜之神，必配恒星一座至数座，行星的土星所配者为狮子星座 (The Constellation of Leo) 中国名之为轩辕座，为黄帝星座，黄帝在五方帝中属土。每年一到夏季，狮子座在我们顶上出现，居天体正中，故曰“中央土”。若行星的土星，行动虽迟缓，却不能固定于天体之一处，故知“中央土”系指恒星而非行星。

狮子星座立于长蛇座 (Hydra)，长蛇系水蛇。西亚有一石刻，一狮立于带翅之长龙上。中国黄帝乘龙上天，《史记》孟康注龙系鞍+龙。\*+龙即腾龙，也即是飞龙。黄帝有“应龙”，即有翼之龙。而《九歌·湘君》有“驾飞龙北征”、“飞龙兮翩翩”之语，知其为土星之神，也是九曜中之土。如比，则外国神话土星神乘飞龙 (The Winged Dragon) 有了着落了。

狮子座头部弯曲有似镰刀一把，天文学上称为“狮子座之镰”(The Sickle of Leo)，那么，土星神克洛诺士手携镰刀又有着落了。克洛诺士篡夺其父 Uranus 天帝位时，曾以这把镰刀伤父，父血下滴人间海上化为泡沫一堆，美神阿弗罗蒂德 (Aphrodite) 即由此泡沫诞生。又说克洛诺士以镰刀埋伏于要隘，其父遁逃时，跌仆刀上，身体某部器官被割断跌落海中变为美神云云，可见这把镰刀作用倒不小哪！

克洛诺士以携镰握草故，变为农业之神，今日西洋火箭有所谓“农神号”原文当是 Cronus 这个字。中国黄帝也有农神性，《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治五气，艺五种”，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轩辕座中有数星，曰司禄，为农稷之星，主百谷。有四颗星在轩辕座下，构成犁形，号曰“天稷”，《历学会通》曰：“天稷，农人之具。”虽非镰刀，却也相近。

选自《屈赋论丛》

